

湖南文史资料 第32辑

保密局湖南站招来

文强



戊辰秋书北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文史资料

第32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陈永芳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书刊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15号)
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

1988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86千字
印数：1—11000 定价：2.00元
国统内一刊号 CN43—1011

●主 编 田伏隆

●副 主 编 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 陈永芳

7H260/17

编 辑 说 明

一、湖南籍人士在复兴社、中统、军统、宪兵、交警等特务组织中身居要职者颇多，但这些人的活动、影响和结局却鲜为人知。为此，我们编辑了《保密局湖南站始末》一书，亦即《湖南文史资料》第32辑，该辑是我省第一本比较系统地反映特务活动的专辑。

二、限于篇幅，本辑仅汇集了20篇文章，有关复兴社的3篇，反映中统的2篇，叙述军统活动及人物的12篇，其它有关宪兵、交警部队、第三势力的稿件各1篇。该辑对某些特务组织和重要成员的活动反映并不全面，希望知情者继续写稿，我们将在适当时机刊载。

三、本辑附有主要湘籍军统将领简录，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所录不一定全面，希知情者补充。

四、本辑新增补白栏，摘录了一些知识性、史料性较强的资料附于文后，以拾缺补遗。

五、本刊过去曾发表过一些有关资料，本辑没有转载，附列目录供读者参考。

六、本辑内容因主要依据回忆，难免存在一些差错，希望读者予以订正。

湖南文史资料

19488

目 录

(总第32辑)

复 兴 社 内 幕

- 中华复兴社内幕**.....龙步云 (1)
复兴社的成立——复兴社总社和办公地点——复兴社的组织系统与社员发展——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和外围组织——复兴社与军统的关系——复兴社与蓝衣社之说——复兴社的活动——复兴社的结束
- 中华复兴社在湖南的活动**.....仇硕夫 (14)
复兴社湖南分社的组织情况——复兴社在湖南历届学生集训队的活动——复兴社湖南分社与湖南甲乙派的斗争
- 我参加复兴社的一些经历**.....杨 焜 (19)

中统在湖南的活动

- 中统在湖南的活动**.....张 蔚 (25)
中统的由来及其在湖南的组织活动——特务训练情况——中统特务的罪恶活动——特务汉奸同流合污——特务内部的倾轧与腐朽生活
- 中统在郴县活动记略**.....周仅章 (65)

军统在湖南的活动

- 湖南特务机构湘站的发展和活动……………黄德曾 (68)
军统时期湖南邮电检查所内幕……………陈俊藻 (75)
军统特训班在黔城……………杨周震 (80)
忆军统湖南站二三事……………陈 达 (85)

站长与夫人一并移交——视察军统平江株洲湘潭醴陵情报组——互争九战区军法执监部调查室主任一职

- 何际元与别动军第四纵队……………张季任 (90)

何际元其人——益训班与四纵队的成立——中英中美特训班——石潭之役——大摆筵席——田坪里的中美特训班——捕捉日军——四纵队的纪律——移防长沙与整编

- 保密局湖南站始末……………黄康永 (102)

保密局湖南站的建立——湖南站的活动方式——湖南站办理的几个行动案——湖南站的应变计划——程潜主湘后的湖南站——陈明仁调回湖南的内幕——湖南站与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机要组——毛钟新三次到长沙——我两次去湘西的经过

特务武装秘录

- 国民党宪兵部队特高组秘录……………钟高玉 (132)

从头说起——初露头角——自创门户——特务训练——特务待遇——特高编制——工作概况——内部倾轧

国民党交警十二总队存亡亲历记……………胡啸华 (144)

国民党交警部队概况——驻防山东的前前后后——

冀东防守——塘沽防守与撤退——十总队与十二总

队遭袭——上海待命与周伟龙被捕——移防溪口护

卫蒋介石——从挣扎得覆灭

我参加第三势力和空投湘西前后……………高 嵩 (173)

湘 籍 军 统 将 领

最大的湘籍军统特务张严佛……………陈 达 (187)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刘植根 (192)

我所知道的唐纵……………陆印象 (199)

我怎样认识唐纵——唐纵等联袂赴德——创办经纬

出版社——创办中国警政出版社——想靠拢共产党

一个多色彩的军统特务——罗文杰……………罗善达 (208)

浪迹江湖——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与红军作战

——抗命倒何——湘西军统头目——湘西事变前后

——弃暗投明

军统系统中的湖南人……………岳 枫 (221)

戴笠的另一副面孔……………沈 醉 (216)

本刊发表过的特务史料篇目…………… (231)

补 白

十三太保与四大金刚 (18) 党员通讯局的机构与

人事 (24) 中统成员的来源 (64) 保密局成

立时的组织机构 (67) 军统控制的主要军事单

位 (74) 军统控制的主要行政单位 (79) 临
潼特训班 (84) 中统特工总部 (89) 保密局
的外勤站 (101) 内政部调查局 (131) 汪伪
特工总部 (143) 第二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 (191)
军统成立时的组织机构 (215)

中华复兴社内幕

龙步云*

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曾于30年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一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是，中华复兴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从事过哪些活动，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的，这些，都鲜为人知。

1934年至1936年，我曾在复兴社总社组织处工作，1936年至1938年曾任过复兴社湖南分社干事兼助理书记，追溯往事，历历在目。现将我亲身经历、亲见亲闻之事，扼要记之，以作为历史参考。

复兴社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坚持“不抵抗”政策，放弃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同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广大人民要求政府出兵抗日。1931年9月24日，上海35000名码头工人举行了反日大罢工，9月28日，2000多名南京和上海学生冒雨捣毁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10月初，上海80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要求政府发枪抗日。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及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也纷纷起来罢工、罢课，抗日浪潮席卷全国。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广大群

*龙步云曾于1934年至1936年曾在复兴社总社组织处工作，1936年至1938年任复兴社湖南分社干事兼助理书记。

众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涨，蒋介石忧心忡忡，全国人民要求抗日，难保黄埔系军人没有抗日热情，若黄埔系军人要求抗日，他将用什么力量反共？为稳定局势，蒋介石以恢复民族精神，复兴中华为幌子，授意黄埔军校的亲信门徒贺衷寒、鄧悌、滕杰、康泽、周复、赵范生等筹划，组织一个特务组织。

筹建中华复兴社之前，蒋介石秘密组织了一个力行社，有成员80多人，他们都是黄埔军校的早期学生，政治上对蒋忠诚，并取得了蒋的信任。随后又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在军政机关、文化教育界和社会团体中发展成员，为建立中华复兴社做好了组织、人事上的准备，有了一支骨干力量。从而加紧了筹建规模更大的秘密政治组织的步伐。

1932年春节后的一个星期日的晚上8点，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秘密召开了中华复兴社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600多人，都是秘密串连、通知、集结起来，由力行社社员发展的对象。

大会由贺衷寒主持，会上宣读了中华复兴社章程和组织纪律制度。并规定后入社者要面对蒋介石肖像宣誓，誓词要事先印好，每人发一份，由宣誓人签名，捺拇指印。其誓词大意是：“余誓以至诚，信奉三民主义，拥护领袖，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如有违犯，愿受严厉制裁。”

会上，每人发一份总社干事会候选人名单，由到会者圈定，名单收回后，因时间关系来不及公布圈选结果，将圈选得数最多的报蒋介石审批，以贺衷寒、鄧悌、滕杰、康泽、桂永清、肖赞育、邓文仪、周复、曾扩情、潘佑强、杜心如、郑介民、刘咏尧、刘健群、田载龙、黄雍、戴笠、张元良、赵范生、胡骥、侯志明、李秉忠、李士俊、干国勋、邱开基、彭孟祥、梁干乔、骆德荣、袁守谦、任觉伍、叶维、葛武槃、顾希平、李一民、刘光瑛、姜绍愷、黄珍吾等人为总社干事会干

事，以滕杰为第一任书记。相继任书记的有贺衷寒、鄧悌（以后改称为书记长）、刘健群、邓文仪、康泽等，总社干事会成员则无更换。

复兴社总社和办公地点

中华复兴社总社设在南京市三道高井。这里是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办公的地方，有正式的挂牌，这是一个公开的单位。在它的后院，中间隔一门，有便衣警察守护，另有一侧门经过中央军事委员会训练处可通明瓦廊正街，这也是一个公开的单位。复兴社总部以这两个机关为掩护，在中间间的办公楼办公，与外界隔绝，进行秘密活动。

总社机关设有七个处，即书记处、组织处、宣传处、军事处、特务处、总务处、训练处。其中军事处因人事、经费属半独立性质，设在程阁老巷办公。特务处自成系统，独立行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鸡鹅巷，处长戴笠。设对外联络处于三茅宫，其余五个处在总社一起办公。但是，各处与各处的活动，互不衔接，各守秘密，就是处内成员，也是单线联系，对外严守机密。

总社书记及各处负责干事，均由蒋介石亲自决定。

复兴社的组织系统与社员发展

复兴社自上至下设有总社、分社、支社、小组四级。分社与支社均设干事会；分社干事会由干事5人，候补干事1人组成。支社干事会由干事3人组成。

分社、支社的干事分别兼任书记、组织、训练等部门的领导工作，并设助理人员若干名。小组为基层组织，由社员3至10余人组成，设组长1人。

复兴社总社、分社两级设有专门的检察机关。总社设检察会，书记由蒋介石指定。周复、田载龙等曾先后担任检察会书记。分社检察会书记由总社委派，分别监督同级干事会的工作，处理社员违纪事宜。

复兴社以大中学校师生、党政军机关、团体的公职人员、文化学术界人士等为发展对象。组织建立偏重于大、中城市。工人中只吸收工头和工会负责人及工程技术人员。农村不发展，也不建立外围组织。

加入复兴社，须由社员二人介绍，经过考察，将其情况在小组会上通过，报支社批准，报转分社、总社备案。然后由介绍人通知其本人，约定时间、地点，入社人到达后，先填写入社表（表名“甲种表”，无“复兴社”三字）。填表后由支社所派主持人向入社人宣布复兴社的宗旨及入社后应注意的事项，应遵守的组织纪律，严守机密等内容，然后进行宣誓。一般宣誓的人数不多，或个别进行。入社后编入小组，每周开会一次，报告一周的生活情况，汇报活动动态，反映情况。社员除同一小组外，不准发生横的联系，彼此称呼为“同仁”。社员的活动，由组长布置任务，垂直联系，各人的活动，相互保密。因此，即使发生意外情况，牵连的人也不多。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和外围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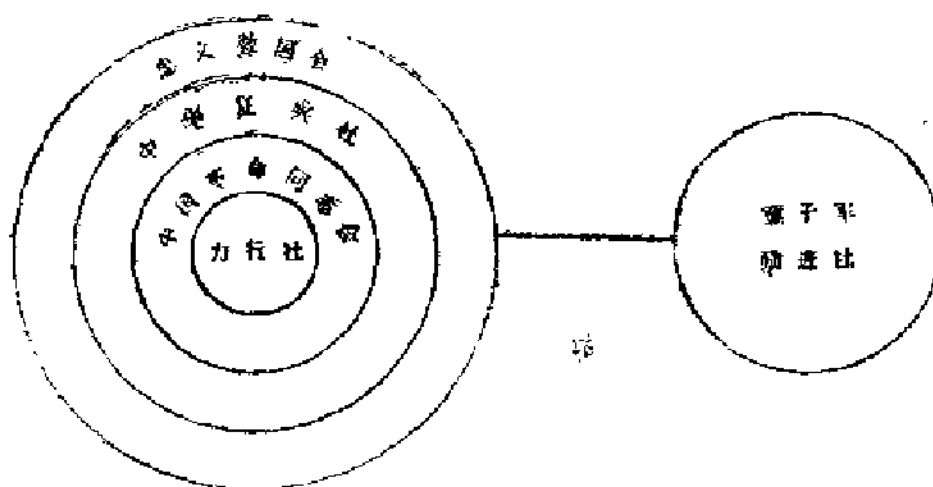
中华复兴社是以力行社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力行社人员少，他们既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是军政界的重要人物，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手伸得很长，插手各方面的工作，秘密开展活动。

起初，他们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了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和中国革命军人同志会。复兴社成立后，这两个会合并为中国革命同志会，成为力行社的外围组织，也是中华复兴社的核心组

织。所以，复兴社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大多由中国革命同志会的成员充任。

复兴社的成员，要加入中国革命同志会，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察、考验，才能升为会员，因此，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而力行社则是核心的核心。

复兴社为扩大影响，深入基层，争取成员，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吸收一些文化不高，政治地位较低，而在社会上有潜在影响的人参加。如工商界、行会、政界的乡、镇、保长、帮会头目以及部分中学生。



复兴社的组织关系图

忠义救国会，自成系统，独立建制。但其各级负责人绝大部分是复兴社的骨干社员，按当地复兴社组织的意旨进行活动和工作。各地复兴社也因情况需要，报请总社批准，采用其他名义建立了一些外围组织。如湖南省的忠义救国会因泄露了秘密，暴露了组织后，改称“正义社”。

复兴社为了使其活动深入到青少年中去，将教会掌握的中华全国童子军协会撤销，成立了中国童子军总会。先后由蒋介石、戴季陶担任会长。各省设立童子军理事会，学校有童子军教训员，也都由复兴社派出的骨干担任。

中国童子军总会设在南京，实际负责的为主任秘书，陈立夫曾担任该会主任秘书一职。后来，复兴社派的刘尧、滕杰、鄧悌、赵范生等相继接任。

不久复兴社又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童子军励进社。总社设在南京堂府街三条巷。先后由刘咏尧、滕杰、鄧悌、赵范生担任书记。

各省市童子军理事会负实际工作责任的有秘书一职，均派复兴社的骨干担任，在童子军教练员及学生中发展组织，用以壮大复兴社的力量。

复兴社与军统的关系

中华复兴社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机构，其任务和性质不同，宗旨不一样，隶属关系也不同。复兴社是以德国法西斯为衣钵的秘密组织，其活动不受部门领导，直属蒋介石指挥和控制。而军统是以特务工作为专业的部门，属军事委员会领导和指挥。由于当时复兴社的中央干事戴笠是军统局局长，而又担负复兴社特务处的领导一职。因此，两者之间便有了密切联系。所以，有人将复兴社与军统视为一体。军统利用复兴社特务处的关系，从复兴社搜集情报，从复兴社社员中物色特工人员，但军统的职业是特工，他们并不全是复兴社的人，复兴社的社员个别参加军统的，是不通过复兴社组织的，连复兴社负责人也不知道。军统的一切行动对复兴社保密，复兴社的活动也向军统保密，两者是互不干扰，各个组织执行各自的任务。如1935年春，复兴社组织处有一位同事，收发文件兼管案卷的工作人员，是浙江省人，名叫郑吉康，他结婚不到一个月，突然失踪，引起大家惊疑。组织处派人四处寻找，均无下落。一个星期后，由

军统转来一个文件，才知道郑吉康因结婚负债，无法偿还，将其所管的部分重要文件企图以高价偷偷地卖给日本驻南京使馆。在接洽时，被使馆内雇佣的雇工（军统埋伏的特工人员）发现，待郑第二次携卷去日本使馆途中，被军统特工人员拘捕，军统审讯后秘密处决。当时任书记长的鄧悌竟不知此事，后来，鄧悌因此被免除了职务。

复兴社与蓝衣社之说

当时，社会上传说复兴社就是蓝衣社，其实根本没有蓝衣社这个组织。之所以有蓝衣社之传，是复兴社成立之时，总社干事刘健群曾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过“整理本党的几点意见”，他主张：整党后重新登记的党员，一律穿着蓝色服装（模仿意、德两国的黑衫党、褐衫党的作法）。他的意见，当时并未被国民党中央采纳，他个人出资将意见书铅印成册，在上海、南京等地的书店公开发行，人们争相购买，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此，蓝衣社便传开了，人们误传复兴社就是蓝衣社。

刘健群，贵州人，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随何应钦工作多年，是一个多谋善辩的政客，且有政治野心。因何应钦的推荐，曾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但他非军校出身，在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复兴社中，他是受排挤的。抗日战争初期，刘因政治上失意而出家做了几年和尚，终因不甘寂寞于1942年下山到了重庆，仍未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后来竞选为立法委员，大陆解放后去台湾，曾任台湾立法院院长。

复兴社的活动

复兴社的活动，涉及面十分广，有秘密和公开的两大方

面。复兴社成员利用其合法身份开展秘密工作，控制了各个要害部门，掌握了各种权力。上至中央下至乡保，均有复兴社的人员在其中。现将情况分述如下：

一、国民军事教育。这是以全国人民和学生为对象开展的军事教育，完全是公开的正面教育。但它是由复兴社控制的，从中培植、选拔和发展复兴社的成员和势力，作为它的骨干力量。

国民教育分两大部分：一是学校军事训练，以高中以上学生为对象。二是社会军事训练，是以未服兵役适龄青年为对象。这两方面的工作由南京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总管，各省设立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均由国民军事教育处委派，其余委员若干名则由各省有关厅、处长兼任。各县、市设立社会训练总队，总队长由县市长兼任，负实际责任的副总队长，则由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委派社训教官充任。各高中、大学的军训亦由省军训委员会委派的军事教官负责训练。

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即为复兴社所掌握的一个机构。复兴社干事潘佑强、杜心如等先后为处长，派往各省、市、县及各大、中学校担任国民军事教育的领导和军事教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复兴社的成员。因此，复兴社把国民军事教育作为主要工作，并通过这一工作发展和扩大了自己的组织。各省高中以上学校军事训练，从1935年开始，每年上学期集训一次，以完成后备军官教育，其名称为“某省第某届学生军事集训总队”。当时的高中以上学生，必须经过军事集训才能参加全省会考取得毕业文凭。每届集训总队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均由省军事训练委员会委派军事教官担任。集训总队设政训室，分训育、指导、考核三种，各中队派指导员。所有人员

均由复兴社选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秘密政治、军事网络。复兴社利用这种一年一届的军事集训，从学生中发展其组织，吸收为其效劳的学生入社，扩大组织，这对控制学生运动起到了作用。

二、军队政训工作。蒋介石统率的军队，可分为嫡系与杂牌两大类。为了使军队服从其统帅，曾于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训练处，先后由刘健群、贺衷寒、袁守谦担任处长。这三个人都是复兴社的中坚分子。

政训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官兵中进行拥护领袖和反共宣传的思想教育，并监视军队，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各军、师设政训处，团、营、连派指导员，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委派，大部分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

三、军队党务工作。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有军人科，后来扩大为军队党务处，由复兴社负责主持。先后由陈春霖、黄仲翔、曹敏、邹建中、芮晋等任科长、处长。复兴社控制了军队党务机构。

在各军事机关、各军事学校，陆、海、空三军师以上单位设立特别党部，由单位主官任特派员，负实际工作责任的是书记长，该员由军队党务处委派，其中绝大部分是复兴社成员。

四、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蒋介石为了加强军事势力的巩固和发展，除继续以黄埔军校体系在南京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外，并先后创办了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各兵种以及军需、宪兵、通讯、警官、海军、空军等军事学校，蒋介石自兼校长或委任亲信主持。为了统一控制这些军事学校毕业的学员，在军事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统一对毕业生进行管理，这个处后来隶展军政部。各省设通讯处，调查各军校毕业生在部队或机关单位工作情况，办理失业登记，协助解决工作及生活困难。从而达到联

络感情，沟通思想，掌握情况的目的，并借此团结了一大批军校毕业生。担任这项工作的人员都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

五、训练童子军干部。对中小學生进行童子军训练，是复兴社培养下一代的一项重要决策和措施。我国的童子军教育，是从英国学来的。复兴社尚未建立以前，这项工作首先在教会学校开办。后来，蒋介石授意将童子军协会改名为中国童子军总会。复兴社为了控制这一领域，培植自己的势力，专门成立了童子军励进社，并在南京孝陵卫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增设了一个童子军组，由赵范生、蔡杞材、刘伯龙、陈潮中、杨克敬等负责，训练了一批童子军教练员及工作人员，这些人都是以复兴社为基础的。

六、训练财会人员。刘健群担任复兴社书记时，以军政部财会人员训练班的名义，由曹振鹏等负责，训练了几批会计、审计人员，分别派往各军事机关担任会计、审计工作，以掌握军队的财务，重点派在由复兴社成员担任主管的单位，用以控制军队财务工作。

七、训练军事交通人员。复兴社为培植军事交通人员，由鄧梯负责，在南京开办了一个军事交通研究所，招收了几批大专学生及军校毕业生，分水陆运输、军用邮电、兵站、后勤等几个方面，进行专业训练，并从学员中大量发展复兴社成员。结业后，分别派往各单位，成为军事交通的骨干，并受复兴社控制。

八、创办厚生合作社。复兴社为扩大经济来源，曾在南京创办厚生合作社，由李一民任经理，开始以经营粮食购销加工为主，后因管理不善，仅搞了三年即停业。

九、创办书店。复兴社为便于自行出版发行图书，扩大组织影响，由邓文仪、肖赞育负责在南京办了一个书店，名称是拔提书店。以印销中国古代兵书、四大教程典、范、令等军

事书籍及蒋介石的著作等为主，并兼营少量其他有关文化书刊。原计划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店，因人力、资金有限未能实现。

十、文化宣传工作。复兴社为扩大影响，对新闻舆论工具十分重视，总社办了报刊，其地方组织也大办报刊，以作为它的喉舌。

创办的报纸主要有：

《中国日报》，南京发行，由康泽任社长，是复兴社总社机关报。

《扫荡报》，先后在南昌、武汉发行，由贺衷寒、黄少谷主持，反共最烈。

《北方日报》，在北平发行，先后由余洒度、阮齐任社长，是复兴社在华北的宣传中心。

《南方日报》，在福州发行，由黄雍任社长，为复兴社在华南的宣传中心。

这四种报纸都是对开大报，公开发行的。此外，各地方组织或与复兴社有密切关系的报纸就更多了。如长沙的《力报》，衡阳的《湘潮日报》，南京的《中华周报》、《国际周报》，开封的《河南晚报》，青岛的《新青岛报》等不下百余种，遍及全国。

主要刊物有：

《前途月刊》，在上海发行，由刘炳黎主编，为学术理论性的大型刊物，撰稿人都是一些大学的教授、作家。如倪文亚、孙慕迦、孙良工、孙伯鸾、陆梦衣、李石岑、傅东华、樊仲云、茹春浦、李金发、徐懋庸、章渊若、李冰若、谭云山、易水寒、李朴国、刘泮珠、张彭年、程拂浪、区克室、庄心在、汪漫铎、许太空、李青岩、俞君适、白瑜等都是这个刊物的理论撰述，其中不少是复兴社成员。

《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发行。由肖作霖主编,为复兴社总社机关刊物。

这两个刊物由复兴社总社主办,对外是保密的。其他各地方组织也办了刊物。如南京的《内外杂志》、上海的《新社会》月刊、《中国文学》月刊、《民族文艺》月刊、《文化情报》月刊、北平的《老实话》、天津的《现代社会》周刊、西安的《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的《青年战士》、南昌的《青年与战争》等。

复兴社在全国掌握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具,其宣传中心和言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在政治上强调“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领袖”即,蒋介石,实行集权政治,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消灭共产党”,安定社会,奋发图强,收复失地,加强国防,厉行军事国民教育等等为内容;在经济上主张限制私人经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平均地权,发展农业,严惩贪污,登记并限制官吏财产等等;在社会道德风尚方面,提倡“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执行“新生活运动”,提倡“简单、整洁、朴素、勤劳”的生活习惯,这些论调在当时风靡一时。

复 兴 社 的 结 束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何应钦妄图发动“讨伐”战争,以便取代蒋介石。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宋子文等,则希望和平解决这一事变,以维护蒋介石的地位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复兴社总部立即召开了在南京的中央干事会议。其时,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主张敦请何应钦主持军事,迅速调集陆、空军部队进攻西安,平定“叛乱”。桂永清更是咆哮要率一旅之众,负责攻破潼关。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晚上8时在炮标大礼堂召集了在南

京的复兴社社员近2000人的大会，贺衷寒作了动员报告。后来，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一情况，对复兴社拥何主战的做法极为不满，复兴社负责人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形势下，被迫撤销复兴社，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1938年夏初，复兴社在武昌两湖书院旧址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由各省、市分社、支社推选。湖南的代表有李一民、贺醒汉、施则凡、蔡杞材、龙步云、李约、雷勋隆等7人，在武汉的总社干事会，检察会的人员均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共有代表500多人，陈诚、陈立夫、张厉生等奉蒋介石之命到会。会议开了3天，由贺衷寒、刘健群、康泽等轮流主持。并由刘健群作政治报告，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及抗日战争的前途。大会没有讨论什么议案，没有作出什么决议，使大家预感到这是复兴社最后一次集会。

武昌会议后一个星期，我们接到总社发来办理结束复兴社的电令。电令大意是：奉领袖之命，立即结束复兴社，办理结束时间为3个月（5月至7月），工作人员加发3个月薪资，另行安置；所有文件就地销毁。社员不超过25岁的根据自愿，转入三民主义青年团。至此，复兴社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结束了它的生命。

（一闻 整理）

中华复兴社在湖南的活动

仇 硕 夫*

中华复兴社是1932年由在南京的黄埔系将领组织的一个秘密团体，是蒋介石维护其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我曾任复兴社湖南分社的书记，兹将该社在湖南的活动概述如下。

复兴社湖南分社的组织情况

复兴社湖南分社是1933年建立的，当初仅有一个小组，由蒋肇周负责，成立分社后，南京总社派蒋鹏翥（湖南宁远人，黄埔四期毕业）为分社书记。1935年1月，由仇硕夫（后任省党部执行委员）接替。1936年1月，又由李一民接替。1937年10月，贺醒汉（湖南岳阳人，贺衷寒胞兄），1938年2月，滕杰又分别接充分社书记。

分社下设支社，当时设有长沙、衡阳、邵阳、武冈、浏阳等支社，还有工人和新闻等支社。另外建立了一个大的外围组织“正义社”，这是一个储训预备社员的机构。分、支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干事会，由上级在社员中指派三至七人组成，以一人兼书记。吸收社员，必须经干事会通过。

分、支社的工作，分组织、训练、宣传、考核等组，各组都指定干事负责，定期汇报，主要工作对象为学生、工人、农民和机关工作人员。社员进行集体训练时，多利用公开名义，

*仇硕夫曾于1935年8月至12月任复兴社湖南分社书记。解放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如郊游、野餐或联欢会等。外围组织成员之间不许发生横的联系。为争取全部掌握学生集训大权，社员须尽可能地参加学生集训队的工作，由训育委员会作统一计划和安排。各在校学生即责成各学校的驻校军事教官与军训教官负责掌握训练。当时如非复兴社社员，就不可能充当各校军训教官。当时各县的国民兵团、县社训总队，以及国民社会军事训练等，大多数都掌握在复兴社分子手中。

复兴社在湖南历届学生集训队的活动

按照当时中央训练总监部的规定，各省高中学生都要集中进行军事训练，统一在1935年4月1日开始主办（但湖南是1935年1月1日开办的），学生集训总队部设有训育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中央直接调派训育主任（兼副总队长）一人和政治主任教官一人参加，他们名为对集训学生负政治思想教育之责，实际上负有在学生集训队内发展“复兴社”成员的任务。

训委会聘请委员若干人，委员大都是各学校的校长和有名的教职员，以及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另外聘请了很多政治教官，多半是由各学校教师兼任，按其所授课程多少付酬，也有专任的，训委会内分设组织、宣传、训练、考核、总务等科，每科设科长一人，干事若干人，训练员若干人，都按阶级（官衔）支薪，这笔经费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拨给，不受地方财政的限制。

湖南学生集训队开始训练之前，发生了一出闹剧，它的制造者是何浩若。何是湘潭人，留美学生，曾在南京中央军校当过教官。1934年，他在南京获悉国民党训练总监部关于学生集中军训的全盘计划，便赶回湖南向何键献策：“湖南的青年是芸公的青年，都是拥护何主席的，这是芸公在湖南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不能让别人抓去……，”何键问应该怎么办？何

浩若说：“我有办法。现在中央关于高中学生集中军训的计划已在我手中，我们表面上按照中央的规定办，但把集训时间改为一个学期，从明年（1935年）1月1日开始，办到6月底为止。我们把学生集训工作准备好后，就开始对学生集训，等到4月1号中央派员来参与，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何键深以为然。当即宣布把湖南高中学生集中军事训练的大权交给何浩若。何浩若自兼学生集训总队部的副总队长和训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集军训与政训大权于一身。1935年1月1日，集训开始后，何浩若遵照何键的指示，在集训学生中秘密组织“铁血锄奸团”。他曾将集训总队全体受训学生集合于小吴门外49标广场举行入团宣誓。何键还亲临监誓并致训词，申言“奸”就是共产党，必须用我们的“铁血”锄而去之，这是你们的任务。何浩若还补充说：这个“铁血锄奸团”就是蒋委员长要我在湖南组织的“蓝衣社”，你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是无上光荣的。后来何浩若还铸造了大批戒指，上镌有“铁血”二字，发给学生，又用何键的名义赠给学生短剑一柄，上镌“慧剑，何键赠”字样。何键当时还在集训总队部组织了一个“明耻社”，取“明耻教战”之义。参加这个组织的学生大有人在。复兴社湖南分社把何键、何浩若的作法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异常恼怒，一面派陈诚率军进驻衡阳，一而要中央训练总监部明令宣布湖南第一届学生集训总队的训育主任是仇硕夫（湖南湘阴人，当时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总教官），政治主任教官是程式（江西人，也是南京中央军校的上校政治教官）。不久，陈诚自衡阳到了长沙，何浩若知事不妙，离开了学生集训队，去湖南财政所当所长去了，这出闹剧才告结束。

1936年，湖南第二届学生集训，仍由何键兼任总队长，他是挂名的，实际负训练之责的是蒋肇周（湖南祁阳人，黄埔三期毕业，当时任湖南省军训会主任，黄埔同学会长沙分会负责

人(、仇硕夫两人。在这届学生集训中,何键不逢大典是很少到集训队来和学生见面的,他心里有难言之隐。1937年,湖南进行第三届学生集训时,蒋肇周、仇硕夫、程式都已他调,南京另派施则凡(安徽人,即刺杀孙传芳的女英雄施剑翘的胞兄,黄埔三期毕业)、李一民(湖南湘乡人,黄埔三期毕业)主持政训。

1938年,湖南第四届学生集训,是在暑假举办的,地点改在南岳庙,训练时间只有两个月,中央派黄铁民(浙江人,黄埔三期毕业),刘孟纯(广东人)负实际责任,省主席张治中兼总队长。

据我个人估计复兴社在湖南前三届集训学生中所吸收的社员决不会少于历届受训学生总和的二分之一(前三届受集训学生总数约为6000人左右,到第四届时,复兴社已结束,建立了“三青团”,因而不可能再发展社员)。

复兴社湖南分社与湖南甲乙派的斗争

何键充当湖南省主席达9年之久。他植党营私,“非礼(醴)勿用”(因何是醴陵人),特别是想把省党部大权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CC组织已在湖南建立了自己的阵地,特别是在教育界拥有很大的势力。湖南教育界名流如张炯、彭国钧、黄士衡、朱经农、王凤喈等人先后担任过省教育厅长。他们提出“以党治国”的口号,与何键针锋相对,当时的长沙报界推波助澜,称之为甲乙派斗争。乙派以刘岳厚、毛飞、黄家声等人为骨干,刘岳厚为首。甲派以张炯、彭国均、李毓尧为首,其干将还有陈大榕、曾省斋、廖维藩、杨宙康等人。两派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舌剑唇枪,磨拳擦掌,闹得乌烟瘴气。复兴社势力进入湖南后,大挖乙派的墙角。何键预料到自己在湖南的地位已摇摇欲坠,为前途计,对复兴社在湖南的所作所为就听之任之。因此他后来虽被罢免了省主席一职,还能调到南京做

一个有职无权的内政部长。何键离开湖南后，乙派的骨干分子大多被复兴社吸收了。剩下一个甲派，总以为有“果老”（指陈果夫）做后台，还可以横行天下。南京当时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口头语：“蒋家天下陈家党。”这句话蒋介石是不爱听的，他要听到“蒋家天下蒋家党”才快意。1938年复兴社解散，另外成立了三青团，复兴社在湖南的活动也就结束了。

十三太保与四大金刚

外间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尔后始终是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是哪十三个人。有人说这十三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葛武霖、梁干乔、肖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说曾扩情、鄧悌也在内；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猜测之词，说“十三太保”是这一群人的总称较合实际。其中滕杰、贺衷寒、刘健群、鄧悌、邓文仪、康泽等先后出任过书记长，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辅邦、戴笠等10余人都先后出任过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长，还有一些人任过省、市分社的书记。

复兴社的四大金刚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

（陈永芳）

我参加复兴社的一些经历

杨 焜*

1933年，我在湖南六十二师（师长陶广）一八六旅（旅长王育琰）任参谋长时，有个要好的同学吴达（我与他在湘军讲武堂及军校高级班两次同学）在该旅三七一团任中校团附。大约是七八月间的某日，他悄悄地交给我一本小册子，嘱我秘密地看一下，我于当晚仔细地看了。小册子的名目忘记了，只记得是刘健群写的，内容大意是说国民党已经老化，内部分子复杂，要想“复兴”中国，必须再次改组国民党，集国民党中“革命”的优秀人才，共谋国是。意大利、德意志之所以兴起、强盛，都是法西斯党组织坚强的缘故。中国要想富强，必须效法他们。接着叙述了复兴社的组织、社员的资格及权利、义务等等。现在回忆，大略是：社长为蒋介石。社员三人以上可以成立小组，组以上是分社或支社。社员须“品行端正”、“思想纯洁”、“身体健康”、“笃信三民主义”。入社须经老社员二人以上介绍，经审查批准方可入社。社员须遵守社章，服从社的命令，严守社的秘密。社员不得贪污、腐化，最高薪金不得超过200元。社员入社后，生活、工作都有保障。如因工作失业，保证原职原薪调社工作或介绍其它相当工作等等。

当时我认为自己虽是陆大毕业，但不是黄埔出身，要想飞

*杨焜曾任国民党第六十二师第一八六旅参谋长、第二师干训班教官、第五十二师参谋长，1933年参加复兴社。

黄腾达，很不容易。如果能加入这个组织，可以与蒋介石发生进一步的关系，不是比黄埔生更吃香吗？第二天我见了吴达，满口赞许，并请他介绍加入复兴社。他当时给了我两张表（两张内容一样）叫我填写。表的内容记不甚清，其中有：姓名、原名、别号、假名（没有假名，要自己取一个假名）、性别、年龄、籍贯、通信处、出身、简历、特长、嗜好、祖宗三代的姓名、家庭人口、经济情况、入社志愿及政治测验题数道等等。最后是介绍人姓名、与被介绍人的关系。我填写的入社志愿是：服从社的一切命令，为复兴中国贡献一切。政治测验，我写了一些中国应如何走复兴之路，应该只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类迎合他们口味的話。

我将表填好交给吴达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忽然有一个姓王的从萍乡给我来长途电话，说有要事叫我到萍乡某旅社去找他。其时我部驻在江西宜春。我猜测是此事，就请假去了。到时，他自我介绍名叫王黔，特由长沙赶来为我入社监誓。寒暄之后，他将房门关紧，于房内壁上贴上孙中山先生遗像，叫我举手宣誓。誓词是油印的，大意是：拥护社长，笃信三民主义，服从社的一切命令，严守社的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制裁等。最后是宣誓人签名盖章。

我宣誓之后，他当即和我热情握手，口称同志向我祝贺。

王黔在我宣誓之后，即告诉我，社的组织是绝对秘密的，不得泄漏。社员没有任何证件，社的纪律是严格的，如有违悖，必予以严厉处分，或命令自裁。并交代了我的任务和注意事项：

- 1、调查所在部队的力量包括少校以上军官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简历、特长、能力，部队的兵员人数、缺额，武器、弹药，训练情形，作战能力等等。

- 2、部队的经济情况，如经费、薪饷、给养及发放情况等。

3、“剿匪”情形，包括实际战况、伤亡、损失及缴获的实际数字等。

4、军官中的重要言论，即哪些倾向“中央”，哪些反对“中央”，应将姓名、言论详细具报。

5、有忠实可靠分子，应介绍入社。

6、有事随时报告，无事也必须两星期联系一次。

7、设通讯处：长沙教育会街×号，收信人邓墨村。

8、通信方法：用普通信纸，写些公开的应付话，在反面上或行间用米汤或酒精密写上要义（以碘酒涂之，即可显示出来）。

9、在工作中，没有命令，社员与社员之间，不得发生横的联系。

我听了他这些指示后，心中就开始懊悔，才知道这个组织是搞情报的机关，是为蒋介石消灭杂牌部队服务的。自己受了骗，当了他们的情报员，但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用了。初加入这个组织，害怕纪律制裁，只好替他们干。回到部队，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各团、营、连报来的各种旬报、月报、军官履历、人事、械弹统计等表，以及作战、训练各项报告和与接触的军官中的言论等等，分次用密写方法向他们报告了。

最初一个时期，报的次数较多，内容也比较有价值，他们曾来信嘉奖，说我的情报好，工作有成绩。这样过了几个月，亦即1934年二三月间，社部来信，说我已升为革命同志会会员。

我因为自己受了骗，当了情报员，不愿再害别人，招别人埋怨，所以总是借口没有可靠的人，所以一直没有介绍任何人入社，也没有成立小组。

我的介绍人吴达，也是利用中校团附的职务，做我同样的

“工作”。有一次他正在写密信，被少校团附皮觉民发觉了，便密报团长汤万堃转报师长陶广，陶广就藉故将吴达免职了。吴达根据“社章”，到长沙找他们要求介绍工作，过了两个月光景，吴达给我来信，大发牢骚。那时我的家眷已搬回长沙去住，我请假回长沙休假，吴达将内部情形全告诉了我。

当时长沙设立了一个分社，由蒋肇周（湖南祁阳人，黄埔三期毕业，公开职务是湖南新闻检查室主任，又是何键的第四路军总指挥部少将参议）负责。分社内有王黔、邓墨村，还有两人忘记了姓名，分别收集整理在湖南各部队及其他方面的社员的报告，然后转报“中央”。

吴达被免职回长沙后，他们对他就冷淡了，还责备他“工作”不小心。但为了敷衍，叫他在社内帮忙，等候介绍工作。殊不知等了两个多月，毫无结果。他在社内替他们整理各方面报来的材料，每月只给他少量的生活费用。所谓保障原职原薪，根本是骗人的。蒋肇周生活腐化，嫖、赌样样都来；家里还有佣人、包车夫等，他除了公开职务的薪金外，还向何键拿津贴，并贪污情报费用（社员通讯，本来规定有邮票、纸张、津贴等费，从未发过）。分社内的人员，敢怒不敢言。所谓薪金不准超过200元，不准贪污、腐化，都是假的。

最后吴达说：“我自己糊涂，害了你，也害了我自己。他们利用我们报来的情报，向上级邀功，而我们当了他们的走卒。你是陆大毕业生，到处可以找到工作，我暂时只得依靠他们。”

我说：“既如此，是否可以不理他们（诸逆信）？所谓‘纪律制裁’，究竟如何？”

他说：“所谓纪律，据我看，也是吓唬人的。他们嫖、赌、贪污，并没执行什么‘纪律’，也没有听说对其他什么人执行过‘纪律’。假如有对你不利的情况，我会通知你的。你一下

不理他们不好，如可能，离开湖南部队，远走高飞，就脱离他们了。”

我了解这些内幕后，就开始敷衍他们，通信报告渐渐减少了，并与在各地的陆大同学联系，请求介绍工作（另外，我在湖南部队三年多，带兵无望，也有离开之意）。1934年11月前后，有人介绍我到驻在北平的第二师干训班任战术教官，我赶紧脱身赴任，以摆脱复兴社的纠缠。

按照社的规定，社员到新的工作地点，应该带上原地的组织关系，到新地点接上，否则，算是“违法”。我既然有意脱离，当然就不管这一套了。我到北平之后，以为从此脱离了复兴社，不料，在1935年二三月间，突然接到一个名叫包凯的来信，约我到某处离谈。我一去才知是参加革命同志会的小组会。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我的，也不敢问，怕受到擅自脱离组织的处分，哪知一点事也没有。从此，我也不怕所谓“纪律制裁”了。那次小组会是布置“工作”，要求下次开会时，报告接触人的言论，个人公开职务的工作和自修的情况等等。

以后又开了一次会，我藉口第二师是中央嫡系部队，军官是青一色的黄埔学生，没听见不“妥当”的言论。不久《何梅协定》签订，中央军被日本人逼迫南下，我随部队到了徐州。在徐州驻了一个月左右，南京参谋本部调我去工作，我又到了南京。在南京工作了四五个月之后，该组织又找到了我，要我参加与北平一样的小组会。这时，我已认为这个组织无聊已极，因而更是敷衍应付了事。

“西安事变”发生二三天后某夜，革命同志会在南京某处召集了的二三百人的会议，我也参加了，都是中级以上的军官。主席台上，坐有贺衷寒、邓文仪等人。贺、邓都讲了话。大意是：“领袖”在西安蒙难，是我们的奇耻大辱。这样的大事，我们事先竟一点也不知道，大家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真是太无用了！现在大家应听候命令去营救“领袖”等语。离开会场后，大家议论纷纷：“你们大头子都不知道，还责备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后来蒋介石被释放，这事也就算了。

在这期间，吴达曾来南京找过工作。他说，自从那次被免职后，始终未找到工作。他们始终也没给他介绍工作，只是给予少数生活费。他实在受不住了，才变卖一些东西到南京来找事。我也曾为他奔走钻营，到处人浮于事，无法安插。后来听说他被迫投入军统，当了特务。

“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我调任五十七师参谋长，参加了上海抗战。以后转战安徽、湖北，再没遇到这个组织的人来找我了。我也不敢和任何人谈及此事，此事就算不了了之。

党员通讯局的机构与人事

1947年4月，中统局改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员通讯局），其人事组织关系如下：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铤、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指导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朱凌云；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党政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梓；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副处长：袁更、王璐；人事室主任：刘光煜；副主任：刘苏屏；会计室主任：郭功丰；副主任：任罗坚、谈祖怀；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激；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副主任：杜伯璜；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

（真 丽）

中统在湖南的活动

张 蔚*

中统是国民党当局为维护其法西斯统治，对人民进行镇压的特务机构。我先后担任过中统零陵、郴县、衡阳三个区的区主任，活动范围涉及湖南20多个县市，后又担任省调查统计处专员，前后达14年之久，兹将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概述于后。

一、中统的由来及其在湖南的组织活动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这个特务组织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5年，调查科扩大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陈立夫任局长，陈焯（当时的首都警察厅厅长）任副局长，局下设三个处，原党务调查处改称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邨。戴笠野心大了，不甘居陈立夫之下，两人之间常闹矛盾，蒋介石为便于控制，乃将第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把第二处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前者局长由秘书长兼，后者局长是办公厅主任兼。徐恩曾、戴笠被任命为中统和军统的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以后他俩都升为局长。中统活动范围主要在党政、文教、财经、社会等方面；军统染指军事、国防、外交、

*张蔚曾任中统湖南零陵、郴县、衡阳三个区的区主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处专员。

警宪等领域。在党派调查中，中统有侦查权，军统行使行动权。

中统特务组织自1928年成立至1949年，其组织形式几经演变，但始终由CC头子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所掌握控制，所以中统实际上成了CC的一个代名词。

提到CC，有些人以为指的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其实并非如此，它的由来乃是“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

1928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了指导委员会，彭国钧、张炯、刘岳峙等为委员，不久，彭国钧、张炯、王凤喈、李毓尧等组织“衡社”（陈大榕负责时开始半公开）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曾省斋负责时开始半公开），这是CC势力进入湖南的开始。1932年，CC将半公开的“衡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转为合法的组织进行活动，并成立省党部特务室，夏再天（江苏人）、陈杏庄（长沙人）先后担任过室主任。1938年，特务室改为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上官修（湖南石门人），高亭（江苏人）、徐子政（江苏人）等先后担任省调统室主任，室以下设书记一人（在特务室时叫秘书），专员一人，组训股长一人，情报股长一人，特情股长一人以及电台、事务人员等等，全省按行政专区划为调查区，分长沙、衡阳、沅陵、常德、邵阳、郴县、零陵、会同等八个调查区，每区设区主任，为专任制，在滨湖各县设巡回电台，名为机动工作组，县设肃反专员，后改称县调查员，为兼任义务制，仅在县党部内的办公费项下支领10%作为津贴，如需要临时开支，可以另行报销。1946年，室改为处，股改为科，韩中石（湖南湘潭人）、肖琳（湖南新化人）、程剑声（湖南澧县人）先后担任处长，人员比以前有所增加。1947年，为准备“应变”，中统局改称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湖南省调统室接到正式命令

后，改为湖南省党部党员通信处。不久，省调统处专员吴达泉（湖南浏阳人）到湖南省政府审计处成立第二科，并担任科长，原调统处人员不少被派为科员、办事员。

1948年秋，湖南掀起了和平自救运动。大小特务惶恐不安，处长程剑声把中统局在长沙的财产拍卖后携款潜逃，中统局一边通电缉拿，一边改派田纯玉继任。不久，田也在湖南和平运动的冲击下逃走了，湖南的中统特务组织也随之瓦解。

发展特务的种种手段

中统千方百计地以物质、金钱等引诱流氓地痞与无知之辈加入其组织，有的人很快办了填表宣誓手续；有的人则不填表，作为外围成员长期利用。如对于社会上的一些帮派组织，把其中的头目拉过来填上表，他就能将其大小喽罗都带过来为中统服务。对于没有填表而又被利用者，在特务俗语中称之为“特务关系”，或名之为“外围的外围”。如衡阳的郭威，跟着他的总有几十百把人，我曾多次利用他做各种侦察工作。

发展特务有几个过程，第一步是确立发展对象，又名物色对象；第二步为考核对象，分为直接考核与间接考核；第三步为批准对象，填表上报；第四步为完成对象，指定联系人等等。但这一过程，并未严格执行。如国民党衡阳市党部书记长曾宪政向省调统处要求发给他党员调查网登记表（简称党网）200份，但省调统处韩中石回答他：“党网已经停止大规模发展，此种表不便例外给你，你回衡自行印制进行发展好了。”曾宪政便把自印的200份表分给市党部秘书万骅和组织科长肖铁石，要他们分头发展。又如长沙中医学校训育员张兼三（湖南长沙人）了解到湖南造纸厂厂长黄德衍（湖南醴陵人，留法学生）与何键比较接近，能搜集一些有关何键的情报，就把他拉进了中统。我认为张兼三荐举有功，提升他当了密查员，上

官修又把他介绍到军官训练班去受训；以后徐子政先后介绍他到湖南省伤兵管理处和湖南省盐务管理局任职。中统共有通讯员、密查员、调查员三种表，视人而填，兹分述如下。

通讯员登记表。供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者填写，填完后，交上两张照片，不须宣誓，就算参加了中统。俟省调统室批准后，由所在地负责人指定一个特务去联系，收取情报。这种特务在中统中人数最多，属于一般性特务，既不发给调查证，更不可能看到特务组织的文件，甚至特务组织的办公地址和特务宿舍也不轻易地告诉他们。

社会密查员登记表。这类表是给国民党的所谓“优秀”党员、各级学校中的教职员、民众团体的主要成员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填的，通讯员中有特殊表现者亦可填此表。填了此表的人，被称之为基本特务，起骨干作用。1939年，密查员登记表停止使用，改用蒋介石亲手制订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登记表，还把蒋介石的亲笔训词和调查手册分别印好，发给填了表的人。我曾专门派人到郴县发展党网，将郴县党部的党员名册要来，按名填表，既不要交照片，也不必通知本人，完全是凑数。蒋介石的训词和调查手册来不及赶印也就不发了，甚至到后来才通知本人已代他填表加入了党网，我在郴县发展党网非常卖力，受到了中统局的表扬。

调查员登记表。填表人一定要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加入特务多年又有特殊表现的内部工作人员，都给填这种表。它比前两种表要详细，本人及社会关系的姓名、年龄、职务和住址，都要填进去。宣誓的誓词与密查员的誓词不同，大意是“绝对服从组织命令、绝对遵守组织纪律、绝对保守组织秘密、绝对以调查工作为终身职业，如有违背誓言，甘愿接受任何最严厉的处罚，永不后悔”等语。在各县的特务中，能填这种表的人是不多的。

无孔不入的特务布置

已经填过表的特务（不论哪一类），经过省调统室组训工作委员会的研究，均有组织、有计划地派入机关各个部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打入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利用上层关系硬性指定。蒋介石曾规定“中统专搞盐务，军统专搞禁烟”。所以中统特务一批又一批地打进了盐务机关。如1938年李熙元在广西拍电报给徐子政，向湖南要特务50名，徐指定陶自畊（湖南衡山人）带队进广西担任运输大队长。顾建中在广东，也向湖南要特务，省调统室派冯钧（湖南衡阳人）等数十人前往。1940年李熙元到湖南担任省盐务管理局长，他就任用李志远（湖南长沙人）、邹品璜（湖南宁乡人）、祝兴国（湖南益阳人）、袁绥邦（湖南沅江人）等为盐务督察，任用洪宇刚（安徽人）、张大炜（江苏人）、张兼三（湖南人）、张崇岳（安徽人）、杜本渊（湖南长沙人）、柳仁（湖南人）、韩建夫（湖南湘潭人）等为科长、科员，任用黄登（湖南桃源人）、胡去非（湖南道县人）、陶自畊等为各县、市分局局长，又如，省调统处处长韩中石，是省党部委员，他有了这两个头衔便带了一些特务进去。当时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省政府社会处长必须由中统提名，省调统室就提出了刘修如，处长以下的人员，绝大部份是中统特务，如省调统室股员王开晋就调去当了科长，至于各县、市的社会科长，也是由中统指定的人员充任，如衡阳市政府社会科长徐志成。因此，社会科所管辖的民众团体如商会、工会、妇女会等等，都在中统特务的控制之下。此外，湖南各地的邮电检查所所长、检查员等，则由中统、军统双方平分，各占一半，甲县所长是军统的，乙县所长就是中统的。中统还增加检查员的人数，千方百计地利用省党部、省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等机关的名义，派出若干人参加

检查工作，这些人实际上早已经是打入到省党部、省政府第九战区的中统特务。又如各县、市政府的特种会报秘书，原来是由各地方政府负责人直接委派报请批准的，到1946年也被中统和军统夺了过来，由中统、军统分别派人担任。如衡阳市特种会报秘书就分给了中统，由李谧（湖南长沙人）担任。在司法方面，中统派一部份人到各个战区担任战地检查官，抗战结束，战区撤销后，他们又转到各省的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在湖南各地法院就有顾维翰、张道同、邵纯、张道衡、金瑞生、曹伟修、傅霖等10余人担任检查官和推事。

第二，利用政治关系和人事关系，以机关名义或私人关系介绍进去。第九战区经济委员陈大裕和第九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服务队队长张国藻等，就是由陈果夫向薛岳推荐而打入战区并任职的；又如省民政厅科长黄修罔是由省党部提名的，其它如省田粮管理处处长吴思敬、税捐处处长古铨、税务局的曾虎以及各县的教育科长等，都是利用各种关系进去并担任要职的，就连军统控制的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和侦缉队，中统也千方百计地打入一二个特务。中统对文教机关和大、中学校也不放过，如湖南大学的文振汉、克强学院教师唐聘（湖南零陵人）等都是打进去做特务的，各个中学和师范学校，也安排一二名特务做通讯员，省调统室还专派一人主管学校的情报工作。

第三，利用公私集股的办法，打入各个行业。如我与万骊、欧炳堃等聘士绅和商人为含章中学的董事，要他们负担学校经费，曾又荃（湖南衡阳人，衡阳市第一区区长）集资开办了私立达济小学，曾宪政（湖南衡阳人，衡阳市党部书记长）则控制了成章中学。1946年，我与曾宪政合伙，利用特务关系，夺取了一些救济物资，办起了《市民日报》，我担任社长，他搞发行，在各街道成立了推销处，强迫市民订阅《市民日报》。与此同时李运鹏开办了《中华时报》，钟少航开办了

《大同报》，李伯棠开办了《益世晚报》等。这样，我们就控制了全市的新闻舆论。此外，我们还集股投资办公司，如利用国民党党员自愿集股一元的办法开设了自强文化用品公司；靠帮会成员集股开设了国际贸易行和诚记智成公司；以特务占据码头的有利条件，成立了力行水陆运输行。并利用码头掌握了搬运队，姚宗汉做队长，独占了粤汉码头。我们还利用外省来衡的中统特务连振芷组成了安徽合众运输公司；陈世祺、周智安、肖启阶等开设了汽车运输行等等。又如朱正秉打入了中央银行，廖某打入了湖南省银行，曾醒吾则开设了钱庄，资磊掌握了市民银行，因而中统就控制了金融部门，并在其中发展了成员。为了控制经济界，韩中石又集股，在衡阳办了中州菲菲毛巾厂，我也入了股，并在厂里安置了一批特务。韩中石还利用华侨中的特务成立侨联运输公司，以特务头子陈杏庄为经理。此外，省调统室发动特务或三五合伙或独资经营百货业、棉纱业、绸布业、医药业以及开旅社、酒馆、茶楼等，还派人打入医院诊所、剧院、澡堂。这样，中统特务遍布各个行业。

排除异己与内部监视

湖南省调统室成立之时，就排除了在湖南的国家主义派（又名醒狮派），逮捕了首要分子周道，秘密送到南京去“受训”，接着，对胡汉民的新国民党进行了打击，如曾杰回湖南活动，他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常对人说：“你们称孙总理为国父，就应称我为国叔。”因此令人生厌，加上其基础不固，很快就被打垮了。最使省调统室费尽力气的，是对付汪精卫的改组派，如伍仲衡（湖南零陵人）、余如愚（湖南常德人）、朱道濂（湖南长沙人）等被陈公博派回湖南后，高唱民主，反对独裁，吸引了一部份青年，特别是那些因失业而住在长沙茅亭子的省党校毕业生，如刘恢汉、詹心邵、申造时、蒋程鹏、王则、

胡梦觉等还到各县去发展了势力，并选出了代表到广州开会，以后还在长沙新安巷创办了《民主》旬刊，声势较大。我在失业中参加了该组织，后来，担任国民党零陵县党务指导委员，仍继续为改组派工作。有一次，我在零陵苹州中学分校总理纪念周上，向全校师生作了“蒋介石做皇帝梦”的讲演，引起了该校教员贾文安、蒋薰琴的不满，他们电呈省党部，说我言论反动，主张将我撤职惩办，省党部常务委员谢祖尧对我说：“你现在是替谁做事？吃谁的饭？”我害怕撤职，为个人前途计，表示从此不再附和改组派，才算完事。也有许多人得到一官半职后，就不替改组派工作了，如伍仲衡被任命为湖南省党部委员后，就与改组派脱钩了。加上特务的分化和收买，改组派在湖南的势力也就瓦解了。省调统室经过上述一系列排除异己的活动，壮大了队伍，扩大了阵地，到1938年时，特务机构已遍及全省各区、县。同年冬，省调统室在耒阳成立了省干部会，1939年各区先后成立区干部会，各县、市亦相继成立县、市干部会，干部会一般由5至7人或9至11人组成，省干部会以排除异己为首要任务。在甲乙派斗争时期，何健利用乙派，排斥打击甲派，甲派虽然受到挫折，因为有CC作护身符，仍有较大的势力，复兴社（以后是三青团）到湖南来发展组织时，甲派轻视与排挤他们，他们便向乙派靠拢，而乙派正想在国民党中央寻找靠山，二者一拍即合。这样，乙派中就有人说：“你们甲派以拥护中央自居，我们乙派也有了拥护中央的牌子。”甲乙派之争，就变成了党团磨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兼任中统局长后，大刀阔斧地撤换亲二陈的特务，而以他的学生和小同乡代之，派来湖南任省党部委员的，竟有几位是拿到委任状后临时填表入党到差的。朱家骅还亲来湖南，指示三青团夺取县、市党务领导权。衡阳市三青团干事长肖新民就夺得了衡阳市党部书记长的职位，肖新民所任用的喽罗也尽是过去的

乙派。我当时是中统衡阳区主任，朱家骅到衡阳，去有没我欢迎他，却召开区、市干部联席会议，发动搜集朱家骅在衡阳市的活动情况上报。党团双方明争暗斗，蒋介石对此大发脾气，特派何浩若来湖南调解，何在耒阳乡下召开了党团员大会，他说：“你们都是拥护领袖的，已在总裁的领导下，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呢？你们是领袖的左右手，左手不要打右手，右手也不要打左手，领袖在党是总裁，在团是团长，办党务的要扶植团的发展，办团务的要接受党的指导，要同舟共济！”不久，日本人打来了，衡阳沦陷，双方的“英雄好汉”各自逃命走了，磨擦总算平息了一段时间。抗战一结束，磨擦又起，以衡阳市为例，CC任周异斌（湖南宁乡人，陈果夫的得意学生，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为市长，他到任后，把衡阳扩大为八个区，委任曾又荃、包毅、周石安等为区长，他们既是衡阳的老甲派分子，又是中统的区、市干部会的主要成员，湖南省党部也免去了肖新民的市党部书记长职务，另派万骊来接替，从此衡阳的党政大权，又为中统所掌握。当时，衡阳市区干部会联席会议决定选举杨晓麓、欧炳堃、曹润生、蒋勋等为市参议员，而这些特务受到三青团的攻讦很难当选。如杨晓麓在江东岸选区，遭到周友卿等三青团员的攻讦，岌岌可危，杨晓麓一日数次地要我想办法，我将三青团没有注意的苗圃（粤汉铁路管理局所在地）划为一个选举区，投票地址设在粤汉铁路工会内，还派出郭威等组织护卫队（实为打手队，三青团也有打手队）散在粤汉工会的附近，进行逡巡，防止抢票，因市政府不出布告通知，所以住在苗圃的铁路职工和居民，并不知道有什么选举。我指派在工会中的6个特务为杨晓麓赶写选票，写好后，就立即送到市政府验票，待三青团知道，想破坏也晚了。其他如欧炳堃、曹润生、周勋等，也在打手队的助威下当选为议员。市参议会成立后，又选举杨晓麓当了参议长，欧炳堃为副参议长。在长沙，

韩中石的立法委员，陈大裕的监察委员，以及各县的“国大”代表都是圈定的，但表面上还是进行了“选举”。韩中石去南京立法院就职前一天，在省调统室会议上说：“各地的选举，我们的人大都选了出来，干部会出力不小。”从此，党团磨擦进一步尖锐化，湖南省保安司令李树森曾到省调统室，以威胁的口吻对韩中石说：“你们的通讯员要一律退出学校，让三青团去做工作。”省干部会赶忙研究对策，决定采取更为秘密的活动方式，继续在学校做情报工作。

中统与三青团之间磨擦激烈之时，则拳脚相向，大打出手。界牌碗厂工会某理事被打得头破血流，由界牌抬到衡阳地方法院验伤放在达济小学休息时，我同钟少航去看过他。还有几个地方的区分部委员被团员喂狗屎吃，并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们一面要求地方法院以伤害罪拘办团员，一面派曾宪政等到南京向陈立夫求援，陈立夫说：“他们打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打他们？以打对打。”曾宪政回来传达后，我们也就大打出手。

省调统室对内部的监视，也是非常严厉的。1938年，徐子政在沅陵省调统室的一次会议上，说特务之间“互相防范和互相监督是必要的，但也不可能就万事大吉不出问题，只希望少出问题。”当省调统室由沅陵迁到耒阳后，他又说：“特务是可爱的，又是可恼的，可爱的是散布在各个角落，人多情报多；可恼的就是复杂不一致，不少人对外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对内彼此争夺，倾轧陷害，这种现象，非常严重。”1939年春，徐子政为了加强特务之间的监视，建立了直属通讯员制度，全省每个县、市派出直属通讯员一至二人，如零陵的李斌，道县的周家谟，雷复光，祁阳的雷一鸣，宁远的汤聘贤等，都陆续派为直属通讯员，要求他们对每个特务的一言一行都要详细报告，特别对所在地的主管特务，每月要有一次至二次的监视报告。又如中统派到湖南来的毛云（上海人）曾对我说：“对外我是织布厂

厂长，实际上，我对徐子政和韩中石进行监视，他俩有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对我说。”毛云跟我结成金兰之后，我便把徐、韩之间的矛盾告诉他，他就向徐恩曾报告。又如省调统室派某个特务执行某项任务时，就另派一个特务尾随其后，进行监视，过后又有第三个特务尾随第二个特务，这样，一个监视一个。徐子政在衡阳查封各银行仓库时，就叫我如此这般派特务监视特务。他说：“这是防止意外的好办法。”

星罗棋布的情报网

中统规定外勤特务以发现情况线索和扩大情报来源为主要任务，甚至花钱收买情报或采用其他手段也在所不惜。省调统室每月收买情报的开支，可以实报实销。我联系长沙新闻通讯社时，平均每天收到情报两件以上，报请发给的津贴，每月平均是五到六元。又如侦察桂系李、白割据广西的情况，曾利用大帮会头子屈荇鱼到桂林、全州等地进行活动，当时我也是参加者，搜集李、白在桂林、全州、黄沙河的防务情况和寓兵于农的民兵组织训练情况，以及李、白等上层军政人员的反蒋思想等。屈荇鱼返回长沙后，曾受到盛情款待。

省调统室将收集的情报，分为党派、政派、经济、社会、民意等十大类编成具报。如搜集的党派情报交特勤股办理，重要的由特勤工作研究委员会办理。如要破案，就派人去协助办理，衡阳《开明日报》案，派去了李中英，邵阳的捕杀案则派去了孙长植，长沙、衡阳、水口山等地的汉奸案和对长沙、零陵等地进步书店的监视，省调统室都派人介入和侦查。情报除了上报之外，有的也分送有关单位参考，但要视情况而定。为了讨好薛岳和对其表示中统的反共力量比军统要强，省调统室把党派情报都报送一份给九战区。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工作的特务，则以搜集贪污舞弊与人事调动的情报为主。在这方面，省

调统室往往大做文章，碰上贪污案发生而又与中统无关，就将情报复写多份，还加上“希望严惩”或“立即调职以平民愤”的意见，送给省党部、省政府、第九战区和案发单位，如江华县国民兵团一位副团长（团长由县长兼）因吃缺被省调统室知道了，报告了省政府，结果此人被撤职。倘若特务违法则不了了之，如道县县长周希洪，为地方恶霸，无恶不作，铁案如山，因周是我亲戚，省政府主管情报的彭立人把全部材料交我，要我调查核实，我以“查无实据”为之掩盖，使之仍然稳坐县长宝座。

在抗战期间，省调统室规定有电台的区每天要用电报上报当地物价变化和搜集的其它经济情报。特务作弊更为严重，往往窃取经济情报勾结商人来囤积居奇，如欧炳堃与商人合伙做投机生意，大发国难财。而包庇走私百货、颜料、粮食、鸦片烟和盗窃国家器材，从中敲诈勒索，分脏分肥者，更是举不胜举。此外，中统局在抗战之初要各省调统室收集民意情报，省调统室以尊重民意，关心老百姓生活为幌子，通令各地主管特务，加强了解民意，徐子政对我说：“收集的民意情报一定要表明民意的真实性，注明谈话人的姓名、职业、住址，对于谈话人的本地方言都要照实记录，以让真人真言真事的民情上达。”当时的民意内容，主要有：“国民党军队不抗日，不如把枪杆子交给我们老百姓去打日本人”，“国民党军队不在前方打，反在后方抢，我们不怕日本人，最怕二本人”（指国民党军队），“法币不如鬼神用的钱纸”，“物价涨得害死人”，“一年有十个月吃不到盐”，“穷人抽壮丁，有钱不当兵”等等。

省调统室对于情报的密写密送，也是挖空心思的，通令各地特务，采用米汤书写、碘酒洗现的办法或用暗语，共产党三字就以“何树”二字来代替等等。

省调统室的化名，用了一个时期就要更换，省特务室用“王明德”代，改为省调统室后用“楚实之”代，改为省调统

处后用“向必成”代。收情报的地址是长沙邮局第二号信箱，省调统室迁到来阳后，改为来阳邮局第二号信袋。以后为了使通讯更为秘密，就用一些成语、诗词中的一二句，用加减法编成密电码，凡属于通令各县的反共文件，都用密码译好，复写或油印出来后，才寄发到各县、市、区给省调统室的情报，一般用电台发出，因区都配有电台（僻远地区没有设专台），我在衡阳区所用的电台（台长王得培，江苏人）是与粤汉、湘桂两路调统室共用的，使用的密码各有不同，我用的有两本，交替使用，并且规定每半个月换一次。

此外，省调统室还设有秘密的交通机构，在全省范围内，分为水陆两路，陆路分为铁路交通与公路交通，水路为水上交通。由专管交通的制定交通袋，将情报装入后，在信袋口上加盖火漆盖印封口。铁路交通是与路调室合作布置的，公路交通是由打入公路局做职员刘恺（湖南衡山人）负责布置，水上交通则由长沙轮船公司经理蔡中白（湖南长沙人）布置。在通铁路和公路的地方以及有船靠岸的码头，都有秘密交通收交信袋，从没有遗失和错送。省调统室负责此事的史策（湖南南县人）编制了全省秘密交通网路线图，以便在交通阻隔时使用。如衡阳颜承元、蒋棣衡等人打入了衡阳维持会，然后他们把获得的情报供给衡阳潜伏小组领导人万骊、包毅等，万骊曾由衡阳南乡步行到战时的省会蓝山，当时，我已经离开衡阳，去担任战时省会的特务负责人，就将万骊送来的情报，选择有关的内容分送给省党部、省政府参考，并立即由电台转报沙田（省调统室和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在粤汉铁路以西的沙田，省党部、省政府、省参议会等机关在粤汉铁路以东的蓝山县，粤汉铁路全线为敌人占领，切断了东西联络，完全依靠电台互相联系）。

武汉会战后，中统在西南各省也设有秘密交通总站，由局本部直接管理，湖南交通总站设在衡阳濂溪街濂溪祠对面

的一家民房，总负责人高鹤年（上海人，早年是徐恩曾的保镖），他以“战时社会事业人才调剂协会衡阳办事处”作为掩护活动的机关（该机关总会设在重庆），高担任副主任，我是秘书兼代主任。总站的交通员，各佩上各不相同的机关证章，他们出发时，化装成商人边送情报边走私，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第九战区“精忠司令部通行证”。他们在火车、汽车、轮船上，都无人查问或检查他们的私货。这些交通特务，成了走私专家，在交通线上横行无阻。抗战胜利后，这个组织被裁撤。

外围组织的发展

省调统室成立了不少外围组织，最早成立的是“衡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以吸收青年学生、机关公职人员为主，抗战爆发后，又组织了湖南青年“铁血救国团”，以“铁血救国”来引诱青年学生参加，实际上是中统特务利用这个名目来“防共、反共”，企图发现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中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表示不满情绪者或思想偏激者，就视为“嫌疑”分子或“可疑”分子列入黑名单。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利用衡阳市工运讲习会同学通讯处作为外围组织，活动于各个民众团体和各个行业中，作用于宣传“防共”和扩大情报来源。

现将两个较大的中统外围组织的活动分述如下：

中国劳工协进社长沙、衡阳分社。抗战末期，徐恩曾（号可均，我们称他为可公）两次到衡阳，他提到他在交通部（他是中统局长兼交通部政务次长）组织了“中国劳工协进社”（简称劳协），要求各地组织分社。他在湘桂铁路管理局招待所召集衡阳、粤汉、湘桂三方面的特务负责人，提出要“加强和扩大劳协组织，一在交通中心城市成立分社”；要把地面上的职工都拉来加入”。抗战胜利后，中统局又来

电报要求“把劳协和帮会都作为外国组织，加强领导，培训骨干，扩大发展”。衡阳、粤汉、湘桂三铁路单位的特务负责人推举粤汉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徐锡巽（湖北人）负责筹备，在举行筹备会议时，李秀峰（陕西人）对到会的人说：“我们一定要体会到可公（指徐恩曾）的意图，加强组织领导就是要严密掌握上层，控制下层，扩大组织就是加速发展社员，由线到面，把地面上的各个码头工人和各个行业的工人，都争取过来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按照可公的计划，三年内全国的劳协组织和帮会组织联成一体，成为一个大组织，叫做中国工人党。”他又说：“国民党腐败无能，不费吹灰之力可取而代之，我们的力量，应放在反共上面，我们有把握把中国工人党建成中国最大的政党。”他最后一再提到：“这是可公的秘密，也是我们的希望，切不要对外宣传。”经过几次筹备会议后，就开始发展社员，姚宗汉在粤汉码头负责，王继尧在泥湾码头负责，陈云山（湖北人）在运输方面负责，张凤三（上海人）则在江苏同乡会中发展成员，因为李秀峰负总责，所有发展社员登记表，都直接由他收去。在最后一次筹备会议上，决定了理、监事人选名单，常务理事徐锡巽，书记李秀峰，理事董萌、王福阶、张蔚、董全义、姚宗汉、陈云山、曹建白；常务监事钟少航，监事曾宪政、罗宗度、曹润生、刘五畴、孔庆治、邹仲刚、张凤三、刘五之。接着就筹募建社基金，并派出钟少航、曾宪政等向市政府请拨学宫路原有的衡阳市总工会旧址（在衡阳沦陷时被炸毁）作为分社的地址，不久，衡阳分社成立了。长沙分社、郴州分社也在此时成立了。

在筹备劳协分社的同时，中统一再电令省调统室，要加强对青、洪两帮的控制，湖南的青、洪帮会，大部分为军统所掌握。唐乘骝（湖南衡阳人，军统湖南站长）在长沙组织了楚荆山，在衡阳组织了保华山，还控制了肖伯豪的锦宝山、赵元增的大华。

山、张海州的太行山、钟协和的天定山、黄春元的汉宝山等等不下数十个山头。中统仅有个别人参加了帮会。自从徐恩曾说要 将帮会组织掌握控制 在自己的手里后，省调统室才引起重视，蔡中白在长沙组织了五圣山，我也结交了帮会中的张子廉、汪志豪、方本立等人，还为张葆初的爱人（帮会中称为大嫂）捐募了一笔救济费，又以衡阳市党部名义聘请张建武、张树森、万里浪三人为衡阳市社会运动指导委员，我还送给张树森一个调查证，并介绍张建武加入了特务组织，让他填了党网登记表。尔后仇硕夫市长又委派他为衡阳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我以郭威为副队长，协助办理侦缉队的内外勤务。半年以后，衡阳青、洪两帮的大爷大哥，对我称赞备至。不久衡阳区干部会开会研究决定自行组织一个帮会。恰好这时蒋铁民（广西人，桂林五圣山山主）由桂林来衡阳，我们见面后，他表示愿意尽力组织五圣山衡阳帮会，因此，我将他们夫妇安置在珠江酒楼（以后改为国际贸易行），并献上鸦片烟，还让姚宗汉拨出白米70石作为见面礼。接着我让陈云山（湖北人）、郑华（广东人）、陈世祺（浙江人）、曹润生（湖南衡阳人）、赵侠峰（安徽人）、雷震（四川人）、万里浪（湖北人）、邹嘉霖等10多人与蒋铁民结拜为把兄弟，第二天还照像留念。蒋铁民在我的盛情招待之下，就去上海（临行又由郭威送去路费200光洋）找到向松坡领回智松堂的旗号和印信，衡阳五圣山帮会正式成立，蒋铁民为山主，我为名誉山主。我派出郭威、包毅、周石安、姚宗汉、吴在良、陈世祺、郑华等各负责一个山堂，我还派刘正盛到株洲，胡贞廷到道县，郭威派人到衡阳乡村，立堂收弟兄。又将李连城的中华山和张树森、张建武的青帮也拉拢为五圣山的同盟兄弟，为了统一掌握衡阳的帮会组织，在远东酒家成立“盟主会”作为帮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推举了丁子钦为盟主，唐汉臣为副盟主，周石安为秘书。对于加入衡

衡阳五圣山的帮会成员都发给一个证书，内印有恩承保荐四大盟兄（四大盟兄是恩兄向松坡、承兄蒋铁民、保兄张蔚、荐兄临时决定谁引荐来就填谁）还盖上他们的签名章；另一页又印有“信仰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国民党”，“服从蒋总裁”三条口号。衡阳特务利用帮会这个外围组织为非作歹，如1946年衡阳市选举参议员，就由特务、帮会双料货组成打手队保护选举，衡阳市参议长杨晓麓，副参议长欧炳堃，参议员曹润生、蒋勋、万衡、张席珍、费宏等，都是帮会打手打出来的；又如成立智诚公司，抢各种买卖和运输，以及争夺粤汉码头、泥湾码头、难民码头等等，都是以帮会作后盾的。

自从中统在衡阳发展了帮会组织后，军统便开始寻事挑衅，如借故争夺粤汉码头、难民码头、北门码头等等，打骂追杀之事，哪天都有发生。对此，我们采取你来我避，你骂我忍的对策。军统特务对此恼羞成怒。1947年10月，军统以湖南省政府保安处的名义，召开全省冬防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军统给我罗列了破坏衡阳社会秩序、妨害冬防治安的罪名。为防不测，我便离开了衡阳，衡阳五圣山帮会也因我出走而瓦解了。

二、特务训练情况

中统对于刚发展的特务，都要对其进行法西斯思想教育，保密和侦察等技能的训练，现将受训的一些方式介绍如下。

法西斯思想教育

初加入中统的特务，省调统室都要对其贯输一套法西斯思想，要他们学习“特务工作理论”、“内部工作”、“侦察工作”等小册子，此外还要学习陈立夫、徐恩曾的报告训词和蒋介石的言论集，以及叶青、张国焘之流写的反共小册子。按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是关于反共反人民的，大意

是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国民党中最杰出的优秀党员，共产党以共产主义赤化中国，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要反对共产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族。另外还编印了“中共的组织”、“中共的经济”、“中共的军事”、“中共党史”、“中共派系的活动”之类的小册子，对中共进行攻击。第二部份是拥护领袖方面的，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效忠领袖就是效忠党国”等等，并杜撰不少事例，说明领袖“神圣不可侵犯”，还说什么“雁有领袖，蚂蚁蜜蜂有领袖，人为万物之灵，更需要有一个领袖”，“希特勒是德国的领袖，他们是小国家，等于我们一个省，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的蒋总裁比希特勒、墨索里尼更为英明，更为伟大”。徐子政要求每个特务阅读“领袖言论集”，规定“只要提到蒋总裁，就要站起来立正”。第三部份内容是“为什么要有特务”、“怎样做特务工作”、“特务人员的修养”等等，还包括有陈立夫、徐恩曾讲话的小册子，其中有“特务是革命队伍的急先锋”，“特务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无名英雄”，“你们是三民主义的灵魂”，“你们是国家的保安队”，“你们是总裁的护卫队”，“你们是中国第五纵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为党国忠臣，死为党国烈士”，“防止异党活动是我们唯一的职责”，“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以组织对组织”，“拉出来，打进去，站稳脚，向上爬”等等。

训练特务的方法

省调统室从没有正式开办过训练班，总是利用别的部门出面或出钱来进行，他们或是介绍特务去做教师，或是使受训者变

为特务。如1939年，省党部组织了若干个工作队（队长一人，队员四人），分赴各区开办县党务干部训练班，如到零陵地区的工作队，先后在零陵、道县、永明（江永）、江华、宁远、新田、东安、祁阳各县开办了训练班，我以区主任名义同工作队成员曾到上述各县训练班去讲课，我们6个人中，有5人是中统特务。每到一个县，我们会同当地县党部书记长和中统调查员一起选调受训党员，中统特务总是优先受训。1942年，省党部在全省各个工厂开办训练班，也是采取抽调的方式，如衡阳便从每个工厂抽调三人，集中在黄茶岭的一个工厂内训练了10天，并且还在这个训练班发展了一批特务。1946年，省党部又在各地开办公运讲习会，从各个民众团体的理、监事和“优秀”会员中抽调2至4人参加学习。衡阳工运讲习会，设在达济小学，主办者全是特务，参加者也大多是特务或特务外围分子，他们毕业后，成立了衡阳市工运讲习会毕业同学通讯处，并挂牌在仙姬巷新华旅社（该旅社经理段代堃就是中统分子，也是这个通讯处负责人之一），段代堃、姚宗汉、王继尧三人每天都在这里办公，不仅从事情报搜集工作，而且还为劳协衡阳分社登记社员，以扩大外围组织。并派特务打入了由地方政府开办的保甲长训练班、社会军事教育训练班等。

1940年冬，省调统室从沅陵迁到采阳后，利用年终总结，举办全省特务骨干训练班，调各区区主任受训，我以零陵区区主任名义参加了，也有少数县调查员和个别“优秀”特务参加，整个省调统室的内勤人员全部参加了。由那些打入湖南公开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老牌特务，介绍工作“经验”，如彭立人讲情报工作，董萌讲组织工作，徐子政讲特务理论，孙长植讲特情工作，最后还请薛岳、廖维藩、巴壶天作精神讲话。上午是报告会，下午是讨论会，一共搞了半个月，在全省大规模地训练骨干特务，这还是第一次。

各个区的特务训练是分组进行的，5人至7人一个组，每夜以两小时为限，以一周为期，轮流抽训。1937年，长沙省会地区是按性质编组训练的，如邮检小组、新闻小组、党务小组等等。南京来的中统邮检特务鲍祝嵩、李鼎、余乐泉等人；由省调统室编为3个小组。长沙党政机关派来参加邮电检查培训的特务，由韩中石主持训练，着重研究拆信、偷信的方法和对于军统邮检特务窃取中统情报应如何防范等问题。1942年，我将中统衡阳区的训练分成若干小组，主要有社会小组（郭威任组长），进行侦察汉奸的技术训练；新闻小组（李运鹏任组长）进行侦查各报社中的进步人士和可疑对象的技术训练；1946年还成立帮会小组（周石安为组长）等等。我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进行思想训练和技术训练。各县的训练，采取个别谈话方式或按乡区进行集中训练。以平江县为例，县调查员洪皓荪将全县分为五个区来训练特务。方刚等负责训练东区，何其仁等负责训练南区，姚文华等负责训练西区，李益坚等负责训练北区，周立夫等负责训练中区。

特务的保密训练

进了特务门槛，都得接受保密训练。省调统室规定：中统内部情况一点一滴，都不能向外透露，包括对家里的人也不能讲，特务之间也不许谈组织秘密。徐子政常要求我们做到“我经手的文件，你不能翻阅，你经手的文件，我不能打听”，“你知道的不许对别人谈，你不知道的也不要向别人问”。徐子政还在省调统室每个特务的办公桌上，放上一个三角木架，两边都写上“严守秘密”四个字以提醒大家保密。为此，中统局还制定了一个惩治条例，大约有20条，凡触犯前8条者都得判处死刑，组训科长邵春林（湖南东安人，是老甲派骨干，经陈大榕介绍进省调统室的）看到这份惩治条例后暗暗对我

说：“他妈的，好厉害，我还是到报社里去写文章自由些。”

1940年，零陵县立中学发生的大火烧毁了校舍，姚雪怀、向实忠两特务捕来40多人，我只是提出了“是失火，还是放火，捕来的人是不是真共产党”的怀疑，姚雪怀便向徐子政打小报告，控告我“泄漏秘密”，徐子政马上赶来零陵，当夜就在陶家冲曾省斋家中召开省区干部联席会议，徐子政对我恶语咒骂，并撤了我零陵区区主任的职务，委了楚平（湖南常德人）继任，但处理这类问题，徐子政有时也有例外，1943年长沙轮船公司经理蔡中白在衡阳轮船码头唆使轮船上的人斗殴，并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特务，打了你，你去告状好了。”后来衡阳地方法院检查官邵纯（中统特务）起诉拘拿蔡中白，徐子政对邵纯说：“都是同志，注意办理。”最后还补上一句：“蔡中白真行。”当时我在场，便不服气地问他：“蔡中白公开了身份，泄漏了秘密，那是不对的。”徐子政答：“他是对外，不是打自己人，他敢我界限划得清，就是有点错，也可以原谅”。

三、中统特务的罪恶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省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省调统室唆使长沙大、中学校的职业特务，组织了湖南青年“铁血救国团”，创办了《前哨》半月刊，实际上是以以此来限制和影响进步学生。1937年12月徐特立回到长沙后，到处讲演，宣传救亡，受到民众的欢迎，前往求见徐老的青年学生，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要求到陕北去抗日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时省调统室派遣特务对徐老进行秘密监视，并侦查要求去陕北的青年学生。对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也派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小商贩的特务去侦查盯梢。1937年10月湖南文化界成立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会址设在长沙学宫街，全国有名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如薛暮桥、翦伯赞、吕振羽等当选为理事。该组

织由省政府每月拨出100元作为经费,即使是用于最低的伙食开支也不够。不久,省党部、省政府联合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贺醒汉(贺衷寒的哥哥)、周邦式、熊梦飞、李支、陈大榕、仇兴等10多人参加了,主张夺取文抗会的领导权,并决定每周星期六下午6时,在省党部会议室聚餐,餐后开会,陆续讨论通过了以下决定:一、改组文抗会,增加理事名额,如不能达到目的,就给予破坏。文抗会后来在青年会举行选举,由于特务捣乱,大会不能正常进行,到会的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了抗敌救亡,委曲求全地接受了他们提出的人选。二、文抗会内部人事,分为12个部,每个部都要有国民党党员任职。以后在文抗会的分工会议上,因此发生了多次争执,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又作了让步,我与仇兴分别担任了总务部长和副部长,掌握了该会的经济大权。三、文抗会每晚举办的活动,由国民党派专人负责。结果每次会议都有国民党方面的人出来争会议主席职务,许多民主人士从共赴国难出发谦虚忍让,不与他们争执,因此,以陈大榕担任主席的次数较多。四、对群众的游行示威,要多派特务参加,一部份去争取领导权,一部份去严加监视。但有一次文抗会组织领导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因秩序井然,特务无机可乘,无所借口,没有遭到破坏。

1939年,省党部、省政府密令各个机关团体成立防奸小组,省调统室指示在各机关团体工作的特务,成立5至7人的小组,监视本机关的“嫌疑份子”、“危险份子”和“活跃份子”,要求每个组员积极向组长反映情况,小组长将情况及时上报省调统室。湖南省党部还成立了湘西、湘南、湘东三个党务视导团,我参加了湘东视导团,该团负责人有陈大榕、仇硕夫、彭绍香三人,我担任组织干事。主要的活动,不是领导湘东人民抗战,而是坚持反共活动,制定联防反共计划,密令各县党部之间搞好联防,从而在湘东形成一个大联防网。联防分为沦陷

前与沦陷后的联防、政治与军事的联防等。在联防计划中还提出：不可能说服自首和收买做内线者，一律密捕、密讯、密决。

省调统室由沅陵迁到耒阳后，从情报股划出一个特情股，另成立特勤工作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杀害革命人士的机构，担任特情股长兼特情工作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的余进（湖南攸县人），曾利用家族关系密捕、收买了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员余某（家住在攸县城内），余某曾盗窃了中共湘赣特委油印的秘密文件送给余进，再由余进转送到省调统室。余某被中共湘赣特委处决后，余进又在醴陵收买了一名叛徒易成（湖南醴陵人），罗德钰（长沙区区主任）曾对我说：“长沙、湘潭、醴陵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被破获，主要得力于易成。”1940年，省调统室已经到处采取行动，密捕中共地下人员和迫害善良群众，孙长植（湖北人）对我谈起他与李中英（湖南耒阳人）曾协助曾又荃（湖南衡阳人）密捕过衡阳《开明日报》社内的中共嫌疑份子骆某等10多人，把他们关押在城外的碉堡里，进行审讯。他说：“案情没有结束，省调统室又派我到邵阳去协助卿国魁，密捕了一个青年，押在自设的密室里。我化装成看守士兵，向这位青年故意表示对现实不满，愿为他帮忙，这位青年信以为真，他就把中共邵阳地下党组织所在地告诉了我，并写了一张便条要我去通知他们同志‘立即离开，以免危险’，等我带人赶到那里，已是人去楼空，后来我们就把这位青年秘密处决了。”

同年，省调统室秘捕了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委员杨克波，韩中石到衡阳邀我去中州菲菲毛巾厂去看杨，韩中石边走边说：“杨克波在中共湖南地下组织内地位较高而个性极强，被捕后我和徐子政、孙长植、罗德钰轮流审讯，采取疲劳轰炸战术，但杨克波坚决不吐真言，不肯供出同伙的姓名，总说被捕时都走散了，我们采用怀柔政策，诱其叛变，也无结果。最后在

高压之下，他才秘密自首。他自首后，我们以他（指杨克波）的名义，开办了中州菲菲毛巾厂，并以他为经理，这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你这次来了，有时间就与他谈谈。”韩中石到厂，杨不敢流露不满情绪，以酒肉盛情款待。韩中石在工厂留宿，企图与杨克波作通宵达旦的谈话，以达到了解真情的目的。为了对付这一阴谋，由杨克波的爱人出面，找人陪韩打牌，让他多赢钱，一直打到天亮，韩中石离厂时杨克波又送了他成打的毛巾，但韩中石仍不死心，又派他的侄儿韩振球打入该厂，在经理室工作，以监视杨克波，但也无结果。衡阳沦陷前夕，杨回湘乡原籍，以后病死，始终未出卖同志。

省调统室以党政机关名义成立了全省的图书杂志审查处，并印了一份“查禁反动书刊一览表”（注明了书刊名称、著作者姓名、发行地址等），各书局的书刊要先送他们审查，否则，就不许发行。衡阳的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由仇兴（湖南湘阴人）负责，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经常看到成百的图书杂志堆在那里。省调统室还对进步书店进行侦察、查封，在零陵正中书局工作的特务黄启康（浙江人），被派到零陵生活书店去做侦查工作，他了解到该店经理、店员的情况以及销售情况后，报告了省调统室，省调统室派向实忠（湖南平江人）以零祁警备司令部的名义查封了这个书店。又如监视长沙新知书店的店员，省调统室便派出王含芳、欧阳纪珞等密捕了一位有进步言论的店员。省调统室还派特务冒充读者进行监视，以发现可疑份子。省调统室又指示邮检特务，发现要查禁的书刊，有多少就扣多少，对可疑的新出版的书籍，也可以扣压。所以各地的邮电检查所查扣进步书刊，都是整包整包的查扣。

抗战初期，省调统室对进步人士在湖南武冈创办的塘田讲学院，也密令特务注意侦查和破坏。1939年，我在零陵区负责，该学院的学生张震寰，同特务陈鹏（湖南零陵人）的弟弟同在塘田

讲学院学习，他们关系很好，学院放暑假，陈鹏的弟弟邀请张震寰到他家（零陵南乡）避暑，结果第二天就被陈鹏密捕送到了零陵县党部，经过我威胁利诱，他承认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我们胁迫他办理了自首手续。我对陈鹏说：“你弟弟打算到桂林蒋静一处去工作，让他俩一同去。”暑假后，张就同陈鹏的弟弟去了桂林，蒋静一（湖南零陵人，与陈鹏是小同乡，中统在桂林的负责人）让他俩参加了中统在桂林的邮电检查工作，蒋静一去重庆，又把张震寰安排在重庆中统局工作，半年后派他到湖南省调统室工作。

1941年，我到水口山铅锌矿局去，临行时，韩中石对我说：“水口山还没有调查员（原属常宁县调查室管辖），你必须物色一个。”我到水口山铅锌矿局后，住在矿局。矿局长陈崇鉴（字铁强，湖南湘阴人，陈嘉祐的儿子）特请我到大礼堂出席总理纪念周讲演会，我在讲演中特别强调限制异党活动是每个国民党党员的责任，工会必须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和搞好工人福利，这是限制异党的有效办法。并且要随时注意外来的人，提高警惕，不许有鼓动罢工的事件发生等等。通过活动，发展了宋焕章（长沙人），任命他担任水口山矿局调查员，又将矿局的陈凤九（湖南湘阴人）、党部的康慕群、康朝宗（本地人）、矿警队康汉操（本地人）等拉入了特务组织。从他们的报告中，我了解到矿山早就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其负责人住在矿局炮工刘则宽（本地人）家中，我就分别要党部书记长段念祖（河北人）、宋焕章、康汉操三人去找刘则宽谈话，进行威胁利诱，我与刘则宽谈话一次，以每月给他津贴作诱饵，他答应作内线；并介绍冯维羲和一个姓姚的工人作我们的内线。我给他们三人填了内线表（即特情工作人员登记表），要他们绝对服从宋焕章的指挥。后来宋焕章对我说，在他与段念祖、陈崇鉴三人的密谋下，杀害了中共地下组织派来的那位青

年。

中统还曾拿轰动全省的零陵火案大作文章。当时，因零陵县中距蔡家埠飞行场很近，日夜警报频传，还曾受到敌机的轰炸，为了安全上课，零陵县立中学就迁至零陵南乡乡下，租用民房上课，不到三个月，发生了火灾。校长汤孙（零陵人，湖南大学毕业，零陵三青团干事长兼校长）、零陵行政督察专员兼永祁警备司令姚雪怀（平江人，湖南大学毕业，是陈果夫介绍给薛岳的，曾在《洞庭波》杂志担任编辑）、专署视察兼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向实忠（湖南大学毕业，曾任中统零陵地区主任）、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贺醒汉和工兵学校政治部李科长（长沙人）等5人在此开了一个碰头会，认定是共产党火烧学校，后由汤孙、向实忠二人带队逮捕了纵火嫌疑犯42人，将余露沙（长沙人，县中音乐教员）、余庆湘（零陵人，教会普爱小学教员）、胡胃民（零陵人，县中学学生）等三人定为主犯，并决定处决。当时，我也想争一份功劳，侦查发现该校教员都自备有炉灶，此外，还有两家难民在学校内开了饭馆，很容易引起火灾，汤孙身为校长又不常在学校，仅仅每个星期一上午到校做总理纪念周，学校无人负责。因此，我判断学校是失火而不是放火，并将此告诉了姚雪怀、向实忠和军统派在零陵保安司令部任联络参谋的吴建树、中统老特务周洗正（零陵人）、中统零陵邮电检查所所长余乐泉等人，并说：“不应把失火说成放火，把假共产党作真共产党。”在特种会报会议上，姚雪怀、向实忠不同意我的看法，并斥道：“你刚刚当上区主任，没有经验，毛小子懂什么！”我开始也参加审讯（吴建树、余乐泉也参加了），发现余露沙口若悬河地供出全省的中共组织，好象他什么都清楚，我就表示怀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余乐泉、吴建树、周洗正同意我的意见，但姚雪怀、向实忠反对。我说：“假的就供不出真的，你二人把余露

沙的口供当宝贝，我是把余露沙的口供当狗屁。我声明：我退出审讯，不负任何责任。”姚雪怀恼羞成怒，立即向徐子政打小报告，控告我“自以为是，不顾大局，停止审讯，并在外散布谣言，泄露秘密，影响极坏，请速来制止”。周洗正也电徐子政：“姚、张各执己见，调解无效，盼速来解决。”徐子政赶到零陵后，与姚雪怀、向实忠进行了密商，到下午二时才与我和余乐泉、周洗正等人见面，他说：“要全面看问题，要顾全大局。”下午五时，即召开了区干部会，徐子政在会上说：“余露沙供出了全省的中共组织，全省各地正在进行捕捉，为首的江以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童子军负责人）已被逮捕，事成骑虎，就是假的也要当真的办。姚雪怀是果老（指陈果夫）介绍来的，不能给果老丢脸，中统局还来了嘉奖令，我们怎能收手？张蔚不顾大局，破坏审讯，泄漏秘密，应调回来阳反省。”我回来阳后，秘密地写出了《零陵火案的真相》，请我的拜把兄弟范觉非（湖北人，湖南省政府情报股长）转交薛岳，薛岳阅后批示：“①电零陵将余露沙等解来耒阳交党政军团会审；②党政军团各派员赴零陵查明事情真相。”省政府密电姚雪怀照办，姚复电省政府说：“案情重大，恐生意外，仍请留零审讯办理。”省政府再令姚雪怀：“限克日解来，不得延误。”姚雪怀慌了，他拿着已经油印成册的《余露沙之口供》对余露沙说：“现在要将你押到耒阳省政府去，为了挽救你，特将你的口供给你一份，以便帮助你记忆，我一定保证你的安全。”第二天，姚雪怀把口供缝在余露沙穿的棉大衣里。同时，向实忠就在余庆湘身上打主意，把一张填好了的自首表底稿交给余逐字照填，填好之后，向实忠只要填好了的自首登记表，而忘记收回自己所写的底稿。姚雪怀认为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就将余露沙等人押送省政府。当晚，省政府、省党部、省三青团、省保安司令部、省调统室、军统湖南站六个单位进

行会审。第二天继续进行，专提疑点，余露沙答不出来。在追逼之下，余露沙脱下棉大衣，从中取出一份口供，与会审席上的油印口供一样。大家又转问余庆湘，余也从口袋里拿出稿子说：“这是向实忠给我的底稿。”经过核对无误，大家又转问姚雪怀，姚雪怀面红耳赤，会审人就宣布审讯结束。徐子政、姚雪怀急忙赶到省调统室与韩中石密商对策，决定把这三人的秘密押解赴重庆，后来听说这三人在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

1946年，湖南的中统、军统联合组成省政府特种会报处，韩中石说：“这是为了扩大反共而成立的全省性领导机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反共的统一指挥；一方面使密捕、密讯、密决成为合法化，由政府批准执行。”韩中石将会报处分为总务、侦讯、行动等科，以后成立了感训室，实质上是一所法西斯的秘密监狱。我曾在1948年7月1日被密捕、密押、密讯，饱尝了“感训”的滋味。感训室由一个姓李的（长沙人，忘其名，军统特务）担任所长，孙长植任看守所法官，还有20多个全副武装的看守士兵。

感训室设在长沙褊庆街，是过去的陆军监狱旧址，共有五大间，每一大间又分为五小间，每间小牢房顶上开了一个拳头大的小孔；在房门的中间开了一个刚够伸出一个头来的小孔，大小便的臭气充满了房间，蚊子、臭虫多得吓人。我刚进去时是一人一间，不到一个月，受“感训”的人不断增多，由1人一间变成4人或6人一间。当时人数最多时有100人左右，从口音分，有上海的、山东的、安徽的、湖南的、湖北的、江西的、福建的；本省的又以衡山人、湘乡人、岳阳人、常德人、蓝山人居多。在这些人中，有30多岁的妇女，有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有50多岁的商人，有30多岁的军官，有中医医师，有不识字的农民，还有华侨。以后又具体地知道衡山县的廖书是因组织

中国劳动人民党被密捕的，李雪楼、程定坤夫妇是从安徽来湖南在湘西被捕的（后来程定坤被释放，住在长沙学宫街自治女校，李、程夫妇都是中共党员），还有一位从陕北回家在常德被捕的妇女等等。

感训室从进口处到小牢房，要通过五个关口，每个关口有门，每个门有一至二名枪兵把守。到了夜里，枪兵不断地来往于各个牢房之间，进行巡查，因为房小人多，闷热和臭气逼得我们每个人把头轮流从门中小孔伸出来换气，看守来了我们便把头缩进去，缩得慢一点的，便要受训骂几句。晚上7点钟后就不许说话，看守每晚都来窃听几次；听出声音，就要大骂几句。第二天清早，看守清查人数，出来迟一点的，要受到训斥。感训室规定大便一天一次，并限定时间，一次三人，一批一批地轮换。因此，许多人在牢房里自备瓦罐子，在轮流大便时，就去倒一次。生活更差，每天开饭两餐，每人只两小碗饭和一碗盐水。我一再央求允许我写信给家里，均遭到他们的拒绝。我当时是以“背叛组织，投降异党”之罪被捕押的。50多天后，中统局派来了两个特务，对我不停地审讯了两整天，逼我交出1947年在衡阳参加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他们无中生有，我又哪来口供？结果不了了之。

中统、军统的特种会报，就是换行三密政策（密捕、密讯、密决）的主谋机构，他们利用湖南省干部训练团，开办了特种会报训练班，然后改组各县、市政府特种会报会议，把各县、市政府的会报秘书，定为专职，由省政府特种会报处派员充任。

在省干训团会报班负总责的是陶一珊的拜把兄弟王强毅（湖南衡山人），他主办了一期，受训的中、军统特务约80人。派来衡阳担任市政府特种会报秘书的是李谧（长沙人，中统特务），李一到衡阳，就来见我，他说：“过去各地特种会报秘书，由

主管随便派人，现在就不行了，自上而下都有统一的规定。最高的特种会报会议，由军统或中统负责召开。除了各级政府的会报会议由各级政府负责人召开外，军事机关也自上而下地设立了这一机构。并规定出席人员一律要用化名，记录簿上不许用真实姓名签字，会议记录归档等等由特种会报秘书统一办理。

衡阳共有三个特种会报会议，我都参加过。一个是市政府仇硕夫市长主持的，一个是县政府王伟能(湖南攸县人)县长主持的，一个是驻衡阳陆军二十军杨干才(四川人)军长主持的。每半个月举行会报会议一次，会议共有文件报告、交换情报、讨论研究、决议事项、临时动议等内容。上述军政机关所召开的特种会报会议，都执行密捕、密讯、密决政策。如对衡阳黄茶岭居民王树(湖南零陵人，其父亲在零陵做古玩生意)，杨干才在会报会议上说：“王树不是衡阳人，又无职业，家住郊外，又不常在家中，有共产党嫌疑，因此，已被密捕密押，应如何处理，请诸位发表意见。”与会者通过讨论认为他有嫌疑而证据不足，决定继续侦讯。过几天，永属同乡李廷干(湖南宁远人，衡阳万国商场经理)陪同王树的爱人来求我帮忙(我当时兼任永属旅衡同乡会理事长)，我以这事是军队干的，我说不上话为由拒绝了她。有一次，杨干才在会报会议上说：“《衡阳建报》社社长段琴子(湖南衡山人)、编辑罗治国(湖南零陵人)等经常在报上败坏我军声誉，造谣生事，有共党嫌疑，这样的人有一个我就办一个，有两个就办一双，何时密捕他们，请大家决定。”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曾宪政、市政府社会科长徐志成借小便之机离席商谈，曾说：“杨干才搞文字狱，如惩治他们说不过去，若不同意，又得罪一个军长，怎么办？”徐说：

“碍于情面，先通过再说。”散会后，他二人把这一情况告诉我，我说：“段琴子得罪于杨，咎由自取，交我们处理后，再想法敷衍杨干才，搭救段琴子。”过了一天，二十军政治部秘

书孔庆治（江西人）在段等被捕后，与我们研究决定把段琴子解送长沙，我派特务郭益三（衡阳人）等两人随车押送，我还交郭带给韩中石一封信，说明段琴子被捕的原因和把他解省的用意。段在长沙监狱关了好几个月，才被释放。又如衡阳市政府举办的某次特种会报会议，曾造成空前未有的血案，使5个和尚死于非命。那次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曾宪政、市警察局彭局长、宪兵队陶队长、市政府社会科长徐志成、市长仇硕夫，我代表中统出席，军统代表姓名忘记了。会议由仇硕夫主持，徐志成报告案情经过，他说：“据市警察局报告，有5个来自北方的和尚，在市区借化缘为名，打听军队番号，东张西望，形迹可疑，已被密捕，我多次审讯，他们也不开口，连出家前的俗名也不肯说出来，我与仇市长两量，认为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请予密决。”尔后，我们看了市警察局给市政府的报告和徐志成审讯的口供，感到奇怪，口供上除了和尚的名字外，什么也没有，但我们一致决定将他们密决，并报请武汉行营批准。半月后，行营来电批准，市政府特种会报会议决定由宪兵陶队长于北门城外附近的小山上执行密决计划。第二天陶队长对徐志成和我说：“5个和尚被带上山后，问他们有什么说的和要求，竟无一人回答，就把他们一起枪毙了。”

湖南临近和平解放时，特务更加疯狂地杀人。我准备离开长沙时，我一位亲戚何兆兰（湖南道县人，克强学校学生）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同学，因思想进步，突然失踪了，经过多日的寻找，才发现被杀害于郊外小山上，尸体已腐烂。”我由长沙到衡阳时，包毅对我说：“省调统室派王含芳亲自密捕了粤汉铁路管理局一个职员，并将他密决了。”这种事在当时时有发生。

省调统室对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也多方监视，如进步记者董岗，到了衡阳，中统新闻界的负责人李运鹏（安徽人，《中华

时报》社长)两次威胁蓝岗说：“不离衡阳即有情况发生”。蓝岗被逼得不敢在衡阳停留。又如衡阳《大刚报》编辑羊枣，当时也陷入了特务的包围之中，打入《大刚报》做记者的特务曹定远(衡阳人)、崔明春(河南人)，说羊枣是一个普罗文学作家，使其遭到搜查。羊枣在卧室里从事翻译，很少出门，也引起他们的怀疑，崔明春千方百计地找机会进入他的房间侦查，逼得羊枣离开衡阳到广州去了。但羊枣不论走到哪里，徐子政都有电报跟到哪里，徐对曹定远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好，羊枣到广州、福建，就由那里的特务监视。”又如崔明春发现另一个侦查对象后向我汇报时说：“羊枣离开衡阳《大刚报》以后，又在报社里发觉欧阳柏有可疑行动，也成了我们监视的重要对象。当欧阳柏家中来有外人坐谈时，我们就去窃听，并且利用报社人事关系，还发展特务加强对欧阳柏的侦查，并把每次听来的情况向曹定远汇报。”衡阳沦陷前，《大刚报》迁走了，曹定远也离开了《大刚报》社，对欧阳柏的监视才告结束。

特务对被捕者施加的种种酷刑，惨不忍睹。如零陵的黄溪庙，被姚雪怀、向实忠两特务强占作为秘密监狱。祁阳县基督教循道会牧师张茂森的儿子张伯梅，年16岁就被扣上共产党嫌疑的帽子，监禁在这个庙里，以后又转解来阳监禁两年，由于在狱受尽酷刑，释放回家不久就死了。还有一位姓王的女人也关在那里，受了不少苦刑。有一个夜晚，我与余乐泉在庙里参加审讯中国银行某职员(因搞读书会将被关押)，要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说：“我不是共产党人，怎好承认呢？”向实忠眼一横，就叫武装士兵把这位文质彬彬的银行职员，悬吊起来，他昏迷后，向下令放下并叫士兵用冷水泼其头上，待他醒来，又把他吊上去，最后又让他坐老虎凳，迫使他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

四、特务汉奸同流合污

省调统室在抗战初期，一再通令把侦查汉奸作为中心工作，因而，我们在侦查和破获汉奸组织方面也作了一些工作。如长沙日本领事馆某秘书的全家被逮捕，省会金瑞生等拒绝了汉奸的贿赂和美人计等等。又如侦查日本某洋行经理的所谓干女儿，该经理离长沙时将她潜伏下来，省调统室派何身杰（长沙人）打入侦查，也没有为女色所迷，还取得了一些情报。长沙大火前夕，这个女汉奸，被军统暗杀于水陆洲。但后来特务与汉奸同流合污，共同作恶。衡阳汉奸电台一案就是明证。衡阳市受到敌机两次大轰炸，我们发现军用物资经过衡阳时，就遭到轰炸，有一次，我们故意散布假消息，也有敌机来骚扰。我们为此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衡阳湘桂、粤汉两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军运司令和路调统室主任刘华黎（广东人）、董萌（安徽人）与衡阳飞机场场长等出席了。与会者一致认为有潜伏的汉奸电台存在，并决定尽一切力量，迅速破案。会后，侦察四出，经过几天几夜的侦查，查出衡阳北门外天主堂内设有汉奸电台，该案由郭威（衡阳人）派人打入天主教堂而破获。我们向省调统室报告请示，韩中石回电说：“正在研究，未作决定前，切勿行动，以免意外。”基于这个指示，特务对于侦查这类汉奸案，也就三心二意了。如衡阳江东岸陈重友等某夜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一个女汉奸乘敌机凌空时打信号枪，并不逮捕她，却等到解除警报后才去搜索追寻，结果她已逃得无影无踪了。过了几个月，常宁县调查员转来松柏乡的报告：“发现一个外地女人只身到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务局，与矿局职员张瑞霖（长沙人）租佃民房同居，形迹可疑。”省调统室装腔作势地派我去侦办，我到了水口山矿务局，张瑞霖对我说：“她是安徽来的难民，不是汉奸，全家走

散，流落来此。”我仍然会同矿局的矿警队陈队长（湖南湘阴人）进行侦查，我俩还与这女人见面谈了话，但军统湖南站突然派来便衣武装，并不通知我，竟于深夜把这女人绑架到长沙去了。后来经韩中石与军统交涉后才知道那女人就是在衡阳火车站打信号枪的女汉奸。

零陵区破获周佛海、罗君强等布置在祁阳的汉奸组织案又是一例。他们是以会计事务所进行掩护的，为首的是王绥之（零陵人），汪精卫在南京当汉奸后，他就率领10多名汉奸（江苏人占一半）来到湖南，一部分住在祁阳，一部分住在零陵三贤祠街。我们发现这些人发往上海、南京、浙江的信件很多，便通知邮电检查所严加注意，以取得证据。余乐泉（安徽人）发现了王绥之寄给周佛海的亲笔信，用照相机摄下后，仍让寄出，周佛海、罗君强给他们的来信，也翻拍下来，内容涉及后方的军事、经济、交通等，表面看是些普通的信，实际是一份份情报。我一边报请省调统室批准破案，一边派人把祁阳、零陵两地的汉奸尽数逮捕。审讯之后，他们对自己的汉奸行为供认不讳，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希望从严惩办这些汉奸。王绥之竟能通天，向陈果夫求援，陈果夫来了两个电报，一个电报给省调统室，大骂省调统室不应逮捕他们，应立即把他们释放；一个电报给姚雪怀，把姚也大骂一通，并要他立即放人。轰动一时的大汉奸案也就烟消云散了。

特务是汉奸，汉奸即特务，省调统室里的人也不例外。如丁楚平（常德人，丁默邨胞弟），中统邮电检查训练班毕业，1937年派来长沙，在西长街邮局担任检查员。曾在省调统室韩中石领导的邮检小组学习过，与韩中石来往密切。长沙大火前夕，被韩中石派为零陵邮电检查所所长，他即与姚雪怀（零陵专区专员兼祁永警备司令）、向实忠（专区视察兼中统零陵区分主任）沆瀣一气。在向实忠和我担任零陵区分主任时，他以

区干身份参加区干会议，他利用邮电检查所所长的权力，秘密地为丁默邨搜集情报，从没有人怀疑过。王绥之汉奸案被发现后，检查员余乐泉（安徽人）才开始注意他，发现他经常关上门写东西。余秘密地检查其来往信件，查出了丁楚平写给丁默邨的信及丁默邨的回信，他先后抄录了10多封，内容是与抗战有关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难民逃难等方面的情报，还有一封信要求全家到南京去，丁默邨回信完全同意。丁楚平收到这封信后，神态非常不安，到处借钱，打算逃走。我得到余乐泉的报告后，就派特务把丁楚平扣押软禁，经我与他谈话，他承认以上事实，但他又说：“我哥哥丁默邨是老中统，不是汉奸，我去也不是做汉奸。”我向省调统室请示处理办法，韩中石回电说：“①解除丁楚平的拘禁，派人对其监视；②撤除丁楚平的零陵邮电检查所所长职务，余乐泉继任。”丁楚平被撤职后，反映生活困难，姚雪怀、向实忠一再向我提出，安置他到零陵伤兵之友社工作，我也答应了，从此他便逍遥法外。零陵县立中学火案发生以后，我的零陵区区主任一职被徐子政撤免，韩中石政派了楚平继任。1947年，我被迫离开衡阳，王含芳继任区主任职，不到半年又调丁楚平到衡阳继任，直到解放前夕。

省调统室对于汉奸的包庇纵容，导致上行下效，沿习成风。1945年9月，我从战时省会蓝山赶到衡阳，参加衡阳敌伪罪行调查委员会，并担任委员。该会向各地派出清乡委员，我默介绍曹润生等担任了此职，以后又派出郭威当清乡委员，在各地将伪维持会和便衣队的组织、成员、罪恶活动，详加调查，实际上是一面调查，一面包庇。如板桥维持会会长李某，就在郭威包庇之下，由我道过衡阳高五分院，免于起诉处分，郭威这一批下乡特务，敲诈李某给他们送一套棉布服装，也送了我一些金钱和礼物。又如衡阳西乡某地维持会长肖启阶（衡阳西乡人）为包庇在衡阳开设了一个杂货商店面受到包的庇护，以

后又在环城南路同邹智安（长沙人，中统特务）等合伙开设运输行。再有颜承元、蒋棣衡（湖南衡阳人）等由包毅作为衡阳区（衡阳沦陷前，我撤退到蓝山，我的区主任职务，托包毅代理）派入衡阳市维持会的内线，他们为虎作伥，高五分院也证明他们不是汉奸，对他们不起诉不给予处分。我到衡阳，也庇护了《中华时报》社长李运鹏介绍给我的一个广西某县的维持会长杨西平。我当时在衡阳与衡阳警备司令黄汉英（湖南祁阳人）因庇护汉奸发生了矛盾，他要逮捕的汉奸，我要包庇，我要逮捕的汉奸，他要包庇，双方经过几度协商，互相勾结，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如黄汉英日夜派人追捕鲍铁夫（长沙人），经我向黄汉英提了一句：“老朋友，这是我的人。”鲍铁夫也就不再躲躲藏藏，东餐西宿了，鲍铁夫给了我不少好处。我还为曹润生（衡阳人，衡阳区干特务）解决了全家的住房和他的律师办公用房，都是强占鲍铁夫的。又如黄汉英已经捕押的一个汉奸（忘记姓名，是一个绸布商人，是万骊手下的一个特务），我以该特务是打入维持会的，要黄汉英释放了。我对于军统和黄汉英包庇的敌伪汉奸，也给予关照，包庇之风也给县、市的特务带来了敲诈勒索的机会，当时湖南高等法院成立各地分院是为了惩治汉奸，在衡阳成立的是第五分院，省调统室千方百计地派曾宪政（衡阳市党部书记长）兼衡阳高五分院书记官，并暗中指示他：“属于中统特务而当过汉奸便衣队的，一律作为是派去收集敌伪情报的。”包毅、钟少航、郭威、张席珍、费宏等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也大捞了一把。

五、特务内部的倾轧与腐朽生活

省调统室的特务大部来源于湖南甲派分子，因此，特务之间互相欺骗，争权夺利，矛盾激烈。1938年中统零陵区主任向

实忠与省调统室委任的零陵县党部书记长蒋程鹏，为争权夺利双方互相诽谤，省调统室调解多次无效。向实忠在逮捕汉奸王绥之时，也控告了蒋程鹏（王绥之是蒋程鹏的岳叔），还把零陵县党部组织科长王则（零陵人，中统特务，蒋程鹏的内兄，王绥之的侄儿）等人都逮捕入狱。又如道县有周派、何派的对立，我属于周派（以周霭党为首），胡去非属于何派（以何鸣皋为首），我与胡都是中统特务，为了争权夺利，双方斗争非常激烈。胡去非提出何派的陈光祚担任县调查员，我将陈挤走，而委周派的唐光旭担任此职。再有祁阳县的中学系与师范系两派都有人加入中统，双方斗殴之事，不断发生，县党部若委任中学系的人则为师范系的人所反对，委任师范系的人为中学系的人所反对，省调统室只好以上海人余金涛、浏阳人周旻等外地人去做教育科长兼县调查员，结果在祁阳形成既不属于中学系又不属于师范系的第三势力。衡阳特务的内部矛盾，也是极其复杂的，有以杨晓麓、钟少航为首的一派，他们向政治方面发展；有以万骊、曾宪政为首的一方，他们向党务方面发展，双方培植党羽，争权夺位。1946年，万骊与曾宪政又分了家，各树一帜。

省调统室内的特务，矛盾也十分突出。有以徐子政为首的外省派和以韩中石为首的本省派，他们互相拉拢特务，互相倾轧控告。韩中石从耒阳跑到衡阳把控告徐子政的诉状写好了要我盖章，徐子政也跑来要我控告韩中石，区以上的特务，几乎都为韩拉过去，我考虑到自己是湖南人，就拒绝了徐子政的拉拢。徐子政到重庆后，对我多次控告，进行报复。当徐恩曾两次调我到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受训时，徐子政都设法挤掉了我。

湖南甲派中的中统头目之间也常常勾心斗角。陈大裕以衡社为中心拉拢一部分特务接近韩中石，加上陈、韩同是湘潭人，

勾结更紧：曾省斋以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为中心拉拢一部分特务接近徐子政。在人事安排方面，陈大榕提名的是党务方面的人，曾省斋提名的是文教方面的人。如税捐处长一职，徐子政提外省人古镗（广东人），韩中石提本省人余进（湖南攸县人），韩中石把徐子政安插在省调统室的特务几乎都排挤走了，尽补用湘潭人，连他的侄儿韩建夫和他的小老婆也被安插进来，当时有不少特务把省调统室称为湘潭同乡会。

湖南各区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如罗德钰占据了长沙区，后当他选为长沙市参议长而辞去区主任职，省调统室派别人去接替，他不办移交，最后只好委派他的助理杜本渊继任。1947年我被迫离开衡阳后，王含芳继任，也没有一个特务上他的门，王含芳控告我说：“张蔚走了，把衡阳特务的心都带走了。”省调统室派胡念榆（长沙人）到衡阳调查后报告说：“张蔚在衡阳的各方面，都有他的潜在势力。”因此，韩中石就把王含芳调到邵阳区，面委丁楚平继任，目的在于排斥我所组织的特务势力。

省调统室一方面承认内部矛盾，一方面又认为中统的势力很大，已深入到各个方面，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赖琰（福建人）到湖南担任省党部特派员，在长沙就有了“拥赖团”和“反赖团”组织，我当时是省党部视察员，参加了“拥赖团”。徐子政、韩中石对我说：“在拥赖方面和反赖方面，我们都有特务打入，因此任何一方取胜，都有我们的一份。”

省调统室的特务在生活上是十分腐化的。如1939年徐子政由省调统室主任提升为湘粤桂总督导，韩中石由书记升为主任后，徐子政因办公用具缺乏就经常派人到省调统室去揩油，韩中石不买账，对来人说：“总督导最好是搬来一起办公。”又如徐、韩两家，每晚都设有赌场，采取“三光政策”（钱光、天光、人光）来聚赌抽头。徐子政要拉特务到他家去赌，韩中石也拉特务到他家去赌，弄得不少的特务左右为难，我因为

在外面担任区主任，每月回来一次，我是双方都不得罪，每家赌上三晚就走，令人受不了的是任何人上了桌，就很难下得桌，钱不输光，天不大光，人不走光，赌就散不了。徐家是如此，韩家也是如此。

徐子政、韩中石两人都讲究排场，也显得非常大方，但就是要别人掏钱，慷他人之慨。如1942年，中统局副局长顾建中等人路过衡阳去重庆，徐、韩二人令衡阳特务举办欢迎晚会，并把盐务方面和湘桂、粤汉两路的特务邀来作陪，互相敬酒干杯，宾客尽欢而散。做主人的徐、韩二人，并不付钱，统归衡阳几个有钱的特务欧炳堃（衡阳市商会理事长）、曾醒吾（百货商店兼钱庄经理）、戴石渠（从事棉纱批发兼营旅社）、段和声（绸布商）等支付。从此，中统局组长一级官员经过衡阳的一切招待费，都由欧炳堃等包了下来。徐恩曾在1943年和1944年两次到过衡阳，他来湖南的目的是看看从上海移到湖南祁阳由他独本经营的中兴铁工厂，了解这个铁工厂承包修建的衡阳铁桥能否如期通车的问题。徐子政对他大肆吹拍，徐恩曾到哪里，他就集合各部门的头头跟到那里。特别是在长沙去衡阳的船上，蔡中白（轮船公司经理）在徐子政指使下，大放浏阳鞭炮，表示热烈欢迎，从长沙到湘潭足足放了几个小时。徐恩曾住在湘桂路管理局，徐子政白天黑夜都在那里侍候，不叫他回去休息便守到半夜才走，晚上的保卫由湘桂路特务负责，白天由我派出特务20人担任保卫工作。徐恩曾的保镖谢锬早就到了衡阳，同我住在一起，徐恩曾走后，就把谢锬留在湘桂路调统室，衡阳沦陷前，谢随湘桂路室逃到桂林，在去六寨的火车上失踪，事后查明是湘桂路调统室的一个特务为夺取他的手枪而把他诱到车站附近的乡村打死了。

粤汉铁路沦陷后，韩中石逃往粤汉铁路之东的沙田，黄登逃窜至粤汉铁路之西的蓝山，尔后双方电商，韩中石支持黄登以

湘南盐务局长名义，征收战时盐税，每担食盐抽收1.5元。我还介绍我的亲戚杨雨荪（湖南道县人）为收税主任，何庆朴（湖南道县人）为收税员，此外还介绍税警10多人。1946年，黄登在长沙通泰街某巷内以韩中石的名义修筑了一栋小洋房，又在南门外以李熙元的名义购买了几百平方的地皮，送给他们，以示酬谢。

中 统 成 员 的 来 源

中统分子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蒋介石浙江官僚系统中的嫡系，徐恩曾、叶秀峰、朱家骅等属于这一官僚系统。

二、蒋介石收买的叛徒，如红九军的叛徒何畏（后改名为何云）、红二十六军的叛徒杜衡和陈建中等属于这一类。

三、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中央政治大学）和中央军校的毕业生，经陈立夫、陈果夫选到中统来的，如谢永存、王思诚等属于这一类。

四、在各大学毕业生中选用的，如项本善等属于这一类。

五、从反动帮会以及国家主义派、改组派的“行动”特务传入中统的，陈庆斋、庆玄等属于这一类。

六、中统自办的青干班、侨训班等培训班的毕业生。

七、由私人介绍成为中统特务的，如童世纲、胡祥林（朱家骅介绍）、邓纫（刘建绪介绍）等属于这一类。

（文 贵）

中统在郴县活动记略

周仪章*

郴县原是湖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郴县专区）所在地，该区的国民党调查统计室就设在国民党郴县县党部内。受该室联络指导的地区有第三行政区所辖的郴县、桂阳、宜章、资兴、永兴、临武、蓝山、嘉禾等县。在这几县中，又以郴县、宜章、临武等县为重点工作区，他们认为交通线和厂矿区是“异党”活动的主要场所，所以对这些地方特别注意。

1941年11月，该地调统室主任谭振因工作不力被免职，继任者为道县人张蔚。我当时在郴县县党部从事妇运工作，我们两个机构在一起办公，对于他们的活动情形，略知一二，现概述如下。

张蔚接任后，第一步就是大力发展组织。在郴县作为骨干分子吸收的特务计有：郴县县党部书记长龙元章、秘书廖志信、社会干事王丕承、组织干事李某（忘其名）、郴县政府科员黄亮、邮政局长欧某（忘其名）、警察局长吴笃山等人。除在县城机关、学校发展外，还在各乡镇发展了一些人。郴县共有16个乡镇，每乡至少发展了一二人，吸收特务达五六十人之多，“成绩”是可观的。

第二步是加强邮电检查，由县政府科员黄亮负责。来往的信件一般都要经过检查，他们特别注意靠近解放区和八路军活动地区寄来的信件。在检查中，只要发现稍有进步倾向，收信

*周仪章曾在国民党郴县党部工作。

人就会受到监视。有一次，郴县县政府统计科员黄崇明和一位在部队的政工人员通信，因对方来信中言论比较激进，黄崇明也就成了“可疑分子”，黄无可奈何，只得辞职他去。

第三步是检查书店，防止进步言论传播，并从中打击“异党”活动。他们经常派人到各书店明察暗访，如果发现出售了进步书籍，就要受到怀疑和监视。有一次，他们在县正街一家书店（该店的老板黄某是自首变节分子）发现几本鲁迅著作，特务们认为其中大有问题，不久，又发生了张蔚家中失窃事件，他们就更怀疑黄某是共党嫌疑分子，黄某闻讯，星夜逃走，特务便把书店查封了。

中统特务虽时时喊防止“异党”活动，但对“异党”有一种恐惧心理。在1942年4月间的某日，张蔚外出打牌，通宵达旦，次日回来，发现门锁被人扭开，财物被盗，这本来是小偷所为，但张蔚却大惊失色，认为这是“异党”在捣乱，很多人因此被怀疑和遭受迫害，上述的黄老板便是受害者之一。

防止“异党”活动实际上成了中统特务敲诈勒索的盾牌。他们在各交通要道都设站“检查”，经常借口来往旅客有“问题”，趁机敲一笔竹杠。有一次中统特务在郴县良田检查一位过路盐商，大约认为有财可取，说他有“异党”嫌疑，不明不白地把他扣押了几天，还把财物没收了。那个商人深知“财退人安乐”的道理，不但不闹，还叩头谢恩而去。

中统特务的活动可说是无孔不入，尤其对厂矿、学校特别注意，他们认为这些地方“异党”最为活跃。如资兴毗邻广东，该县桥口有一中学，为了加强工作，张蔚特派骨干欧阳和（曾任郴县县党部秘书）到该校任教，实际是从事特务活动。

中统郴县区只有一个光杆主任，工作都是由一些骨干分子来做的，如果要采取什么行动，就得会同当地党、政、军共同实施。但彼此之间，各有各的打算，既互相利用，又互相争斗。

如当时的专员肖文铎要处决一个人，高兴时，他也事先和调统室及县党部商量一下，否则招呼也不打一个。又如原郴县县党部保和乡社会服务站王丕承，平日说话喜欢放大炮，对当时专署稽查处の特务在外敲诈勒索颇为不满，多加抨击，因此特务们怀恨在心，企图报复，但无机可乘，后来竟想出毒计一条，向肖报告说“王是‘异党’分子，在外大肆活动”，肖也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县党部打招呼要摘掉王，县党部不同意，最后肖谎称说已掌握了王通“匪”的确凿证据，非杀不可，但县党部仍然不同意，并把王调回县党部任社会干事，直到王参加了中统，此事才了结。

张蔚在郴县任职一年后，成绩卓著，受到嘉奖，就调到衡阳去了。

保密局成立时的组织机构

局长：郑介民（兼）；副局长：毛人凤；局长办公室主任：黄天迈；第一处（情报处）处长：何芝图；第二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第三处（人事处）处长：郑修元；第四处（电讯处）处长杨震裔；第五处（司法处）处长：李希威；第六处（经理处）处长：郭旭；第七处（总务处）处长：沈醉；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严佛；督察室主任：廖华平；总稽核室总稽核：张冠夫；预算室主任：朱光斗；机要组组长：姜毅英；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组长：瞿梦秋；特种技术研究组组长：刘绍复；布置组（1948年设立）组长：赵斌丞。

（贵 编）

湖南的特务机构湘站的发展和活动

黄德曾*

1933年10月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在长沙成立湘站特务机构，由吴昶充站长。当时南昌行营谍报科由邓文仪负责，邓系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当时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学生在湖南部队任职较高者有：第三期毕业的蒋肇周，他任陆军第六十三师特别党部书记长；第五期毕业的罗念前，他任陆军第十五师特别党部书记长；其他尚有黄代兴、甘维奇等，此4人均是当时复兴社湖南分社的核心成员，黄代兴并且是该社的负责人之一。在湘站未成立前，湖南已有特务组织，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参谋处参谋江汉清指挥，江即当时戴笠的化名，该组织由蒋肇周负责，蒋系复兴社湖南分社负责人。因此，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谍报科科长邓文仪嘱蒋组织湘站时，蒋已在戴笠所指挥的特务机构任职了，邓要罗念前负责组织，但罗随军行动，不能兼顾，邓文仪乃命复兴社成员吴昶负责筹备工作。

1933年10月，湘站正式成立，吴昶任站长，站址设在长沙市木码头河街，对外称《中国日报》社湖南通讯处。吴昶的公开职务是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干事，吴介绍与他关系密切的复兴社成员金远询任编审，蒋肇周、罗念前等因吴系省党部的人，恐不可靠，乃由罗介绍罗之姐夫黄德曾前去充任录事，暗中监视吴、金两人的行动。当时湘站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何键与两广的联系，四路军总指挥部所属部队移动及负责人言

* 黄德曾曾在湘担任录事、总务等职。

行等。

那时，报南昌行营的消息多是从湖南报纸上刊载的湖南甲乙两派明争暗斗情况，此种消息由黄缮写，关于何键的情况则由金密写发出。湘站成立月余，邓文仪派湘潭人谭文质来任编审，金则专任审核，但实际上是金主持一切，吴昶只负责找材料和对上级、对外的联系。部队、机关和学校的通讯员则有十五师特别党部干事罗念先、六十二师特别党部书记长陈申传、陆军第十六师特别党部书记长张之觉、湖南保安第一团书记官张战、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程端，此外，还有李映奇等，程、李两人与金均系资兴人。

1934年初，邓文仪因与杨永泰争权失败而去职，于是南昌行营所属特务机构合并于戴笠所控制的特务机构之中，湘站站长由蒋肇周担任，因蒋原系戴笠所属湖南特务机构负责人，吴昶则改任通讯员，但不久通讯员之职也被免去，其他人员亦有变更，原任审核的金远洵改任通讯员，谭文质继任审核，邓树勋任编审兼总务，季先训任编审，邓、季两人曾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受过特务训练，黄采芹任译电兼录事，黄德曾仍任录事。外面的通讯员除吴昶所指挥的特务外，蒋肇周所指挥的特务也合并进来了，如在先锋厅开设字画店的段复和邓坚、殷某等。新站址设在新运街，由谭文质、季先训两家住在楼下，不久季去江西，由谭找来曾在广东十八师当军需的陈某住在季曾住过的房间，黄德曾住一边，其余一边则为办公室。在两个特务机构合并之际，蒋、吴两人因争夺站长职发生摩擦，而蒋系黄埔生，吴当然非其敌手，金因吴的关系亦被外调。吴去职后不甘心，暗中向上告蒋兼职太多，生活腐化，难以胜任湘站站长之职，于是，复兴社特务处派督察员吴赓恕莅湘调查，吴赓恕因与谭文质系老十八师的同事，因此对当时的湘站及蒋、吴两人倾轧情况有了详尽地了解。戴笠听取了吴赓恕的汇报

后，乃囑吴改组湘站，吴贻恕首先将站址迁至活元桥，由谭文质任审核，邓树勋任编审，黄采芹任录事，饶铁珊任译电员（不久调江西），谷玉林、祝丕臣两人任交通。祝系河南人，善武术，实系吴贻恕的保镖。黄德曾任总务，外面原有的通讯员只留段复、金远询、殷某，其余均脱离关系。不久殷某因肺病严重，下乡休养，元形中亦脱离。而增加的则有皮培仁、徐谷冰、王俊勋、宋鹤，王、宋两人系谭文质的湘潭同乡及好友。省会机关则有警察局司法科的唐乘骝、警备司令部副官范裕厚、湖南省民政厅科员周翊襄。并在耶稣巷设有无线电台，负责人为张兰芬，吴是时亦住在该巷。两个月后，湘站因拦截其它组织文卷，恐站址被人发觉，夜间乃将站址迁走，住在站内的黄采芹、饶铁珊两人则搬至旅馆暂住。两天后，站址重设于吉庆街，吴贻恕住在那里，该楼第四层则为湘站办公场所，黄德曾因负责总务，则迁至吉庆街附近高码头，金远询调任审核，邓坚调任编审。

在湖南省政府奉令成立省邮电检查所时，吴贻恕亦接到该项命令，皮培仁系何键旧部，与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关系密切，吴囑皮培仁谋求省邮检所所长之职。故湖南省政府在呈报所长人选未获批准时，皮向易活动，并暗示中央方面他可疏通，易就向何进言，遂把皮培仁之名呈报上去，吴贻恕亦电报复兴社第二处批准，皮如愿以偿。

湖南邮电检查所直属于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经费亦由省政府开支。该组织成立时，内部人员一部分由省政唐官员介绍，一部分则由湘站人员推荐，故皮培仁公开受省政府领导，暗中却受湘站指挥，湘站仍以通讯员名义给皮每月津贴30元。故湘站的金远询介绍其弟金远亮，谭文质介绍黄德曾之弟黄君树，吴贻恕介绍饶铁珊之兄饶老大，金、黄两人充任检查员，饶任长沙电报局检查主任；皮培仁则介绍密友刘积丰、余斌两人充

任检查员，同时又介绍他们任湘站通讯员，每月可得津贴25元。月余后，南京又派曾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受过特务训练的李佐军、常孝聪两人任该所检查员，并规定其月薪为80元。

1934年，省邮电检查所为吴麐恕利用后，吴又向省政府其它机关和外县发展势力，最初他发展了“溥仁”、“溥义”、“溥礼”、“溥智”，“溥仁”即唐伯端，唐曾任老十八师军需处长，唐既与何键相识，又和四路军总指挥部的胡达、周翰往来密切；“溥礼”即罗荪，系四路军总指挥部的秘书；“溥智”即朱度恢，系省保安司令部交际室主任；“溥义”系四路军总司令部职员。除此四人外，尚有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队员张桂荪，外县则有湘潭的通讯员白羽，道县的通讯员何理堂，郴县的通讯员曹潮，津市的通讯员李恢，岳阳的通讯员姚海波（系岳阳保安团团附），益阳的通讯员方天印，永州的通讯员陈铁坚（实际负责侦探广西情况，在广西全州开有一个照像馆作为掩护）。

吴为了利用一部分警察，故在警察局成立警察训练所时，由唐伯端公开向省会警察局局长周翰介绍曾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受过特务训练的朱侶辉任该所教官，以便吸收受训的警察。吴还认为长沙警备司令部只有副官范裕厚一人不够，遂又由唐伯端出面向警备司令部司令胡达介绍吴的姐夫徐叶道之弟徐德纯为该部副官，宋鹤为该部特务员。宋以警备司令部特务员名义吸收人力车夫4人，每人月支津贴15元，受他指挥，专作跟踪之用，津贴亦由来转发，不与第二人发生关系，站长吴麐恕亦不认识这4人。

湘站设在耶稣巷的电台被停在湘江中的日本军舰发觉后，大汉奸唐炳初向何键告密，何乃令警备司令部搜查。在司令部担任通讯员的副官范裕厚将此事告诉了吴麐恕，吴即将电台迁至小吴门韭菜园，站址则由吉庆街迁至兴汉门湘春马路唐伯端

家的楼上。

吴在得到两广将出兵入湘的消息时，即派邓树勋在永州组织永州站，徐谷冰调宝庆成立宝庆站，谭文质调衡阳成立衡阳站，以上均受湘站指挥。恰在此时，南京派来的刘欲仙任湘站书记，吴建树任编审，这是湘站最庞大和最活跃的时期。

何键任省主席后，桂系对他频送秋波，湘站尽力制止。

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派王某来湘与何键联系。吴麐恕在电报局得到消息后，即通知全州通讯员陈铁坚，利用洪帮关系探听王某来湘日期，一面通知负责广西情报的道县通讯员何理堂潜入广西，利用社会关系进行活动。

在永州，各个方面的特务都行动起来了。永州站长邓树勋亦凭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中央军校关系要求汽车站和县警察局注意由广西入境的人。故当广西代表王某抵达永州时，湘站即得到永州站的情报，获知了该人的面貌特征，并派人跟踪不使其漏脱。湘站在得知王某即将来长的消息后，一面通知在长沙警察局的通讯员唐乘骝和警备司令部的通讯员范裕厚、徐德纯，省府交际室主任、通讯员朱度恢、四路军总指挥部的通讯员罗荃、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员宋鹤以及专做跟踪工作的王俊勋加以注意，还指定高级通讯员唐伯端负责与何键、胡达、周翰和湖南省政府及四路军总司令部上层人员联系，注意何键的态度和行动。

当广西代表王某抵达长沙汽车站时，何键侄儿何犹夫到站迎接，并将王某接至黄泥砩家中。通讯员唐伯端探听到王某来湘的任务是联何倒蒋，而何键又已决定派他的侄儿何犹夫前往广西联系。湘站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南京请示，南京复电“为避免何键倒向两广，可于湘、桂边境将王、何两人暗杀，使何有所顾忌”。

湘站站长吴麐恕得到南京的指示后，即指派通讯员徐谷冰

以洪帮名义与何犹夫交往，并探悉了何、王两人去桂日期。吴一方面电告永州站注意永州火车站的来往客人，一方面责成宋鹤加强跟踪。又通知警备司令部通讯员范裕厚以警备司令部名义与长沙汽车站联系，去永州的汽车，每日留客位一个，以便随时购票乘车，并指定王俊勋每日至汽车站等候，如何、王两人来搭车时，王即乘车跟踪。此外，湘站还以警备司令部名义向开明汽车公司定一辆小包车，以便随时听候调用。因此故王、何两人去永州之日，湘站站长吴贻恕即带领负责行动的祝丕臣、谷玉林两人乘小包车赶赴永州，他们在衡阳即赶上何、王两人所乘的汽车，而永州站站长邓树勋在得到湘站指示后已将一切布置就绪。

王、何两人抵达永州后，夜宿于某旅店。永州站将在全州开照像馆的通讯员陈铁坚召回，由旅馆茶房向王、何两人介绍说陈来湘是采办照像材料，候伴回全州的，说王俊勋是赴广西探亲的，亦欲结伴前往，因此得与王、何两人结伴步行赴桂。

在何、王动身赴桂之际，湘站站长吴贻恕即带领祝、谷和永州站长邓树勋乘车抵湘、桂边境，吴等即下汽车步行前往预定地方。俟陈、王陪同何、王到达该处时，祝、谷两人迎上去，会同陈、王将王、何架至山中，将他俩绞杀，事后即埋于山中。吴贻恕回长后又指示唐伯端拜访何键，询问有无派何犹夫赴桂之事，何矢口否认，唐伯端也就笑而不言了。

西安事变发生时，何键准备支持张学良，吴贻恕得到这一消息后，即派皮培仁往见何键，对何说：“委员长在西安蒙难，外面传说主席将有所举动，现我奉命前来见主席，如果主席有所举动，在一小时之内，主席全家生命恐有危险。”同时，吴派唐伯端向四路军总司令部高级人员游说：“如果何主席支持张学良，则湖南政局会糜烂不堪。”吴还通知各机关通讯员造谣说：“湖南军队包括何主席的嫡系军队，如十九师下级军

官中有一部分人已倒向中央。”这使得何键不敢轻举妄动，从而稳定了湖南局势。

此外，吴还利用湖南邮电检查所电报局检查主任饶老大的职权，规定凡是广东方面给何键的电报均要抄送湘站。同时，吴令省民政厅通讯员周翊襄以私人关系，向何的译电员收买何键与广东往来的密电，每页出价5元，并以此来监视何键的行动。

军统控制的主要军事单位

抗战时期，军统控制的军事单位主要有：军令部第二厅，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后改为邮电检查处)和它在各地所设的几十个邮电检查所、航空检查所，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与别动军纵队，各战区的编练处和便衣混成总队，各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外事处、调查室以及忠义救国军，陆军总部、远征军总部的调查室，航空委员会政治部的调查室，陆军大学的调查组，昆明防守指挥部调查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和所辖卫戍区13个县的稽查处，新疆警备司令部调查室，各集团军的调查室、军的调查组、师的谍参科，各省保安司令部或保安处的调查科(也有称为训练科或第四科)，兵工署警卫稽查处与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处及警卫大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即军统特务总队)，蒋介石的侍从室第六组、随节警卫组、特别警卫组(比较固定地驻扎在蒋的住所担任警卫)。

(吉 子)

军统时期湖南邮电检查所内幕

陈俊藻*

1935年1月到1936年8月这段时间，湖南邮电检查所所长是皮培仁。皮是我在中央政治讲习班的同学，因此，我经皮的引荐，出任该所检查员，负责检查印刷品，所以对该所内幕比较了解，现将亲见亲历之事叙述出来。

湖南邮电检查所是一个半公开的特务机构，表面上隶属于省政府秘书处，所长由省政府主席何键委任，编制之内的员工由所长物色，呈秘书长易书竹核委，薪饷、办公费等由秘书处开支。但皮培仁能当所长，还是另有原因的：一年以前林寿熙任湖南邮政检查所（邮电检查所的前身）所长时，皮任该所的邮政检查员。但皮经中央政治讲习班同学徐谷冰的介绍加入了军统，当时军统在长沙设了一个站，站长为吴贻恕，也是我们政治讲习班的同学，因此皮培仁加入军统之后，吴贻恕为之牵线、搭桥，介绍他与秘书长易书竹会面，并示意易书竹将湖南邮政检查所改组为湖南邮电检查所，推荐皮培仁当了所长，所以皮一帆风顺，由原来的检查员升任了所长。所内人事全由皮一手掌握，除原在所内任职的检查员齐大斌（何键之马弁）、黄顺芝（也是我政治讲习班同学，系军统成员）、余仲琳、刘敦等四人外，又增设副所长刘积丰（也是我的同学），检查员黄君树（军统骨干黄强生之弟）、金远泳（军统骨干金远询之弟）、田翠竹、余恺、郭长鸣（也是我的同学）及我。并新增电政检查员邓麓衡，余某（忘其名）和通讯员皮鲁

*陈俊藻曾任军统湖南邮电检查所检查员。

瞻。经军统湖南站开会讨论通过后，再由皮培仁向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提名加委。当时军统长沙站除吴麋恕外，还有徐谷冰、黄强生、罗谕衡、金远询专职人员4人。军统湖南站从此也就控制了湖南邮电检查所。我们每天除照例填送所扣印刷品的日报表外，其它有重要线索之信件随时由皮培仁报告请示吴麋恕或听从徐谷冰、黄强生、宋鹤（长沙警备司令部特务员，军统职务）等人的处理。邮电检查所开展工作不到一个月，军统湖南站长吴麋恕就奉调到广东去了，由金远询继任站长。不久金远询又公开任湖南省保安处第五科科长，但他的军统湖南站长身份并没有公开，我们邮电检查所受他的直接控制，以上是该所组织情况和实际隶属关系。但严格说来，该所人员相当复杂，除上述在编人员外，湖南省保安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长沙警备司令部等每日均派员参加工作。如省党部派了李峻，保安处派了常俊，长沙警备司令部派了张华芝。有一段时期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与军统湖南站联系后加派李佐军、常孝聪等参加邮电检查工作。

我是负责检查印刷品的，包括书刊、报纸、杂志、传单。那时省邮政局设在长沙市西长街，我们在邮政局内另设办公室。和我一道检查印刷品的有金远冰、保安处派来的常俊。各地的印刷品一到长沙，或由长沙寄出的印刷品，首先都由省邮政局通知我们，我们迅即前往检查，认为可疑的即从中抽出，带回办公室审查，无问题的即盖戳放行。至于审查标准，当时军统和省政府都有同样的规定，大意是：甲、书刊、杂志、报纸宣传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的，以及鼓吹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日的，诋毁国民党中央和宣扬无产阶级文艺，以及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都予扣留。乙、汉奸报纸，因为它常诋毁国民党，所以也在扣留之列。此外，何键与国民党省党部CC派的首领张柯、王祺有利害冲突，张、王因常居南京，攻击何键最力，

所以何键下令对攻击他的印刷品务必严查扣留。所扣压的印刷品，除分送所属各单位一份外，其他均要定期焚毁。当时所扣的左倾文艺和鼓吹抗日统一战线的杂志中，最多的是金仲华主编的（在上海出版的）《永生》、《再生》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救国日报》等，还有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出版的《巴黎时报》，不过这种报纸不常寄来，寄来时份数亦不多。那时日军已强占东北，进窥山海关，天津汉奸蠢蠢欲动，竟在法租界出版《天津庸报》，大肆鼓吹媚日的投降主张，这种报纸每日必寄到数份，因其封面特殊，所以容易检查出来，从无遗漏。当时湖南省国民党上层，分甲、乙两派（一般人称之为钻子与皮刀两派），甲派是湖南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委员张炯、王祺（常住南京）所领导的CC派；乙派即何键的部下，当时任湖南公路局局长刘岳厚领导的拥何派，何键握有兵权，实力雄厚。CC派虽在国民党中央攻击甚力，但不容易动摇他，于是他们在南京出版《洞庭波》杂志，专门搜集、报导何之劣政，以及他的私生活等。我们检扣了这些印刷品后，由所长皮培仁亲自送交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表示尽忠职守，以讨好何键。至于检查信件方面的人员，经常有副所长刘积丰、检查员齐大斌、黄顺芝、余恺、余仲琳、田翠竹、黄君树、刘敦、郭长鸣等人，他们把信件分为进口、出口、转口三组检查，首先看封面是何地何人寄发，又是何地何人接收。当时，不管是进口、出口还是转口的信件都是一天几万封或十几万封，没有足够的时间逐封检查，要发现问题就只有靠情报。如通过军统了解到汉奸唐炳初与日本领事常有信件往来，于是进行检查。又如当时民族革命大同盟的李天锡、朱某（忘其名）在香港与李济深接洽之后回湘活动，检查所根据军统指示，弄清了他们回湘居住的地址，然后就注意其来往信件。信件被检出之后，首先用牛骨制成的薄刀把信封拆开，并不留有拆印，对信件有三种处理办

法：第一、将原信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仍将原信封好投寄，不使收信人和发信人察觉；第二、用某种药水涂浸信纸上，再看信纸上是否出现密写文字，然后根据情况，再决定扣压与否；第三、将原信呈缴军统或省政府秘书处处理。对中统在邮局投递的信件有时也拆开检查（当时中统寄往外地的信件还没有专人投递，军统则不经邮），有一次省党部调统室因此事特派李某向皮培仁提出抗议。至于电讯检查，则在长沙市织机街电报局进行，我也从未去看过。只知道那边有检查员二人，日夜轮班工作，很少发现什么机密（何键军方的电报，不属于检查之列）。

皮培仁当了所长之后，在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跟前，自吹自擂，夸大军统实力，易书竹也信以为真。恰好1935年3月国民党将在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何键为巩固省主席地位（因中统和CC攻击他），想当国民党中央委员。有一天易书竹问皮培仁：“何键能不能当选？你们可不可以帮忙？”皮培仁即向吴贻恕请示。吴一面嘱皮约期会见易书竹，一面打电报给南京军统负责人提出何键要求当选中委的问题，后来吴得上级指示，又经易、吴几度密商，何键终于放了心。我所知道的是，何键保证今后竭诚拥护蒋委员长，中央保证何键当选为中委，其他条件局外人尚不得其详。那时正值阴历年关，事先经皮培仁向易书竹暗示，由何键馈赠光洋3000块给吴贻恕度岁，皮培仁奔走牵线有功，另得光洋400块。后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何键果然当选为中央委员。吴调走后，金远询接任军统湖南站长，皮培仁更为易书竹所信任。

皮培仁是一个挥金如土之徒，他的月薪不够用，常巧立名目，向省政府秘书处借钱，还是不够。竟异想天开，请人代写一封假信，大意说何键在一个秘密台基中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私通，当时没有如数付款，今特由某某出面，函索报酬。收件人写明省政府主席公馆何主席收，寄件人是本市某某街某某。

信写好之后，皮派人购张郎花投寄邮筒。经邮局盖戳之后，又由皮检查扣出，亲自呈送易书竹，并要他转呈何键私阅，想藉此诈取一笔钱，不料竟被何键识破，于是何将皮培仁撤职。所遗所长一职由曾任民政厅主任科员的彭某（忘其名）（据说他是当时复兴社在湖南的负责人）接充。我也被解职，离开了邮电检查所。

军统控制的主要行政单位

抗战时期，军统控制的主要行政单位有：各省省政府调查室，国家总动员会议军法执行总监部的经济检查处及其所辖的成都经济检查大队、重庆经济检查处执行队，黔阳、息烽、修文等县的县长（这几个县设有军统的直属机构），内政部警政司，内政部警察总队，重庆警察局的刑警处、督察处及几个分局，成都、兰州、西安、郑州、洛阳、迪化、贵阳、昆明等大城市的警察局，以及自贡、常德等小县、市的警察局，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在各地的几十个检查所，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滇缅公路警卫稽查组，滇越铁路警察总局，交通部公路总局警稽室及各公路警稽组，各运输处的警稽室，铁道警备司令部，西南运输处黔西训练所，财政部直接税局（后改为署），当时，重庆流行这样几句话：“从君（军）不如为正（政），为正不如从良（粮食部门），从良不如下堂（食糖专卖），下堂不如当娼（仓库管理），当娼不如即席睡（直接税）”。军统抓到“即席睡”，自然有利于广辟财源。

（华 生）

军统特训班在黔城

杨周震*

30年代末，设在临澧的国民党军统特训班因日军进逼长沙，临澧受到威胁，就于1938年秋末转移到黔阳县城——黔城。

当时，我17岁，在黔阳简师读书。军统训练班总队部教育副官周颂平的父亲周蕊荪住在我家，与先父（杨松骥）要好，两人作诗绘画，无话不谈。后来，我和周颂平也结拜为兄弟，来往密切。不久，周颂平要我去他们总队部当准尉司书，那时，我已婚配，家庭常闹一些纠葛，我实在不安心读书。我虽知道该训练班是做特务工作，但对其性质仍感到神秘莫测，只听说这是蒋介石的亲信组织，“见官大一级”，是“金饭碗”，十分羡慕。想到：“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将来捞上个一官半职，也好衣锦还乡。于是，我就毅然弃书，在拜把兄弟周颂平的担保下，当上了军统黔训班的准尉司书，后来还正式参加了特务训练。

军统第二期训练班来黔阳开办时，国民党兵第10团也在这里训练新兵，双方曾为地盘争夺激烈，几经武装冲突，仍未解决问题。在县长王湘的周旋下，划定圣庙、普明寺、文庙、城隍庙、简师学堂、下杨公庙、先农坛等处为特训班驻地，班本部设简师。

这个训练班，对外名称叫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内部则按地名称呼，如在临澧称“临训”，在息烽称

*杨周震曾任军统黔训班总队部准尉司书，以后参加了该班训练，已故。

“总训”，在黔城就称“黔训”。也曾用过中央警校的名义，听说戴与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争夺警政领导权，故使出这一伎俩。

训练班迁到黔城后，又招收了一些新生，多属江、浙、赣、鄂等省沦陷区的逃难青年，也有黔阳籍的，共800余人。有男有女。

参加军统手续甚严：一要写自传，二要填调查表，内容有姓名、别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学历、经历、社会关系、家庭成员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介绍人、与介绍人关系及本人对时局的看法和认识等。三要在蒋介石像前宣誓，并在印好的誓词上签名盖章。誓词内容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受最严厉之处分（签名盖章）”。四要连同底片缴正面脱帽半身相片数张。

该班学生，有些是军统分子，或是从国民党其他军事学校调来的，多数是军统人员直接介绍来的，还有些是以公开名义招来的。公开招来的学生，起初并不知道是接受法西斯特务教育，等明白真相时，木已成舟。

学生进班后，受严格控制和时间训练的时间一年，分前期教育和后期教育。前半年着重政治和军事教育；后半年依照志愿，分为情报、行动、电讯、警政、参谋、外事等科，分门别类训练各种特务技术。我学情报专科，受训课程有情报学理论、情报业务、侦察术、化装术、秘密通讯、密码、心理学、行动术（即杀人的残酷方法和捕人技术）、捕绳术、擒拿术、毒药、爆破等。另外，还学《民法》、《刑法》、《违警罚法》、《行政法》、《总理遗教》、《领袖言行》、《社会学》和法西斯独裁政治哲学等。每天清早都要作“朝会”，由副主任训话。星期四为“纪念周”活动，每次“纪念周会”和“四一大会”

(军统成立日)或其他集合，都要唱“班歌”。此歌据说是临澧训练班一个教官从国外留学回来后编作的，很受戴笠赞赏，后来戴就规定作为训练班必唱之歌。歌词大意是：青年，快准备，智仁勇健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是领袖的耳目。青年，快准备，救国的责任，落在我们两肩。

训练班的组织机构设班本部，总管全盘。下设秘书室及教务、政训、总务三处。总务处下设图书室和医务所。全班为一个学生总队，直属教务处。总队下设7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3个区队，共21个区队。每个区队下设3个班，共63个班。

班本部设主任、副主任。戴笠兼主任，他长期在重庆，仅在训练结业时来过黔城一次。副主任是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的少将级军官吴琅。秘书室有中校秘书及中尉书记官和司书、译电员等数人。教务处处长陆遂初（上校），另有中校、少校、上尉、中尉级的股长、教官和助教数10人，专门负责技术训练。学生总队设一上校总队长，总队副上校、中校各一人，还有上尉教育副官、中尉书记官、少尉副官、准尉司书和司号长等10余人。各中队设少校中队长一人，准尉特务长一人（管理生活）上士文书一人，上士军需一人。区队设上、中尉区队长二至三人，各班班长均从学员中挑选。一中队参谋组设普明寺，大都是国民党军队中调来的在职谍报参谋人员，他们都穿军官服装，与其他学员不同。二、三中队情报组设文庙，有情报教官、缉探教官、中队长等多人。其余会计组、报务组、女生队等分别隶属于四、五、六、七中队。女生队队长由临澧第一期女毕业生担任。还有政训处，设处长、总教官各一人；处下设股长、指导员、助理员数10人。政治教官和指导员分别到各学生中队进行政治工作，监视和掌握学生的思想活动，检查学生来往信件，给学生灌输特务思想。总务室设有股长、副官、助理等，负责全班人员的生活事宜及钱粮给养等事务工

作。

据我所知，军统发展到后来，除重庆局本部设有庞大的总管理机构外，各省和特区都加设省站，以下再设分站、组。基层有通讯员、行动员，这都是秘密性质的。各省邮电检查所、办事处，则是半公开组织。自戴笠兼任财政部缉私署长后，各省又设缉私处，下设查缉所、分所、查缉哨。军事委员会还设有水陆交通统一检查站，下设检查所、检查哨、检查员，均设在各交通线上。另有航空检查站、警税团，均成营、连、排建制，这些都是公开单位。同时，全国城市的警备司令部还设有稽查处，大部分也控制在军统手中。国民党正规军队，如集团军总司令部或战区长官司令部的调查室，也是军统派驻军队的特务组织。各省、市和较大的县警察局、警务处也有军统派去的成员。各都市的警察局刑警大队或中队，基本上都是军统掌握。当时警察部门有两大派：一是戴笠派，一是“科班”出身的李士珍派。

训练班学生毕业时，被依次叫去谈话，派遣工作，并发给各种费用、介绍信、旅差证明等。他们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包括沦陷区，来自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的华侨学员则被派往国外。工作性质有内勤、外勤和秘密、半公开、公开等。实习三个月后，再按工作表现定衔级，一般都是中尉衔级，也有较高衔级的。我受训毕业后，化名何玉书，曾先后被派任湘西分站通讯员、安江邮检所邮检员、湖北水上警察局户籍员、中美合作所少校指导员、江苏吴县警察分局局长、苏州警察分局局长、上海警察局股长、国民党国防部中校联络参谋等职。

黔城特训班从1938年冬开办到1939年冬结业，整整一年。举行结业典礼之际，戴笠从重庆飞到芷江，再由宪兵司令谷正伦、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和稽查处长沈醉等人陪同，专程来到黔城。当时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在圣庙开宴作乐。由于戴

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是国民党上层的重要人物，事后，县长王湘曾撰文刻碑，并将黔城西门改作“中正门”。

军统第二期特训班在黔城结业后，宝庆沦陷，日军节节进逼，战火已烧到雪峰山，因此，特训班随即迁往贵州息烽。

（刘自有 整理）

（黔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临 澧 特 训 班

1938年2月，军统在湖南澧县办了第一个大规模的训练班，即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简称临澧特训班），有学生1100余人。戴笠兼任班主任，余乐醒为副主任，总教官为谢力公、总队长为陶一珊，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王班联、副大队长陈震东。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段建功，第二中队长项廉，第三中队长罗兴，第二大队也辖三个中队，大队长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第四中队长金树云，第五中队长陈栗冬，第六中队长林廷极。女生直属中队队长先由安占江、吴毓坤担任，受训学生都要学习情报、行动、侦察、化装、秘密通讯、毒物使用、爆破、邮电检查等特务工作的基本技术。1938年冬，因战事关系，临训班迁往黔阳续办。该班学生倍受重用，军统局的各处、室、组等内勤单位以及各省、市的站、组无一没有临训班学生担任要职，以至军统造成“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局面。

（岳 枫）

忆军统湖南站二三事

陈 达*

1944年夏秋之间，我由江西调任军统湖南督察。各省督察均受军统局督察室直接领导，有专用密本，与军统局直接通报。湖南督察，就是湖南军统特务之特务，负责监督察看湖南军统特务的一切“不法”言行，其薪金支付及住房仍由湖南站负责。三个月后，戴笠视察东南几省的工作，在江西赣州，专电给我，命我仍回江西工作。在湘仅三月左右时间，现记述亲历史实二三如下：

一、站长与夫人一并移交

我由江西抵达长沙后，即去熙台岭军统湖南站向站长金远询报到。金远询，别名金拙夫，湖南资兴人，曾任军统局秘书，其人颇具国学基础，能写会道。发妻逝世后，尚未续弦。金远询的前任站长李人士（别名李海怀，湖南醴陵人），其妻阳兆杰，高中文化程度，李人士任湖南站长时，阳为湖南站情报编审。1942年，李人士在调任天水行营调查课课长前，即与少女周振球有暧昧关系，李人士有意弃阳娶周，趁调赴天水工作之机会，将阳留在长沙，而秘密偕周振球在去天水途中作旅行结婚。阳兆杰得知后，痛恨李人士喜新厌旧，乃接近金远询。而金远询悼亡之余，见阳兆杰年龄、面貌均相当，又想李人士另有所欢，遂与阳兆杰由上下级关系进而变为恋人关系。不

*陈达曾任军统局湖南督察，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久，李人士与阳兆杰正式离婚，金远询即与阳兆杰正式结为夫妻。当时众人都说李人士移交站长给金远询，连老婆也一并移交了；或谓金远询接收李人士的站长职务，连李人士的老婆也一并接收了。我感到此事有关军统的声誉，作为湖南督察，不能不报。乃直接电呈戴笠，电文大意是：李人士弃妻另娶，应负遗弃之罪；金远询续弦阳兆杰，将前任站长之妻娶为己妻，亦于情理有乖。且抗战期间不准结婚早有明文规定，李、金身为站长，目无纪律，拟请予以处分。

半年之后，军统局督察室的人告诉我，说戴先生根据你的来电曾在西安面斥了李人士，说李道德败坏，对金远询则无半点谴责。军统局本部的李葆华同学秘密对我说：“戴先生对男女关系问题，向不重视，他（指戴）在重庆也不规矩。己不正，焉能正人？以后这类事件少管为是。”我才恍然大悟。

二、视察军统平江、株洲、湘潭、醴陵情报组

为了阻拦日军的进攻，以便在湖南沦陷期间继续进行活动，军统局曾多次来电要我赶往湖南各情报组进行视察，督促检查他们对潜伏工作的准备情况。我曾问过站长金远询，各组潜伏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金答：各地一般都作了准备，但可能还有漏洞，无十足把握。因此，我决定先赴平江情报组视察一番，了解他们在沦陷后有无立足和开展工作的把握，我仅带一名勤务兵前往。当时，平江情报组长陶然（本地人，临澧特训班毕业），在平江工作多年，情况熟悉。我问陶，一旦平江沦陷，潜伏有没有充分的准备和把握，陶答：“已在平江乡下建好了工作据点，如平江县城不易立足，即全部移居乡下，电台则在日军进平江县城之前，就已迁往乡下了。”我予以肯定，并说在沦陷区工作，保全电台十分要紧，假如无电台，有情报也送不出。最后又督促陶亲自去检查一番，要求他做到万无一失。

我在平江是由县警察局长（忘其名，军统外围分子）接待的。翌晨，这位局长匆忙来到我住的房间，惊恐万状地说：“日本鬼子快要进城来了，我已为你雇好了一顶轿子，请快上轿。”我因对敌人详细情况不明，便听从这位局长的安排，上轿离开了平江，经浏阳抵长沙时，长沙街头行人稀少，多数商店已关了门，到达熙台岭湖南站后，金远询已不在了，只见到了副站长肖振华（江苏人）等几个人，肖说：“你赶紧赴湘潭、株洲、醴陵等地看一看吧。”我说：“你们不是早已布置好了潜伏工作吗？为什么还得我去看一看。肖说：“过去只书面布置过潜伏工作，还没人去检查过。”

于是，我在长沙只停留了一晚，翌晨，又赴株洲视察。株洲情报组长汤沃民（本地人，农民打扮），对株洲人地熟悉。我嘱咐他把电台安置好，并说：“有电台，才有工作；失去了电台，就失去了一切。”汤沃民连连点头。

尔后，我由株洲转湘潭。当时湘潭情报组长罗铁青（本地人，临澧特训班毕业）已在湘潭工作多年。罗向我汇报说：“电台的AB电池即将用完，请速补充。”我即电长沙肖振华将湘潭组所需电池一日之内送到，不得有误。肖振华接到我的电报后，即派专人送来了。湘潭沦陷后，电台一直与重庆军统局和湖南站保持通讯联系，受到军统局的表扬。罗铁青后来还升了官，现罗在台湾任行政院参事。

湘潭视察结束后，我又赴醴陵，醴陵情报组组长阳之永（本地人，临澧特训班毕业），醴陵是我的故乡，我除了视察醴陵情报组的工作外，还回家与亲人见了面。当时醴陵潜伏组设在醴陵城内一菜农家里，这位菜农在城郊有菜地约三四亩，他与醴陵情报组组长阳之永有亲戚关系。阳之永与这位菜农约好了，日军如进入醴陵城，阳之永便伪称是一名菜农，由那位菜农掩护。该组的无线电台，则设在离城10余里的阳之永姑妈家

里，每月支付一定工资。据悉这个电台，在日军侵入醴陵后，一直与重庆和湖南站保持联系。

对平江、株洲、湘潭、醴陵四地情报组的视察，因行程匆忙，走马观花，并未与内外勤特务见面谈话。只听了一下组长的汇报，作了些一般性指示而已。

随后，我赶赴衡阳、耒阳，到后一打听，湖南站本部已撤退到了郴州。在郴州我与金远询、肖振华等见了面。当时，金远询想把站本部撤到资兴去，他是资兴人，他说资兴山多，便于立足。肖振华表示同意，我持异议，说：“湖南即使全部沦陷了，我们还得从事敌后的潜伏工作，还要指挥潜伏工作，全凭电台联系。资兴地理位置不适中，且多山，与湘北、湘西等地电讯联系均会有困难，站台设在湘中地区较为适宜。可派出三五名精干人员在湘中地带设电台与全省各组日夜保持联系。”金远询考虑了一刻钟左右，赞成了我的意见。他准备派出以肖振华为首的临时工作组到安化、新化等地建立站台。但不久，金远询又改变了计划。我则在戴笠电令下调回江西后，再没过问湖南站的工作了。

三、互争九战区军法执监部调查室主任一职

金远询在湖南任站长期间，有一个公开的掩护职务是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法执监部调查室少将主任。抗战胜利后，九战区司令部迁入江西，九战区军法执监部调查室也随之入赣，既然到了江西，军统局就令江西站接收九战区调查室。金远询不愿舍弃少将主任军职，回电军统局说江西站已有江西省保安司令部调查室名义为掩护，不必再将九战区调查室交给江西站。江西站对已迁入江西的九战区调查室，自然不愿再由湖南站把持。赣、湘两站军统特务，相互申述理由，互争九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一职，打了半年多官司，最后戴笠下令由江西站兼管

九战区调查室，才算解决了问题。

凡是干久了军统秘密站长、副站长、组长、副组长等职务的特务，都无意做一辈子“黑官”，总想弄个公开的官衔，如处长、主任、局长、纵队司令之类的官当。金远询丢掉了九战区军法执监部调查室少将主任之后，心情很不舒畅。便千方百计找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局伟龙、马志超等活动，最后终于辞去了湖南站长一职，就任粤汉铁路警务处副处长职务。解放前夕，携妻阳兆杰经香港赴台湾，据云金已病故。

中 统 特 工 总 部

1932年，徐恩曾在中统内部秘密成立特工总部，地点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内。特工总部的主任是徐恩曾，总部设有书记室（濮孟九任书记），下辖组织、指导、审理、行动等四课，书记室之外，设有训练（科长为王云亭）、情报（科长为刘桂）、总务（科长为周伯良）三个科。此外，还设有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冲）、总督察（负责人为刘不同）、电讯总台（负责人为范本中）、密电研究室（主任为武子明）等。特工总部对外活动从不用“总部”名义，指挥其所属的活动，多用代号。1936年特工总部的代号为“华统”，抗战爆发后改为“鲁黎”。特工总部主要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1938年，中统局成立后，它被合并到里面去。

（华 成）

何际元与军委会别动军第四纵队

张季任*

1944年端午节后，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第四纵队少将指挥何际元率领指挥部直属单位（包括全部美式装备的特务队以及11位美国人），由南岳来到宁乡栗愚乡黑山坡，几个月后迁到上流乡田坪里，并在那里办起了中美特训班。在这偏僻的山沟里，一下来了这么多美国人和部队，是亘古未有的事情。因此，何际元就成了当时宁乡的神奇人物。

一、何 际 元 其 人

何际元别号印三，1907年，出生于宁乡流沙河草冲。在云山学校21班毕业后，进入宁乡甲种师范第4班，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后来还进过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任过三、六战区调查室科长、主任等职（均系军统情报机构）。1942年，军委会在益阳成立别动军二、四纵队时，何际元任第四纵队少将指挥。1946年冬，任交警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任169师副师长。1948年，任79师师长，是年冬调回交警总局，派任设在苏州的交警训练班副主任。淮海战役后，训练班内迁，他回到长沙。1949年5月，他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于宁乡道林、烧汤河一带，召集一些国民党地方部队和部分交警武装起义，番号为人民自救军湘中总队，后改名湘中纵队，何际元任司令，汤菊中任政委。解放后部队编入陈明仁部，何际元任二十一兵团少将高参。1950年9月25日在长沙去世，时年43岁。

*张季任曾与何际元同学，后在军委会别动军第四纵队任军需。

二、益训班与四纵队的成立

1942年6月，别动军在益阳邓石桥开办了一所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益训班），别动军司令周伟龙任主任，何际元任副主任，因周驻重庆未到职，何负实际责任。学员大都是六、九战区的混城队队员，这里说的是“混城”，而不是“混成”，是指平日派遣混进日军所占城市去做工作的军统特务人员，所以这些人都有独立活动的的能力，他们头脑中充满了法西斯思想，又掌握了特种技术，是军统武装的骨干力量。4个月后，益训班结业，学员被编成别动军二、四两个纵队。第二纵队由盛瑜任少将指挥，第四纵队由何际任少将指挥，每纵队计400人，配发步枪100支和少数驳壳枪等。所以，当时的二、四纵队的特点是：建制小、人员少、武器装备差。第二纵队的活动范围在江西，第四纵队的活动范围在湖南。常德会战后，第四纵队从津市开赴南岳，在南岳经过中英、中美两次特训后，配备了全部美式装备，第四纵队才迅速地发展起来。

三、中英中美特训班

军统和美国特务合作之前，曾和英国特务有过一段合作关系，成立了中英技术合作所。1943年年底曾在南岳的中梅桥办过一期中英特种技术训练班，第四纵队的成员参加了这期学习，原来商定学员结业后由英国提供新式武器，可英国并没有运什么武器来，可能是欧战激烈，英国有点自顾不暇。可戴笠认为英国人不讲信用，就不与他们合作了。时中美合作所已成立了一段时间（戴笠任主任，美国人梅乐斯任副主任），并已在各地办了一些中美特训班。因此，在南岳枫木桥就开办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以取代中梅桥的中英特训班。

不论办在什么地方中美特训班，都是戴笠任主任，梅乐

斯、陶一珊为副主任，但戴笠并不到职，只是想控制全国的“特训”大权，凡是受过特训的人，都算是他的学生，可随时驱使。掌握实际训练权的是总队长，南岳枫木桥的中美特训班总队长是何际元。学员人数达1000余，分四个队进行训练，一队队长雷中和、二队队长刘直英、三队队长李济民、四队队长何仕勋。训练的主要内容是：讲解美国新式武器的性能、使用方法，以及美国的特务技术等，这些课程均由美国人教授。当时，有11个美国人在南岳特训班工作，都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派来的，级别都不高，其中有上尉郭泰，中尉麦古乐、戴凯、白克利，中士詹姆士等，都是从事教练工作的。还有一个中校医生叫谢福，军衔算他最高，他未任教，也不治中国人的病，专门负责美国人的医疗工作，但对全盘工作负有督导之责。另外还有一个叫哈拉巴格的，是拍摄电影的，凡是他认为精彩的场面，都一一拍下。

1944年5月，南岳中美特训班正式结业，学员们装备了清一色的美式武器：卡宾枪、汤姆逊机枪、威逊左轮、马牌手枪、三〇步枪（射程7000米）、马铃机枪、0.5重机关炮、火箭筒、信号枪等，还配有TNT炸药、可行性炸药等，从此四纵队面貌为之一新。部队也重新编整了，其主要负责人如下：第一支队长李济民、第二支队长王力忠、第三支队长温应冰（第三支队建制隶属一纵队，后归四纵队指挥调遣）、参谋主任周铭勋、副官主任喻茂钦、军需主任黄子历、直属特务队长戴模宗等。

当时，第一支队被派往浏阳、平江、岳阳及江西的铜鼓、湖北的通山一带活动；第二支队则进驻长沙、湘潭、益阳、汉寿、沅江、华容一带；第三支队在衡山、湘乡、醴陵、宁乡一带。指挥部各直属单位及特务队并11个美国人，则由南岳出发前往宁乡，准备在草冲一带驻扎。指挥部和各支队之

间，都配有美式无线电台，可随时联系。

四、石 潭 之 役

1944年6月，各支队分路出发，四纵队指挥何际元、副指挥孟蔚民、高参朱庚庵偕同美国人和直属单位，步行向宁乡进军。其时正值日军大举南下，在湘潭石潭附近被敌人发现，日军分几路向指挥部包围，在当地群众的协助和指引下，他们才避开了日军包围圈。美国人没有上过火线，又是穿着草鞋，行动非常缓慢，可说是部队的一大包袱，特务队分派两个小组把指挥部和美国人送往安全地点。这时特务队主力已转入敌后，占据有利地形，出敌不意，发起突然袭击，与敌短兵相接，由于我军武器上占绝对优势，打死打伤日军官兵200余人，我特务队随即迅速撤离，无一伤亡。这时天已黄昏，日军也不敢追击了。四纵队以少数警卫部队（不过百把人参战）在石潭打了一个相当漂亮的仗。

石潭战斗结束后，美国人认为他们训练出来的部队是过得硬的，而日军不堪一击。急忙用无线电台向中美合作所和美国海军司令部报捷，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国，据说美方当时作了两点评价：一是中国军队战斗力强；二是四纵队尽力保护美国人的安全，不使受到危险，精神可赞。美国报纸对此作了报导。

过了一段时间，美军中校谢福转来一份纪念品，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夫妇赠给何际元夫妇的，其中一件是罗斯福的一帧照片，一尺多高，上面用英文题有何际元将军纪念字样，并签了罗斯福的名字；另一件是一件精致的化妆用品手提箱，内有10多样化妆品，是罗斯福夫人赠给何际元夫人的。何妻李素梅爱梳妆打扮，得了这个箱子，特别惬意，对来往客人，总要炫耀一番。

五、大 摆 筵 席

石潭之役后，四纵队指挥部各直属单位在湘乡谷水全部会合，并在谷水过了端午节，随即开赴宁乡流沙河原果恩乡所属的黑山坡，指挥部和美国人驻扎在大地主李瑞山家，各直属单位分别住在附近农民家里。宁乡草冲是何际元的出生地，草冲隔黑山坡仅几里地。这次何际元以指挥官的身份，随同许多美国人回到家乡，真算是“衣锦荣归”、“光宗耀祖”，他到达宁乡不久，就到处发帖请客，在附近的林山学校（现县七中校址），大摆筵席，邀请附近大田、望北、上流、黄绢、汤泉等乡乡长和著名士绅赴宴。他的本乡——果恩乡就请得更多，乡、保、甲长、族长、老同学、老熟人都在邀请之列。那时，林山学校已放暑假，礼堂宽敞，摆上了几十席。何际元身着高级毛哔叽黄制服，金质少将领章闪闪发光，他在席间致词，因有美国人在座，他一边讲，一边由翻译译成英语，讲了一通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大道理，还吹噓了盟国（指美国）如何强大，如何支持我们的抗战之类的话。

是年冬天，他母亲60寿辰，何又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庆寿活动。事先在草冲老家大兴土木，整修和扩建了一些房屋，房子全部粉刷一新。何家准备大做寿酒的消息，遐迩皆知，许多人都积极筹办礼物。寿期收到的贺礼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木质寿联，木料宽而厚实，上等山榿榿好后，箔上金字，联语都经过再三推敲，对他母子推崇备至。挂在堂屋中的这类寿联约20来副，其他各种礼物如衣料、鸡、鱼、肉、面等可说是堆积如山，还有抬来大缸寿酒的，和用钱折礼的等等。席间真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其中有七十三军代表高参彭福伯，六十一师师长黄建山，七十七师师长唐生海，宁乡县长缪

昆山等等。外国人的身价高一些，法国天主教主教罗保田坐在首席上。黑山坡的美国人未见出席，何送去几桌酒菜在驻地招待他们，何家的流水席一直到傍晚未停。

还在几个月前，宁乡县政府就开始训练一个军乐队。这天，军乐队长前斌奉命率队来何家演奏，迎送宾客和席间助兴，都由乐队奏乐。外边坪里搭起戏台，宁乡上游的著名花鼓戏演员都被邀聚，尽情演唱精采节目，在这个地区，可算盛况空前。但是，国难当头，县城已沦于敌手，不少人联想到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颇多感慨。

六、田坪里的中前特训班

四纵队指挥部驻地黑山坡，山青水秀，但场地太小，无法组织训练。因此，在1944年年底，迁移到上流乡的田坪里（今田坪乡），此地周围是山，地势险要，中间有一块相当大的开阔地，又是陈姓祠堂集中之处，七八幢祠堂除了祭祀之期，就空闲着。地主庄园和民房也不少，各直属单位，可以分开驻扎办公。四纵队迁去后，指挥部和美国人的招待所设在黄河堰，参谋、文书、译电等室设在陈振先家，副官室设在黄河堰的对门里里，军需室设在白鹤寺，军械室设在松山湾，电台设在同泰号，特务队驻长塘湾。分布就绪，何际元为了扩充实力，争取更多的美援，决定在田坪里办一期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得到了戴笠批准，并派特训班副主任陶一珊来督办。

1945年年初，田坪里中美特训班开始大量招收学员。这期学员的采源，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宁乡和附近几县的知识青年；（二）现有部队中陆续补充的兵员；（三）在乡的失业军官；（四）部队干部推荐的亲属；（五）较有声望的在乡军官，自行组织了队伍，事先与指挥部取得联系，可集体参加受

训，结业后编入四纵队并任队长。这样很快招收了1000多人，元宵节后开始编队，进行训练。

学员编成六个队：第一队为军官队，队长黄龙，第二至六队为学员队，队长分别由徐德亮、肖荣敷、肖庆鑫、苏德芳、刘铁肩担任。每个队驻扎一个祠堂，房屋较宽裕，都有小操场，另外还租了一个百谷大丘（约占地20亩）作总操场，场内还搭起指挥台，作为训话、讲演、阅兵、演戏之用。每天清早，各队都要来此集合，何际元、聂宗奭等到场时奏军乐（县政府的乐队长期留部未退回去），总队值星官报告人数后，随后登上指挥台，吹号升旗，何际元再作精神讲话。

有时何际元因事未到或者到得较迟，由指挥部参谋何远道登台指挥大家唱班歌，歌词较长，很难记全，其中一段是这样的：“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民族的主权，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

这期中美特训班，在全国范围来讲，算是第五期。在长塘湾设了一个总队部，主持实际工作的是副指挥聂宗奭（原副指挥孟尉民已离部），他兼任副总队长。政治军官有苏公望（不常来）、喻勋衡、贺仰山、张树声等，军事教官都是美国人，除原来的11人外，后陆陆续续地增加了一些，有时达20余人，大部分时间是由白克利等人进行军训，他们仍然讲授美国新式武器的性能、使用方法，以及擒拿、侦察、斥候、爆破等课目。一般说来，这期训练比南岳那期办得更认真一些，说明美国人与四纵队的关系更密切了。

经过3个多月的训练，于5月份结业，该班举行了较隆重的结业典礼，还搞了个授枪仪式，由一个美国教官拿一支卡宾枪在台上授给学员代表，表示学员的武器都是美国赠送的。宁乡县长陈敦和与一些著名士绅都应邀参加了结业典礼（原县长缪昆山已交卸）。晚上演唱了花鼓戏和学员自编自演的一些文

艺节目。

结业学员，除一小部分补充各支队、大队外，还编了两个教导营，并委派袁学坡为第一教导营营长，徐德亮为第二教导营营长。另外，学员中有少数十五六岁的青年，不宜赴前方参战，都编入特务队在后方担任警卫。端午节后，两个教导营都开赴前线，配合一、二、三支队进行活动。

七、捕 捉 日 军

抓日军俘虏，是四纵队的一个主要任务，由于四纵驻地分散，成员大都穿便衣，多数又是久经锻炼的军统特工人员，行动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又规定了高额奖励，抓一名日俘奖谷20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南岳出发，到日军无条件投降的一年多时间，共抓到日俘近300人。

四纵队抓日俘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日军行军，常有少数掉队的，他们从树林中突然冲出，截掉尾巴上的几个，迅速转移；有的日军据点人数不多，搞伙食的、挑水打杂的，常驱使中国人效劳，他们装成老实农民，设法打进去当伙伕，百依百顺，取得信任。等时机成熟，里应外合，有时一个小据点10多人全部就擒；在湘潭鼠头市日本驻地，有个随军的三井银行女职员，是大坂人，名叫春堂芳子（译音），她常代伙房出外买菜，四纵队二支队何惠中部的组员，扮作卖菜的，故意挑些已晒黄了叶子的菜接近女职员，女职员嫌菜已枯黄，那组员说，我的菜园就在那边不远，任你去选，女职员随他走进一处菜地，刚弯腰采菜，组员忙在菜担子下取出麻袋，向她头上罩去，翻转口子倒背起就走进山林了。

各支队的日俘，都陆续解到指挥部特务队关押。特务队驻在长塘湾，这里原是大地主陈保珍的住宅，空着一排仓库，作临时监房。有了50个俘虏就解往洪江转重庆，解送俘虏头段路

程都是步行，最初几批是经过娄底、杨家滩到宝庆(今邵阳)，由美国十四航空大队所管的汽车队接收，汽车队长是一位大胡子(不知姓名)，他给了收据后由他亲自驾车经洪江转重庆。后来宝庆沦陷，解俘路线改经壶天、桥头河、新化、烟溪、溇浦到辰溪，再由汽车运往重庆。先后由田坪里解出的俘虏计5批，共250人，都是由特务队长戴模宗率队员押解的。

押在长塘湾特务队的日俘，一般都服从管理，但是也出过一次风波。原来指挥部及各单位的粮食，是由九战区兵站总监部直属兵站分监拨来的，全是稻谷，因此，在距指挥部五六里的地方，设了一个临时米厂，用土制的碓子多部，把谷碾成大米。指挥部利用日俘劳力，用麻袋装米陆续拾回分发。大约是6月底的一天，派了12名俘虏，由特务队派4名队员各携卡宾枪押运。这4名队员部是不久前在特训班结业后分来的，年龄只十五六岁，经验不足，警惕性不高，在向米厂进发时，走到石板桥附近，离米厂约半里路的地方，4个俘虏突然把4个队员抱住，其余的一涌而上夺了卡宾枪后，逃往深山。青年队员哭哭啼啼回部报告，何际元大发雷霆，责令特务队长戴模宗立即追捕逃俘，找回枪支。但田坪里周围都是高山密林，都里能找到踪迹，只好严密封锁四周关卡，日俘无法逃出天罗地网。5天以后，饿死5个，其余7人也东倒西歪，无力行走，全部被数抓获。

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指挥部迅即开赴长沙，还有30多名在押俘虏(包括一名女职员)都送交宁乡县政府，后来都遣送回日本去了。

八、四 纵 队 的 纪 律

四纵队的纪律很坏，在宁乡乃至湘中地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由于它的代号叫“正义军”，人们背地里称之为“正义伯

伯”，意思是惹不得。

四纵队的纪律坏是有原因的：（一）部队建制特殊，没有士兵，一般成员叫组员，级别为准尉、少尉，因此骄横自大，如果对他们稍有怠慢，便把胸膛一拍，说：“老子见官大三级”，老百姓只好敬而远之。（二）他们分布在广大沦陷地区（达10多个县），离指挥部远，何际元虽然也规定了一些纪律，但鞭长莫及，很难真正执行。（三）他们都是穿便衣，不挂符号，闯了祸，犯了法，你也弄不清他是哪个单位的，更不知道其姓名，受害者只好忍气吞声，不与计较。

在沦陷地区，他们驻地不独房子要选好的，一切生活物质，都要当地供应；队长、组员有事去指挥部，或是队与队之间联系工作都要坐轿子。于是就借轿子，派轿夫，还不能延误片刻；对他们的家属都要喊“太太”，要选择最安全的地方住下，并要好好招待，且不付钱。他们还索取各种财物，稍不遂意，就会受到咒骂，甚至拳足交加，若有抗拒，还会加以上汉奸罪名，置人于死地。

他们还到处发展“外围”成员，纠集流氓地痞，充当情报员、勤杂兵等。对在国民党机关、部队任过一官半职，能说会道的，还派为参谋、副官、文书，不须上报备案，就地供给伙食。这些人通通都算外围，常常比编制内的人数多上几倍，他们比正式的“正义军”还凶，敲诈勒索更甚。

另一方面，何际元也确实三令五申，要部队严格遵守军纪。还惩办过一些人。华容县有个姓部的“外围”分子，奸淫掳抢，无所不为，经揭发后，抓到田坪里枪毙了；一支队上校副支队长兼大队长喻伟龙，违法乱纪，撤职后抓到指挥部关押了一段时间；教导二营营长徐德亮，秉承何的意旨，将一个强奸妇女的中尉联络员喻季冬就地枪决了。这样的事例还有几起，但四纵队的纪律，仍未见明显好转。

九、移防长沙与整编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晚田坪里指挥部的美制收音机里，播出了美国旧金山来的消息，在场人员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指挥部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跑到特务队，告诉日本俘虏，他们坚决不相信，当即带了几名俘虏到指挥部，“美国知音”正在反复播放这一特大喜讯，讲的是中国普通话，日俘虽然不能全懂，但也懂得了大意，听罢，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美国人哈拉巴格，连忙拿起他的拍摄机，拍下了这一精彩镜头。哈拉巴格在宁乡一年多时间，拍下的纪录片不少，除有几次与日军作战的镜头，是他导演的，其余如中美特训班开学、结业、生活、学习、操练、解送日俘、接运美式武器等等，都是现场摄制的。何际元接到上级电令后，率部向长沙进发，他除分电各支队、各教导营速向长沙城郊集中外，急忙将在押的日俘30余名移送宁乡县政府接收，自己随带部分参谋、副官、军需人员及特务队的绝大部分人（留少数在田坪里担任警戒）随即出发。其他人员在田坪里搞清理工作，准备不久全部迁移长沙。美国人因即将归回自己部队建制，没有随行。何际元一行，经道林转靳江河，在那里停留了几天，派人至长沙摸清情况，与警察局、商会取得联系后，整理好了特务队的军容（恰好在兵站分监部领到了新制服），于8月20日左右正式进入长沙市，由商会负责人迎接并带路，有意穿过一些主要街道，所经之处，家家鸣放鞭炮，岗警立正敬礼，最后到达东茅巷原长沙银行暂时驻扎下来。

湖南地区受降由王耀武主持，何际元部队没有接防任务，不久，调靖港整训，并在靖港进行了缩编，教导二营被裁并，何际元于是年冬辞职去重庆（这时尚未还都南京），由副指挥聂宗奭代理，在此以前部队主要干部也有所更换，一支队长

李济民改由胡军山接替，二支队长王力忠改由郑茂山接替，三支队长温应冰仍任原职，后来这个支队仍归还了一纵队的建制。

1946年1月，四纵队奉调河南漯河，农历正月初相继到达该地，分驻漯河市及附近村镇。3月1日，该部与江西行动总队和一个水上爆破大队，合并编成交警第五总队，聂宗奭任总队长，别动军第四纵队的番号至此结束。

保 密 局 的 外 勤 站

保密局的外勤站，先后设立的有北平站、河北站（设在保定）、天津站、山西站、山东站、青岛站、河南站、陕西站、甘肃站、新疆站、拉萨站、云南站、贵州站、川西站（蓉站）、重庆站、康定站、湖北站、鄂北站、湖南站、江西站、安徽站、南京站、上海站、苏南站、苏北站、浙江站、福建站、台湾站、广东站、广西站、承德站、沈阳站、长春站、察哈尔站、绥远站、河西站、宁波站、琼州站、香港站、南朝鲜站、西贡站、新加坡站、曼谷站、开罗站、卡拉奇站、菲律宾站等。尔后，在站以上，设立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徐运举任区长）、西北特区（胡子厚任区长）、广州办事处（郭旭任主任）、重庆办事处（唐治任主任）等。

（段国强）

保密局湖南站始末

黄康永*

保密局湖南站的建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要求民主与和平，反对专制独裁。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表面撤销，而将中统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军统则一分为四，即：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交通部警察总局、内政部警察总署。

军统的指挥形式虽然起了变化，但仍相互配合，原则上仍由蒋介石秘密指挥，形成了“秘密指挥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形式。从表面上看，军统虽然划分成四个单位，但实质上仍然由保密局秘密统领。军统自局长戴笠死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巨头因争权夺利，造成组织、人事上的分裂，形成了广东派、浙江江山派、湖南派。我是湖南人，经李肖白的介绍而进入军统，尔后在军统局的组织人事部门工作，与唐纵是同乡，被毛人凤视为湖南派。毛人凤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暗地里培养和提拔江山人。要建立江山人的系统，就必须将人事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亲信手里。他首先抓住当时担任人事处长的李肖白在特检处结束时的经济问题，撤了李的职务，把他贬到湖南去担任省会警察局局长。那时，我奔忙于四川、云南之间，清理军统局的财产，调整该地的人事，直到1946年10月，

* 黄康永曾任国防部保密局湖南站站长。

我的任务才基本完成,然后转赴南京,在马台街22号见到了毛人凤。他对我说:李肖白已去长沙当警察局长了,我想让你团长长沙担任保密局湖南站站长,你们在王东原主席手下工作,可以相互配合,为家乡作点贡献。当时,我想留在上海或杭州的公开机关,对于去湖南从事秘密工作,不仅不情愿,而且还有抵触情绪。可毛人凤坚决不同意,我只得走马上任。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保密局认为湖南虽是共产党的发源地之一,但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又远离前线,遂将湖南站列为乙种站。当时,保密局规定乙种站站长的军衔是上校,这与我当时的军衔和身份不符合,我曾任军统局人事处行政科长,长期主管过军统局组织人事工作,1945年调任军统局台湾工作人员训练班少将副主任,我以少将军衔担任乙种省站站长,虽然没有降级,总有一种被贬的感觉。保密局布置组组长赵斌丞是我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1943年我将他从华北沦陷区调入军统局华北地区担任副区长,推荐他为保密局布置组组长。他挺讲义气,召集布置组副组长毛钟新、科长李葆初和任鸿传研究后决定,把湖南定为共产党隐蔽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将湖南省站升格为甲种站。这不仅提高了站长的军衔,也增加了编制。当时,甲种站长是少将,副站长是上校,下辖两个甲种组、两个乙种组、一个丙种组、十个直属通讯员。在这个时期,保密局的省站或地区站完全是秘密的,没有以任何机关名义作提护。保密局为了保证各省站的安全活动,对于各省的站长,都请国防部委以专员名义作为公开职务。

1946年11月,我从南京到达长沙后,住在耕园——军统湖南站站本部,并要军统湖南站站长唐秉骢拨出一部分房子作为保密局湖南站的临时办公处,尔后,我就开始搭架子,找来在军统局本部工作的同事、学生,组成了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黄康永,上校副站长宋世杰,中校督察蒋祖述,上校会计

主任唐名扬，中校总务站员吴振楚，中校人事站员熊传慈，中校司法站员黄采藻，中校情报编审易鹏飞、刘炳文、黄荣杰、李政纲，少校编审吴羽遼、罗卜之，上尉事务员唐宜青，上尉会计莫寿卿，上尉译电员黄干舆，中尉译电员易湘君，上尉文书黄采芹、毛钟湘，中尉文书李银辉，中尉收发郭大德，中校电台台长李文俊，报务员三人，上尉司机薛增庆，少尉司机一人，警卫四人，勤务四人，伙伙三人。

对于军统湖南站没有暴鹏身份者，由我接收录用，其它人或随唐乘驺转入第二十四集团军调查室，或送入衡山南岳军官总队转业，这些转业者大都依仗关系，在各个行业中吃得开，如军统特务刘哲民担任了交通部运输总局长沙第二运输处处长，李肖白担任了省会警察局长，1947年后，进入公开行政机关的军统特务也逐渐多起来了。后来，我根据工作需要，在站本部设立了10个直属通讯员，有黄义讲（搞学运）、姚国光（从事印刷工人工运）、江郁文（驻平江）、陶然（驻浏阳）、刘惕乾（驻岳阳）、欧阳达（驻衡山）、阳之永（驻醴陵）、常维鼎（驻衡阳）、李湘纲（驻宝庆）、陈拔萃（驻常德）。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又加派了张云樞（长沙市总工会负责人）、谢声扬（长沙市总工会理事）、罗大凡（湖南大学教授）、李霞（湖南大学训育员）。1949年又增派陈浴新为特邀通讯员，周治中为上校试用通讯员。外勤方面，设有三个组，即衡阳组、常德组、芷江组。衡阳组是甲种编制组，组长是常维鼎上校，副组长是欧阳璋中校，组台台长已忘其名，通讯员有柳达泉、黄荣杰、吴寄等。常德组是乙种编制组，组长是罗文杰上校，副组长兼文书是蒋光樞中校，组台台长是符健，通讯员是瞿冈生、杨济华、陈富庆等。芷江组也是乙种编制组，组长为方天印中校，副组长兼文书是金忠国中校，上尉译电员黄干舆，组台台长已忘其名，通讯员为王亚黄、梁文献

等。下属组织的人员，因工作关系，不少人经常调动，其调动情况已记忆不清了。

湖南站的活动方式

为了保守秘密，我不能让保密局湖南站站本部在长沙人所共知的特务巢穴——耕园长久办公，我在南门外燕子岭找到一个比较隐密而又寂静的院子作了站本部地址，由副站长宋世杰偕同妻子赵书琴住在那里作掩护，我住在司马里的一幢房子里，上校会计主任唐名扬（他是保密局经理处派来的）因财务上的支出，往来的关系比较复杂，也另租赁了一幢房子作为办公室。湖南站站本部办公处就作了这样的安排，以保持秘密活动方式。

当时的湖南站，以收集情报为主。我因被贬回湖南，总有郁郁不得志之感，对于向保密局提供情报，我是敷衍塞责，大多数情报是抄袭报纸或流传于大街小巷的小道消息，以应付差事。这样，湖南站既没有受到批评，也得不到表扬。

为了掌握湖南党政军等方面的情况，互相交换情报，我沿习参加湖南省特种会报会议。当时，参加会报会议的人有：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书记长莫萱元、三青团干事长兼省警务处长李树森、长沙军警宪督察长陈亲民、宪兵第十团团长曾佑民、省社会处处长刘修如、省会警察局长李肖白、省保安副司令陈为韩、省党部调查室主任韩中石、省教育厅长王凤喈、省民政厅长刘千俊、财政厅李锐偶尔也参加。我化名“洪烈”，代表保密局湖南站参加特种会报。当时，这个“特种会报”由省主席王东原召集，实际由省政府秘书长刘公武主持，“会报”的主要内容是交换情报和协商有关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由于湖南站的活动是秘密的，我在这个“会报”中，只是听取各方面的情况，从未提出过要解决的问题。

当时保密局在长沙能控制的公开机关和掌握职权的执行机关有：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肖白）、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调查室（主任唐乘骝）、湖南保安司令部军法室（主任叶宰鼎）、长沙军宪督察处（督察长吴建树）、湖南省警务处（潘汉遼、孟宪洲先后担任副处长，刘人爵、罗荃、陶松龄担任过科长）、新社会建设事业协会湖南支会（书记长段复），这些机关的领导和主要人员，大都是我的同事、朋友。当时湖南站对这些机关并没规定如何联系，由于我与长沙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相互交往比较密切，因而工作上也就相互照顾。蒋伏生任长沙警备司令时，我介绍吴建树担任稽查处长；蒋琨担任长沙市长时，要我介绍一位主任秘书，我就将警务处科长罗荃介绍给他。

我还利用湖南站的职权办了两件事。第一件，1947年三四月间，我接到保密局的命令，秘密调查李宗理在长沙的财产，并将李转入陈淑芳户口的财产一并具保。当时，我对李宗理并不熟悉，就派直属通讯员方天印秘密调查、了解李宗理在长沙的财产。此事经湖南站前任站长金远询向我说情，谓李是王耀武的总务处长，要我关照，加上李宗理在酒楼设宴道谢，我就向保密局作了查无实据的答复。以后，李在南京竞选立法委员，被人控告，保密局将他逮捕关押，我这时正在南京参加站长会议，再一次向保密局作证，李宗理又被释放。从此，李宗理成了我的挚友。第二件，李肖白到长沙任警察局长后，毛人凤对他在特检处的经济问题，仍在追查，毛将这个案子移交国防部军法局审办，军法局局长徐业道是我们在军统时期的老朋友，也是李肖白的挚友，但对军法案子，不能凭意向判处，必须要有旁证。对其经济问题，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负责转帐，由保密局承担了这一责任。我们向上反映李肖白生活清苦，郭旭以保密局的名义担保了他的经济消耗。徐业道到长沙进行了一天调查，然后，李肖白去南京接受了国防部军法局

的审讯。因旁证齐全，军事法庭宣布不予起诉，此案在我们的关照下得以了结。这两件事对我以后的活动十分有利。

保密局经常要与国民党党、政、军等机关发生联系，因此，对站长、副站长、督察和组长都颁发了一种外勤职员证，其使用规则如下：一、本局为证明派驻各地负责同志之身份，特制发此证。二、领证人于绝对必要时，方可将此证作为身份之证明，如遇特殊情况，领证人可向当结军政长官出示，非绝对必要时，不得使用，以免暴露身份。三、本证使用人因工作需要得凭本证通过戒严区域。四、本证不准转借，若有藉此招摇撞骗者，经查实后从严惩处。五、本证如有遗失，领证人即登报声明作废，并报局听候处理。六、领证人离职时应将本证缴回本局注销。七、本证有效期限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有了这个护身符，我们活动更为方便。

1947年，郑介民调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毛人凤升任保密局局长，这时期保密局的人数已由军统局时期的13万减少到7000多人。毛人凤在军统局曾长期代理主任秘书职务，对人事关系和应如何发展，心里有一本帐。他独揽大权后，决定保密局与从军统局划分出去的公开单位举行公秘单位会报制度，由保密局统一领导，会议主要内容是交换结报和协助保密局各省站解决疑难问题。不久，保密局又通令各省站建立公组，以加强省站的秘密活动力量。我接到通令后，遂在营盘街3号我自己的家里召集李肖白、刘哲民、吴建村、刘人爵、罗荃、宋世杰、蒋祖述等举行会议，商讨建立公组的计划。李肖白首先讲话：“我们团体（指军统特务组织）自戴先生去世后，群龙无首，现在，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运用公组形式，是团结的好办法。”李肖白是戴笠最信任的高级特务，他的意见，大家都接受了。并认为建立公组可以加强‘湖南’站的作用，最后决定一个单位只要有三人以上的特务，就可秘密地建立公组，由其中职务最

高者任组长，公组的经费自行筹措，不足，湖南站给予补贴。

不久，湖南站成立了8个公组，即：1、省会警察局公组，李肖白任组长，主任秘书彭湘华任副组长兼文书，下辖两个小组：第一小组由省会警察局内部的20余名特务组成，彭湘华兼组长；第二小组由警察局刑警大队的10余名特务组成，刑警大队长戴德盛任组长。2、长沙军警宪督察处公组，由督察处内特务10余人组成，督察长吴建树任组长。3、交通部运输总局第二运输处公组，由第二运输处内特务10余人组成，处长刘哲民任组长，该处警务组组长王兴国为副组长。4、湖南警务处公组，由警务处内特务七八人组成，科长刘人爵担任组长。5、湖南保安司令部军法室公组，由该室的特务5人组成，股长李香龄担任组长。6、长沙税务局公组，由该局里的特务六七人组成，局长李重德担任组长。7、长沙市政府公组，由市政府里的特务4人组成，主任秘书罗荃担任组长。8、1948年8月长沙绥靖公署成立后，该署第二处共有特务10余人，建立了第二处公组，由公署第二处处长王力担任组长。

湖南站在公组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每周由湖南站副站长宋世杰和督察蒋祖述轮流召集会报一次，互相交流情报。由于长沙形势变化快，我在长沙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直属通讯员王宾任组长，李定担任副组长，组部设在长沙又一村五堆子，该组下设两个小组：第一小组为工运组，长沙市总工会理事长张云福担任小组长，理事谢声扬担任副组长。我们利用这些人收集情报，防范共产党利用工运反对国民党的统治。第一小组下辖10余个分组，都是按照职业工会性质建立的，如泥木工会分组、粪码头工会分组、箩码头工会分组、成衣业工会分组、理发业工会分组、印刷业工会分组、剃子工会分组等，由每个职业工会的理事长担任分组长，再由各分组组长在各工会里发展成员作为通讯员。第二小组为学运组，由王宾兼任组长，在学校物色

老师、学生作为通讯员，主要任务是防范中共地下组织在学校里的活动与发展，并让职业特务装扮成学生去破坏学校进步组织的活动。为了防范共产党向湘西发展，特设桑植秘密组，由罗文杰代为督导、指挥。这个时期，湖南站已从秘密形式向公开化发展。

湖南站办理的几个行动案

根据保密局的安排，湖南站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因而，湖南站没有安排行动人员，也无监狱，对于行动案子可以不予理睬。但特务的天性就是喜欢管得宽，以此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如抗战胜利之初，汪伪汉奸周佛海的妻舅杨淑一带着家眷避居长沙，保密局命令湖南站将杨逮捕，并解送南京。接到命令后，我要求原湖南站长、现任二十四集团军调查室主任的唐秉骝协助我完成这一任务。唐派该调查室特务队长欧小通协助我，省会警察局长李肖白派了该局刑警大队长戴德盛来助威，我们在长沙的一旅馆里找到了杨淑一夫妇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孩，便将他们逮捕，寄押在第二十四集团军调查室监狱，尔后，我以湖南站长名义令欧小通押解杨淑一夫妇去南京交案，毛人凤对湖南站能迅速完成任务感到满意。从此，行动工作也成了湖南站的一项任务。

1947年6月，我接到衡阳组的情报，说衡阳发现了反蒋宣传品，据说是出于成铁侠的指使，因没有具体线索，我再饬衡阳组详细查报。就在这时，省主席王东原邀我参加官邸宴会，饱餐之后，王东原拿出一封成铁侠写给他的信要我看，我把信看了一遍，发现成在信里大骂蒋介石，痛斥王东原贪脏枉法，指责王东原的太太利用王的声望做生意，敲诈勒索。看完信后，王东原对我说：“成铁侠在我手下任过旅长，我希望你们逮捕他后，交我处理。”至此，我已明白王东原宴请我的目的。回

到站里，我同副站长宋世杰商量，认为湖南站没有行动执行权，若要密捕人，须经保密局批准。这样，对王东原不利，不如胁迫他出境。我向王汇报了我们的想法，王东原表示同意。我遂密令衡阳组配合中国社会建设事业协会湖南支会，胁迫成铁侠离开湖南，成就避居香港。

1948年5月，保密局在浙江杭州逮捕了中共华中军事特派员张弩，经保密局威逼利诱，张供出了中共在华中的武装活动情况，说湖南有他们的据点。保密局密令湖北站长余克剑偕同行动组长郑世勋来长沙进行侦捕工作，并令湖南予以协助。余克剑一行到后，我将他们安置在浏正街中国社会建设学会的公寓里。尔后，我通知省会警察局公组组长李肖白、长沙军警宪督察处公组组长吴建树派员协助余克剑，我另派王宾担任联络。我们根据张弩提供的线索，追踪侦查，分别在长沙、祁阳、郴县等地密捕了张斌（中共华中军事特派员）、刘琪（成铁侠之妻，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等七名中共地下党员。根据保密局的指示，这次密捕的七人除将刘琪留在长沙作钓饵外，张斌等六人交余克剑押解武汉，关入华中长官公署军法处。据说李宗仁代总统时，宣布释放全国的政治犯，张斌等人均被释放。叛徒张弩因无利用价值，则被秘密处死，沉尸长江，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这时，长沙的反战运动，日渐进入高潮。保密局指示湖南站选择一个比较有身份而又激进的民主人士作为打击对象，我们选择了益阳籍的省参议员陈云章，因为蒋介石掀起内战后，他以参议员身份，大声疾呼“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还大骂国民党背信弃义，他的这些活动，无疑是向国民党公开挑衅。湖南站对此向保密局作了汇报，并提出将陈云章列为暗杀对象，这引起了保密局的兴趣。毛人凤来电指示，这次暗杀计划要周密，不得泄漏秘密，绝对防止因此案而引起

的风潮。保密局湖南站以收集情报为主，站部没有成立行动队，也没有专职的行动人员，我指定长沙组长王宾从工运小组里挑选适当的人选担任行动员。副站长宋世杰主张慎重，他秘密地提醒我：在反内战的风头上，暗杀一个民主人士，不仅压不下反战风潮，还会引起更大的反战运动。张镇国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不是前车之鉴吗？我认为他的顾虑有道理，便向他表示：毛人凤要我扩大事态，这是给颂公制造麻烦。如果我们不执行命令，毛人凤也不会放过我们，宋世杰也就没说什么了。

就在这时便，张严佛从南京来到了长沙。我将此事向张作了汇报，张严肃地问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张打的什么主意，就微微地哼了一声：“不执行又怎么办？”张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对于暗杀陈云章的问题，我虽然向宋世杰表态拖一拖，表面上还得装腔作势。遂秘密地召集了宋世杰、刘炳文、蒋祖述以及长沙组组长兼学运组长王宾、工运组组长张云福在我家里策划。因我和省会警察局长李肖白均与陈云章相熟，决定先由我与李肖白用汽车邀请陈云章去北门外拜访李宗理，然后去拜访长沙商会理事长陈宗陶，邀请陈云章坐我的车子，我车子的消声器先行拿去，使车子发动后产生较大的噪声，王宾则在工运组里选择三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由王宾交代作案的办法，当我将陈骗上车后，用绳索将陈勒死，尔后在郊区无人之处挖下深坑埋尸掩迹。我们讨论后，都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方案定下后，我还是抱着拖的策略，要宋世杰再向保密局报告，并要蒋祖述向督察室汇报，说明我们对暗杀陈云章已有了妥善的布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秘密执行。现在回想起来，要是当时我坚决执行上司命令，那就会酿成我终身的遗憾。

湖南站的应变计划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保密局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毛人凤向各省站颁布了应变计划(原则上的策略)，其要点是：1、各省、区的秘密单位，一律转入地下活动，不得暴露身份。2、原单位人员均应切实潜伏，其暴露身份的，一部分去公职单位任职，一部分可以准其回籍等待时机。3、本单位应补充的人员在本地区物色，要有可靠的社会背景和掩护职业，以便于潜伏。4、所有潜伏组各配电台一部，密码一本，报务员由局本部另派，报务员的身份由各潜伏组组长设法掩护。5、各组人员之间一律不许发生横的联系，组长和通讯员之间由交通员秘密联络。6、所有潜伏单位均先给一笔活动经费，作为筹划潜伏的准备基金。7、本计划由各单位负责人亲自督促，秘密进行。

我接到应变计划后，立即和副站长宋世杰、人事站员刘炳文、督察蒋祖述三人进行了讨论。我们决定，湖南站仍照原来的公开形式，参加湖南省“特种会报”会议。暗地将能潜伏下来的人员转入秘密形式活动，先建立一些秘密性的关系，并在各组的人员中选择能潜伏下来的先转入地下活动，为防变故，我又在长沙物色了几个有条件潜伏的人员，以准备顶替别人工作。我还通知长沙、衡阳、常德、芷江、桑植等五个外勤组，要他们遵照潜伏计划行事。

我首先在湘北建立了一个滨湖潜伏组。张华芝(我的学生，自愿留在湘北活动)任组长，局本部指令汉口保密局电讯支台拨给了电台一部，该组人员，张华芝可自行调用。由于湘北地区是湖南的北大门，我又派闻松青先担任秘密通讯员，准许他物色潜伏人员，必要时可以成立潜伏组。当时，湖南派驻岳阳的直属通讯员刘惕乾，表示愿意潜伏下来，但他长期呆在

岳阳，做潜伏工作很不可靠，由于保密局的督促，我勉强同意了。因张华芝、周松青、刘惕乾三人较熟，我严令他们不得发生横的联系。在浏阳、平江方面，我要江郁文先行物色能潜伏的人员，由于江郁文在平江也是潜伏通讯员，我通知他，如果能潜伏下来，就继续指挥，否则撤回长沙另行分配工作。同时，我的同学李道援，他是平江县的参议员，也想潜伏下来，他知道我是湖南站长，要我将他介绍给平江县警察局长吴灿英，希望两人能互相配合，我表示同意但没有安排李道援的任务。

至于常德方面，我令常德组组长罗文杰负责安排湘西方面的工作。罗接到通知后，秘密地到了长沙，他向我提出两个方案：第一，将湖南站保存的200余支长短枪发给常德组建立武装，人员和粮服由他自行筹措。我在湖南站把罗文杰当成心腹，因此，同意罗自行组织武装，并将湖南站所存枪枝弹药全部拨给罗。第二，他可利用在湘西帮会的势力，以“罗二爷”的身份去工作，请求将常德组全部经费作为潜伏活动基金，我赞同这一建议。衡阳组和芷江组虽然接到湖南站的秘密通知，但都没有汇报具体计划，只是申述他们有8年抗战的潜伏经验，自当遵照秘密原则办理。在长沙，我的精力主要放在长沙市总工会方面，我要总工会理事长张云福，理事谢声扬，杨绍铭、杨运生等在工人内部发展潜伏人员。谢声扬秘密物色了两位女性作为解放后的潜伏特务，谢曾经陪同这两名年轻女护士与我在茶楼雅室里见面，她们都愿意以牺牲色相作为掩护。

1948年7月，程潜回到湖南后，湖南的形势迅即起了变化，我虽然对保密局秘密通知的潜伏计划作了安排，但没有督促和检查。湖南站的应变计划，也就因此停了下来。

程潜主湘后的湖南站

程潜回湖南后，经长沙绥靖公署中将高参杨继荣引进，我在省政府大楼主席办公室见到了程潜。杨继荣介绍说，我父亲同叶开鑫、贺耀组等都是结拜兄弟，毛人凤要我回长沙负责保密局湖南站。我向颂公说明了湖南站的一些情况，并请颂公多加指导。颂公笑着说：“你们有严格的纪律，你哪里听得进别人的话？”我诚恳地回答：“颂公是我们的前辈，对于目前形势的认识，比我们看得深，看得远，如果颂公在哪方面用得着我，我随时听候差遣。”杨继荣是我进入军统的引进人，他对毛人凤一向看不起，自1946年戴笠死后，他就追随颂公，先在武汉行辕担任处长，1948年程潜在南京竞选副总统时，杨在南京成立了程颂公竞选副总统办事处，为颂公拉票，由于蒋介石希望孙科当选，劝颂公退让，答应将湖南交他掌握。杨又随程到长沙出任长沙绥靖公署高参，甚得颂公的信任。

当时，程潜住在湖南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家里。程颂公于写字之外，嗜好打麻将。我曾将程潜在长沙的表面活动向保密局作了汇报，保密局指示我们要将程潜的言行上报。我派通讯员方天印前去秘密调查，方是湖南讲武堂的学生，他又介绍陈浴新为湖南站特邀通讯员。陈浴新有一个情报，说程潜在湖南准备走中间路线，他已通过中共关系，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请人民解放军不要进入湖南，他也有报告给蒋介石，希望国民党军不要进入，使湖南暂时成为中立区，这个情报上报后，蒋介石产生了疑虑。

7月24日，程潜发表了施政方针，指责共产党，大谈戡乱“剿匪”策略，并说：“今年我已67岁，决定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拚命，纵然到了100岁，我还有勇气与‘共匪’拚命到底。”8月10日，程潜又发表了“告湖南民众书”，痛斥共产

完。蒋介石得到湖南站的这份情报后，对程潜极力赞赏，但仍令湖南站继续侦查湖南各方面人士的反映。9月初，济南解放，锦州被围，战局的发展异常神速，程潜开始了新的行动。有人建议撤销“戡乱委员会”，程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撤销的命令。我去省政府大楼探望程颂公，认为撤销“戡乱委员会”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和非难，颂公答复说：“人民解放军节节进逼，蒋军已无抵抗之力，如果我们仅仅安上一个‘戡乱’的空名，自己又没有力量，势必形成反‘戡乱’风潮。”我将程的答复向保密局作了汇报。毛人凤认为程潜摇摆不定，应加强对他的监视，并要杨继荣阻止进步人士接近程潜。因此，我判断毛人凤对湖南站提供的情报产生了怀疑。于是，我以布置潜伏为藉口，赴湖南站各组视察去了。11月2日，我离开了长沙，准备先到常德，然后向桑植、芷江出巡。目的是避免保密局向我施加压力。不料，毛人凤竟派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张严佛来督导湖南站的工作。11月10日，我在常德接到宋世杰的电报：“张严佛先生已到长沙，有急事面商，请停止前进。”11日我返回长沙。12日上午，张严佛来到我家里，他说：“毛人凤要我来主要是检查一下湖南站的工作，据我在局本部了解，湖南站的情报不符合毛人凤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对程颂公在长沙的活动，没有具体审核，毛人凤对老头子不施交差。”他迟疑了一会，又说：“颂公在当第六军军长时，我是政治部秘书，颂公对我很好，我们都是醴陵人，我回长沙，主要是看看颂公，视察不过是走走过场。”我与张严佛同在重庆的时候，关系比较密切，这次，他回长沙，独自一人住在旅馆里，我邀请他住到府后街静园我家的后客房里，他同意了。

张严佛住到我家后，每天晚上到颂公家去聊天。有一天的晚上，他没有去颂公处，却坐在客厅里同我闲聊。他说：“这次到长沙，除了检查和督导湖南站的活动之外，毛人凤要我找一个

合适的人接替你的职务。”我听了这句话，不仅没有抵触情绪，反而觉得一身轻松。我处在保密局与颂公之间，左右为难，这下好了，我向张严佛提出：希望由金远询来接替。金在抗战时期，曾任湖南站站长，后经中美合作所保送去美国培训，1947年回国后闲居长沙，没有委派适当的工作。他对湖南情况比较熟悉，他如出任湖南站长，最为合适。张严佛摇头说：

“我已向金远询提起过，他声称，即将去南京任内政部警察总署主任秘书，要他出任站长，他哪里会同意？”

张又表示：“为了保护湖南3000万人民的安全，颂公主张湖南应走和平自救的道路，因此，湖南站站长还是不动为好，这样可以使颂公的和平策略不受蒋介石的干扰”，我点头同意。最后我仍向张严佛建议，希望他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接替我，免得他受到毛人凤的怀疑。

1948年10月初，程潜在应变的名义下，提出了“戡乱救国五项公约”，内容是：1、以精诚团结捍卫国家；2、以公正廉明改良政治；3、以精忠勇敢整训军队；4、以勤俭朴实建立经济；5、以刚中乾健“剿灭共匪”。对此我向保密局作了汇报，并强调程潜有“剿匪”的决心，只是湖南方面的兵力不足，应该充实整编。程潜的公约公布后，蒋介石竟批准湖南增编8个师的计划，由于形势发展太快，计划没有实现。

陈明仁调回湖南的内幕

陈明仁是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以作战勇敢而闻名，1947年，他在东北因坚守四平街而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并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因他得罪了陈诚而被撤职。陈明仁一气之下，在南京闭门不出。张严佛与陈明仁幼时是同窗好友，交往密切。陈闲居南京时，张经常去陈家闲谈，张虽然是保密局高级特务，陈对他并不顾忌，视为知己。张严佛向毛人凤

反映陈有反共的决心，希望毛人凤向蒋介石进言起用陈明仁。这时，白崇禧到武汉主持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统率有不少黄埔将领，白有意起用陈明仁，便向蒋介石推荐陈为武汉警备司令，加上毛人凤说陈明仁是反共健将，放在武汉，不仅可以钳制桂系，而且可以团结黄埔系将领，蒋介石就同意起用陈明仁。陈于10月间任武汉警备司令，并邀请张严佛一起去武汉，得到了毛人凤的同意。张到武汉后，将湖北站的组织予以调整，并介绍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兼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

11月初，毛人凤派张严佛去两湖视察，并督导湖南站的活动。他首先与陈明仁研究了如何靠拢程潜的方案。两天后，张到了长沙，他对程潜说陈明仁愿意回湖南，程潜表示欢迎陈明仁回来。一天上午，张严佛交给我一份电报稿，是拍给陈明仁的。内容是颂公有事相商，望兄能来长一叙，如无时间，弟可去武汉面谈，盼复。我从站台拍给湖北站，由其站长余克剑转交给陈明仁。两天后，陈明仁通过湖北站站台转给张严佛一份复电：弟因公不能离汉，希兄即来面谈。第二天清晨，张说他准备去汉口向陈明仁当面陈述程颂公的意见，要我买一张去武昌的火车票，但不要对外讲，我遵嘱办理。为了他的安全，我秘密地把他送上了火车。三天之后，他回到了长沙。他这次去汉口是同陈明仁研究回湖南的问题，张认为如果程颂公出面要求，会引起白崇禧的怀疑，张同陈研究决定，陈明仁在表面上继续唱反共到底的高调，以麻痹毛人凤、蒋介石和白崇禧，湖北站根据陈的高调，向保密局证明陈明仁的反共决心。另一方面，湖南站把程潜说成是老迈昏聩、无足轻重的傀儡。这些情报在一定程度上会麻痹蒋介石和白崇禧。在张严佛去汉口与陈明仁协商之前，程星龄邀请刘斐去了汉口，向白崇禧商量将陈明仁调回长沙的事情，刘斐对白说：陈是反共的，他回湖南也就加强了湖南的反共力量。白首肯，并征求程潜的意见，

程当然同意。1949年2月，陈明仁率领二十九军和七十一军回到了湖南。

湖南站与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机要组

当时，长沙绥靖公署的秘书长是刘岳厚、参谋长是刘嘉树、中将高参是杨继荣。杨是军统特务，因协助程潜竞选副总统，出了一把力，得到程潜的信任。他对程颂公的左右摇摆靠近中共的政策是不同意的，他将程颂公的私章掌握在手里。参谋长刘嘉树和秘书长刘岳厚的批件都要经过他审阅盖上程的私章后方能有效。杨虽是军统特务，但他对戴笠死后的三巨头都不买帐，他当时的反共活动，只代表他个人，不代表保密局和长沙绥靖公署。

张严佛初来长沙时，曾向我提起湖南应往何处去的问题。当时，我因没有把握他的真实思想，便模糊地回答了他。张严佛将他来长沙的意图全盘托出：他说毛人凤极不信任我，怀疑我会跟随程潜行动，要他适时撤除我的职务。从此，我开始信任张严佛。我根据他的建议，从极纸上摘录一些程潜的反共措施和决心上报，敷衍毛人凤。张严佛也向湖北站站长余克剑提供了湖南在程潜领导下地方安定的情报，这些虚假的情报，增加了保密局对湖南站的信任。

此间，张严佛向我透露程潜正在走和平自救的道路。张说他的妻兄李石静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湖南大学担任秘书，我们的关系，由他向中共地下党组织接洽。

几天后，张严佛要我介绍一位靠得住的人替他办事，我就推荐了总务站员吴振楚，张严佛与他秘密约谈后，就定了下来。张严佛委托吴振楚办的事情，我从不过问。后来，为了保密，张严佛提出要调换一个人，我就介绍我弟弟黄康福，他做了哪些事情，我不知道，也没有向他了解。后来吴振楚秘密地向我

说：“我接受了张严佛的任务后，张先生不许我对别人说，在你面前也不许透露，我一直都不敢讲。在那段时间里，我主要是给张严佛送文件，将文件送往肇家坪一个围竹篱笆的楼房里。接头收信人住在楼上，每次我都把文件送给他，我们很少讲话，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清楚。”

当时，程潜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三个职务。实际上，省政府由秘书长邓介松负责，长沙绥靖公署由参谋长刘嘉树负责，湖南省党部由书记长莫萱元负责。而这三个负责人都各行其事，互相牵扯，不利于湖南的和平运动。张严佛、肖作霖等提出成立以程潜为中心的党、政、军联合办公室，12月中旬，该办公室成立，肖作霖任主任，程星龄和张严佛任副主任，张兼任机要组组长，另设秘书组、军务组、外事组、党政组、警卫组、总务组，除机要组直接由程颂公指导，移到蔡锷路易天凤金号楼上办公外，其他几个组都在省政府主席办公楼办公。张严佛对我说：“我准备推荐你兼任警卫组长，负责保卫程颂公和参加和平自救运动人员的安全，因你没有离职，而不便安排。如果你公开进入联合办公室，不仅不适宜，可能会给你的工作增加许多麻烦。希望你暗地里协助我们，这个警卫组长由颂公随身警卫担任比较妥当，因此，就委任朱明章担任了该职。”

此后不久，清南站副站长宋世杰对我说：“颂公已与中共地下人员有了联系，张严佛担任了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组组长，我一直跟着你工作，今后怎么办？”我很为难地保持着沉默，宋是我的学生，又长期随我工作，他问我，实际上也是探测我，我向他交了底。说目前只有跟着颂公走，才会有出路，宋世杰微微地点了头。随后，我将此事向张严佛作了汇报，他兴奋地说：“你既向宋世杰说清楚了，我们就更省事了，但不宜再向外泄漏了，以防万一。总之，我们的活动还是一句老话，

要保持秘密才能保证安全。”

因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机要组对程潜直接负责，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肖白便将蔡锷路易天凤金号三楼拨交机要组做办公室，张严佛住在三楼，并将这里作为一个联络点。张计划调保密局设计委员任建冰担任机要组副组长，负责编审情报。任是湖南湘阴人，长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叶开鑫的私人秘书，他靠复兴社的关系进入军统，戴笠死后，任保密局少将设计委员。张严佛要他担任机要组副组长，我表示同意。张便写信要任建冰向保密局请假回湘探亲。任到长沙后，出任机要组副组长。张严佛要我继续利用保密局湖南站长的职权，公开掩护湖南和平活动，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1、保护颂公以及协助颂公保护湖南进步人士的安全。2、要从各方面利用湖南站的优势摸清蒋介石、白崇禧等对湖南动向采取的是什么手段和部署，及时向程颂公报告。3、向保密局编造假情报，虚虚实实以迷惑毛人凤和蒋介石。4、机要组是没有班子的，希望湖南站能协助组成。

张严佛和任建冰每天都在易天凤金号三楼办公，我每天同张、任协商机要组应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題。

当时除正、副组长外，还有编审李人熙，总务阳宗文，以及事务、勤务、人力车伕各一人。我从湖南站秘密抽调中校编审刘炳文协助任建冰工作，并指定邮电检查组组长蔺曦每天将邮检情报交给刘炳文编审。为了了解白崇禧的军事活动以及其它势力在湖南的活动，我建立了三个工作队：长沙工作队，队长刘振平、副队长熊传慈；岳阳工作队，队长陆独步；衡阳工作队，队长阳之永；张严佛在株洲建立了株洲工作队，队长刘士国，他们的情报均直接报机要组。任建冰负责向程潜和中共地下党提供情报，但他也没有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见过面，他向我埋怨说张严佛并不信任我们，不把我们介绍给中共地下党人

主，这要我们如何干下去？可能是张严佛向中央地下党负责人反映了，地下党策反组长余志宏曾与任建冰见了面。当时，任向我保了密，我是在没有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见面的情况下工作的。

张严佛察觉我有疑虑，便提出陪我去程星龄家看看，我知道程星龄在颂公身边是湖南和平运动的策划者，我与张到程家后，只作了一般性的交谈。回来后，我暗示宋世杰，要他重视程星龄的安全，为程星龄的活动提供掩护。

1949年4月，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肖作霖为白崇禧所忌，避祸去了邵阳。离开前，肖请以程星龄继任，程潜批示由张严佛充任。不久，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加上联合办公室的目标太大，程潜撤销了它。

我们为了掩护程潜的活动，上报保密局的情报掺了假，引起了毛人凤的疑惑。张严佛为了赢得毛人凤的信任，还得在撤换站长的问题上做文章。他同我商量，要我提出合适的人选，我因一时不能判断张严佛的意图，就没有回答。张严佛提出了张扬明。张是湖南醴陵人，是张严佛的族侄，抗战结束后，任上海稽查处副处长，我同张扬明也很接近，认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张严佛遂向毛人凤签请调张扬明为湖南站长，得到毛人凤的批准。可是一直没有看到张扬明的踪迹。1949年2月20日前后，我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自称是军统兰训班的学生，称我为老师，并自称是局本部派到湖南站的秘书，并说夏松将来接任站长，夏松因多年离开家乡益阳，先回家探亲去了。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副站长宋世杰，夏松到达长沙后，就准备交卸。以后张严佛接到张扬明的密函，说 he 已改调南京站站长，这样，我们的计划落了空。

夏松是湖南益阳人，中央警官学校毕业，曾任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东北北宁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由于东北的国民党

军节节失利，夏松撤退到了上海。他向毛人凤表示，愿意回长沙担任湖南站站长，得到毛人凤首肯。

2月28日，在湖南站站本部楼上会议室，我向夏松办理了交接手续。从1946年11月开始到1949年2月底，我整整地担任了27个月的湖南站长。

我虽然不是湖南站长了，但站本部人员还听我的话，我在站里安设了内线，刘炳文负责情报，吴羽遵负责行动，唐名扬主管经济，宋世杰、蒋祖述、吴振楚负责向保密局本部联系，主要任务是掩护程颂公领导的和平运动。

副站长宋世杰是一个办事严谨的内勤工作人员，他是四川人，从军统黔阳训练班毕业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我担任湖南站长后，他随我出任副站长。夏松接任站长后，他要求离职，我同意了。宋遂向夏松递了辞职报告，得到了夏松的批准，由王宾接替该职。1949年4月，我离开长沙去湘西策反地方武装后，对于湖南站的活动也就不了解了。

毛钟新三次到长沙

毛钟新是浙江江山人，毛人凤的同族。1941年，任军统上海第一区文书，由于区长陈恭澍叛变，毛逃回重庆，正好赶上军统局高级干部人员训练班选调人员受训，他参加了，并以前十名的成绩毕业。当时，我是军统局人事室人事行政科长，由我考核负责分配他们的工作，我将毛钟新调入人事室人事行政科工作，分派他在第一股任签办，负责有关上海和东南地区的组织人事工作。1943年，戴笠要求人事室派一书记去上海工作，由于上海是军统的重点工作区，加之军统上海区区长叛变，因此，对于新成立的组，必须签派可靠人员，恰好毛钟新愿意再去上海工作，我就签呈他担任上海组书记。戴看到签呈后，因他并不认识毛钟新，便约毛去曾家岩公馆面谈。毛的普通话说得

好，而且口吃，但样子比较老成。通过谈话，戴笠不同意他去上海，而将他留在公馆里担任文书工作。以后戴笠每次出巡都带他去，1946年，他随戴笠出巡北平，由于毛钟新好色，在北平逛八大胡同，得了性病，留在北平治疗。戴笠于回沪途中，飞机在南京板桥镇岱山上撞毁，机上13人全部死亡，毛钟新幸免于难。保密局成立后，他出任保密局布置组副组长。1949年初，保密局为准备撤退，在广州成立办事处，毛钟新又兼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主持两广和两湖的特务活动。他究竟到过长沙几次，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三次到长沙的情况。

第一次是在1949年1月间，他来到长沙后，住在又一村五堆子三民主义青年团公寓，他希望我们在长沙制造一次恐怖事件，杀一儆百，并提出将陈云章列为暗杀对象。我很为难，向毛钟新表示：如果长沙发生了暗杀事件，可能会引起风潮或动乱，毛钟新也就不吭声了。同时，我要宋世杰劝说毛钟新离开长沙，宋与毛钟新是同学，又是同事，他俩可以随便讲话，宋世杰了解我的心理，他邀请毛钟新吃饭，宋告诉他，湖南人的个性刚强，他们对特务暗杀进步人士最为痛恨，如果发现保密局派你这样的人到长沙进行暗杀活动，可能难保安全，毛钟新默然不语。第二天，便搭飞机回广州去了。

我卸职后，将家眷分别送到贵阳和杭州。同时，我邀请南京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唐光辉、江西缉私处长喻耀离等住在我的家里。1949年3月毛钟新第二次到长沙时，我请他住在我家的后客房里，他没有顾虑。白天，我们各自活动，到了夜里，就一起聊天。毛说：“你交卸了湖南站站长的职务，用不着卷入长沙这个大漩涡之中，以离开为上策。”我未置一辞。他说他已要王宾在工运小组里选择潜伏行动人员，毛还担心由长沙选择的行动人员，可能手软，将从武汉撤退下来的部分行动人员留在长沙进行潜伏。毛钟新还暗示，如果程潜想同共产党

联系，就将他身边的人干掉几个，以示警告。

事后，我向张严佛作了汇报，并加强了颂公的警卫工作，随后，张严佛和任建冰分别拜访了肖作霖、唐伯球、刘岳厚等人，并请他们转告有关人员，注意保护自己。尔后，程星龄搬入司马里蒋琨住宅，张严佛回到醴陵隐居，毛钟新的目的又未达到。

1949年6月，我从益阳回到长沙后，因静园住宅已转租给汉口电讯局，我住在府后街公寓里。此时毛钟新又一次来到了长沙，他住在又一村三民主义青年团公寓，据刘炳文和吴振楚等向我反映，毛钟新这次到长沙，除与夏松、王宾见面协商在湖南的潜伏工作和如何布置行动人员之外，不准备同我们见面。恰好我去青年团公寓去探望一个朋友时，无意之中碰见了毛钟新，我向他表示我刚从益阳回来，准备拿几件存留在长沙的东西去贵阳暂住。他说他是来督导湖南站工作的，并检查行动人员的布置情况，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正我要离开长沙了。同时，我故意表示消极]态度。他说：“你离开长沙，可以避免不少是非。”我点了点头。我将毛钟新第三次到长沙的来意告知了张严佛和任建冰，并请他们注意保护好程潜等人的安全。

1950年，我在香港娄剑如的家里碰到了毛钟新，他对我说，刘人爵在长沙被暗杀，是他布置的行动人员执行的。并认为我携带家属到香港做对了，否则也有不测。

我两次去湘西的经过

1949年3月，张严佛要我去湘西联络地方武装，跟随程潜走和平起义道路，因我并不熟悉湘西情况，主要依靠原湖南常德组组长罗文杰去开展工作，他们夫妇都是湘西有名的帮会头子，罗文杰在湘西被称为“罗二爷”，他与军统局沅陵稽查处

长黄加持是帮会兄弟，我到长沙担任湖南站长时，黄加持向我介绍了罗文杰，我便保荐罗文杰为常德组上校组长。当时的湘西，有几十支土匪武装，盘踞在龙山一带的瞿伯阶部实力较强，经他策动，瞿伯阶部接受了武汉行辕的招抚，瞿伯阶被任命为武汉行辕“剿匪”第一纵队指挥，这对湘西起了安定作用。

1948年11月2日，我到常德组视察时，罗文杰认为他可负责收容湘西的土匪，我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将湖南站保存的长短美制武器200余枝以及弹药等交给他作为扩军基础，他在桃源成立湘西纵队指挥部，约有3000余人枪，宋希濂委任他为暂编第四师师长，罗邀请方天印为参谋长，这个师由湖南站掌握。

罗文杰与瞿伯阶这两支武装，就是我去湘西进行策反的有利条件。4月初，我离开长沙去湘西，为了保守秘密，仅带了一名警卫，到益阳后，我住在潘汉遼的师部。潘是湖南酃县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中央训练团高级警官班毕业，曾任湖南省警务处副处长、广东揭阳县县长，当时，他任第二十六军某师师长。见面之后，我开诚布公地对他说，程颂公到湖南后，不愿湖南3000万人民生灵涂炭，不愿意看到湖南战火再起，他主张湖南走和平之路。我和张严佛、李肖白、任建冰、唐光辉、金远询等决定追随程颂公走，你打算怎么办？潘汉遼答复说：“我明天给张严佛写一封信，向他表示拥护程颂公之意。”随后，潘汉遼派车送我到桃源，我在桃源师范学校里找到了罗文杰，他欢迎我住在其师部，以支持他在湘西的活动，罗文杰说：“黄先生有什么事情，我尽力去做。”我说：“长沙已不太平，想吃太平宴没有机会了，只好到湘西来吃百家饭。”然后，我一本正经地说：“我到桃源来，主要是希望你看清楚目前的形势，跟随程潜走和平自救的道路。”罗部参谋长、长沙绥靖公署上校参议方天印插言说：“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我强调

说：“我们走这条路，也是替湘西各帮会兄弟寻找一条出路。”罗文杰同意了我的建议，并且站起身来，恭着手说：“黄先生能够随着程颂公走，我罗文杰誓死也会相从。”

当时，瞿伯阶因病在龙山静养，暂十师师长由其族弟瞿波平代理，我请罗文杰去龙山，劝瞿伯阶、瞿波平也 跟程 颂 公走，罗表示一定去龙山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罗文杰的师部住了两天后，又返回了长沙。回来后，向张严佛报告了去益阳和桃源的情况，并将潘汉遼的亲笔信交给了他。

1949年7月中旬，张严佛希望我再去一趟湘西。他说：“人民解放军已进入湖南，如果我们对暂四师罗文杰部、暂十师瞿伯阶部不抓紧联络，他们可能会散而为匪，会给人民解放军进军造成阻力。颂公说联络湘西 土著 武装 是必要的，希望你再走一趟。至于联系的方法，拨用专台非常困难，我们在长沙指定了一个专台接收你从湘西拍来的电报。我们给你两个呼号和两个波长，约定逢单日下午四五点联系一次，如果形势紊乱，电台失散，就派人联络。”张严佛随即将电台的呼号和波长交给我，叫我去湘西后自找电台联系。

随后，我到了益阳，与湘鄂赣边区绥靖区第二十六军的潘汉遼师长进行联系，当时，湘鄂赣边区绥靖区司令部向汽车兵团请调了30辆十轮大卡车，准备将司令部以及各军、师的家属运往芷江。我到潘家时，潘汉遼正在整理行装，潘向我说：“我们会听颂公的话，现在，我准备将家眷送到芷江，免得乱时措手不及，你看这样如何？”我同意了他的计划。由于去芷江的车队须通过罗文杰和张玉琳的防区（这两支部队是自筹经费），还有其他一些小股土匪也是自筹薪给，因此他们对来往车辆和客商感兴趣。潘汉遼、刘召东知道我同罗文杰的关系，希望我能保护家属车队顺利到达芷江，并派司令部高参郑某和副师长黄虎为

车队指挥，要他们与我联系。由于潘汉逵要等人民解放军进入湘西后才行动，我同意护送家属车队去芷江。随后，我将罗文杰的参谋长方天印秘密邀到益阳，对他说我负责押送湘鄂赣边区绥靖区司令部家属车队从常德、桃源、辰溪、沅陵到芷江，请罗文杰先行关照沿途的关卡给予放行，并要罗文杰去辰溪与张玉琳联系。张是军统特务，他抢劫了辰溪兵工厂的炮弹，装备了约10000人的土匪武装，自立山头，虽然长沙绥靖公署给了他“剿匪”纵队指挥名义，但他仍靠抢劫补充粮饷，扩充军力，经罗文杰同他联系后，他同意给我面子。

这时，我用潘汉逵的电台与张严佛联系一次，用他和我约定的波长和呼号，但连续呼叫了两天，都没有联系上。我离开益阳后，没有可利用的专用电台，也就与长沙停止了联络。

我护送的家属车队共有40余车，其中十轮大卡车30辆，旅行车10辆，小轿车四五辆。潘汉逵的家属和唐光辉的家属搭坐我的旅行车。7月23日，我们从益阳出发，当车队经过桃源时，我去探望了罗文杰，他再次表示追随程潜，对子瞿波平部，他已要瞿闵生做工作去了。为了车队在路上的安全，他还派了一名参谋随车。到辰溪后，我见到了张玉琳，他当时是长沙绥靖公署的“剿匪”纵队指挥，我要他继续与程潜保持联系，他支吾其辞，但他让车队顺利通过了他的防区。三天后，我们抵达了芷江。

这时，刘嘉树在芷江任十七绥靖区司令官，他的政治部主任吴利君是军统特务，他于1949年3月在长沙担任警察局长时，要求程潜给他一道手谕，他就可以一网打尽在长沙活动的中共地下人员，程潜将他撤职了。由省警务处长李肖白兼任省会警察局长。当刘嘉树任十七绥靖区司令官时，因他是刘的外甥，刘任他为政治部主任。我同吴利君是训练班的老同事，在长沙我同刘嘉树也比较接近，到芷江后，我同刘嘉树见面后，刘提

出要了解陈明仁的情况。为了迷惑刘嘉树，我说陈明仁一向反共，今天如不坚决反共，他能任省政府主席吗？当时，刘嘉树也得到消息，说陈明仁担任省政府主席后，还是想同程潜一起走和平道路，他对我的话表示怀疑。8月2日，刘嘉树给陈明仁挂了一个电话后，转身对我说：“子良的确是反共的，他在电话里向我表示，他要与长沙同存亡。”刘马上要政治部主任吴利君通知《芷江日报》出版号外，宣传陈明仁的反共决心，并吹嘘芷江的军事武力雄厚，部署严密，要芷江各界民众，不必惊慌。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将领发出了起义通电，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市区，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刘嘉树着了慌，吓得他乱了手脚。8月7日，随同程潜起义的警察局局长刘人爵在家里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刘嘉树认为跟着程潜起义危险太大，因此打算与解放军打游击。我到达芷江后，为了避免刘嘉树和吴利君的怀疑，就住在湖南站芷江组组部里，组长张佛凡是我的学生，他是我任站长时派为组长的，潘汉逵和唐光辉的家属也与我住在一起。

长沙和平解放后，芷江人心惶惶，潘汉逵和唐光辉的妻子们都感到住在芷江不安全，要求离开芷江往贵阳去。我同张严佛联系不上，便率同潘、唐两家家眷，连同副官、随从、保姆等10余人向贵阳进发，两天后抵黔。与长沙联络，但没有成功，我遂要李叔晋代我返回长沙与张严佛联系，并向张请示今后的行动，李是湖南浏阳人，我曾介绍他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二处秘书，他随张严佛工作过。我给了李叔晋50块银元，并在李叔晋的日记本里签了一个字，作为李代表我与张联络的证明。李叔晋于8月下旬从贵阳出发，到了11月间，仍没有得到李叔晋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失望。由于当时的形势复杂，公路安全可虑，我无法回长沙，便去看望在贵阳的妻儿。保密局贵阳站站长陈世贤，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将我们抵达贵阳的情况报告

了毛人凤，并说我们是担心共产党清算逃到贵阳的，在贵阳的生活很苦。陈的反映，替我过去在长沙的活动作了掩护，也减轻了毛人凤对我的怀疑，毛电贵阳站发给我光洋100元作为补助。此时，李肖白也来到了贵阳，不久，他转赴重庆找毛人凤，毛人凤也只补助了他100银元。我因一心想与长沙方面联系，就没有随李赴渝。不久，他气馁地回到了贵阳，并对我说：“毛人凤虽然给你发了100光洋的特别费，这不过是放个屁，他并没有消除对你的怀疑，你没有去重庆做对了。”

贵阳解放前夕，我还没有得到李叔晋的回音，我与李肖白、喻耀离等以及潘汉逵和唐光辉的家属都决定暂时离开贵阳去昆明。当时，云南站长沈醉兼任昆明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毛人凤和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都十分信任他。11月中旬我到达昆明后，在皇后饭店落脚。以后潘汉逵、唐光辉的家属和喻耀离搬走了，仅我夫妇及李肖白夫妇还住在那里。我们常到沈醉的家里闲聊，沈告诉我们一个多月前，毛人凤曾到他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他还提出张严佛和任建冰跟着程颂公通电起义，决没有什么好下场。

沈醉是我在训练班和军统局局本部的同事，因此，我到昆明后，他很少问起湖南的情况，由于我们对余乐醒都很接近，余又是沈醉的姐夫，三十年代余在杭州警官学校担任教育时，常去杭州我家搓麻将，吃湖南菜，因此，我们就谈起余乐醒住在上海时的一个故事，余与李立三在苏联学习时是同学，又很接近。他们于抗战结束之后，在上海有了联系，余还掩护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这个情况被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知道了。他企图秘密逮捕余乐醒，但毛森派遣的特务却扑了一个空。毛森认为余是碰巧外出，又派大批特务包围了余的住宅，却一直不见余回家，特务冲进室内检查，才发现余乐醒的行装和书房里的书籍全部搬走了。余乐醒是杭州警官学校

特训班的技术总教官，毛森手下的特务竟没有发现余乐醒是什么时候将东西运走的，这是老师对学生留下的最后一手。沈醉说，余乐醒是干那一行的，要做一件事情，早就有了准备，余乐醒住宅的后花园里，围墙里长满了爬壁藤，在爬壁藤里面有一道后门，余乐醒的东西就是从这扇门里秘密搬出去的。余乐醒同共产党有联系，沈醉是怎么看的，我不得而知。

12月初，云南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沈醉希望我们能离开昆明去香港以策安全，我同意了。

12月8日，我带着妻儿到达昆明飞机场正在候客厅休息时，突然看见沈醉全副武装，佩戴了一颗星的少将肩章，急急忙忙地从我身旁走过，我以为他是到机场送行，正欲上前招呼，见他表情严肃，没有同我打招呼的意思，我也就止住了同他打招呼的念头。解放后，沈醉曾对我谈起这件事，他说我到达昆明后，他曾接到毛人凤的密令，说我投靠了共产党，要他将我解送重庆，他去机场，是担心我被一些“通天”特务扣押，是以暗中保护我们。

到香港后，我将离开长沙后的活动以及国民党在香港的活动情况记录下来，要我弟弟黄康庭送回长沙，我弟弟回长沙后，把我写的材料交给了政府。1950年7月，任建冰来到香港，他对我说：“你写的材料我看见了，李叔晋到现在还没有回到长沙，可能在路上死了，或者是被那个方面逮捕了（我在外调材料上，得知李叔晋已被逮捕了）。长沙解放后，刘召东、潘汉逵率部撤退到湘黔边界，被人民解放军击溃，潘汉逵因没有人去联络，也被俘虏关押。罗文杰先率部退回永顺老家，以后经张严佛派方天印去做工作才投诚。后来，瞿波平也率暂十师投诚了。组织上对你在湘西情况给予了肯定。”然后，任建冰又对我说：“你离开长沙后，毛钟新和夏松布置的潜伏组已全部被破获，仅刘人爵因疏忽被潜伏行动员冒充程潜送信人进入

卧室将他杀害了。长沙和平解放时，夏松曾将湖南站的人员和档案等向湘西转移，因公路交通堵塞，到益阳后他率部从水路逃遁。船行途中发现岸上有部队行动，他认定是解放军，遂不动声色地要船靠岸，他自己借口下船大便而溜之大吉，后从广州经深圳、香港逃往了台湾。留在船上的保密局人员被解放军全部逮捕，夏松领导的湖南站到此也就寿终正寝了。

内政部调查局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成立，它是由中央党员通讯局改头换面而来，办公处设在广州抗日中路55号和法政路77号，季源溥任局长，副局长张益民，万大铤为主任秘书，以张庆恩任第一处处长，第二处处长徐政，第三处处长苏恕诚，第四处处长陈庆斋，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后增设了贵阳（办事处负责人陈庆斋）、重庆（办事处负责人为张益民）、海口（办事处主任为杜衡）、华北（负责人为张庆恩）、台湾（办事处负责人为郭乾辉）五个办事处，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仅存在了4个月，由于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内政部调查局便将所属人员大部送往台湾，一部分经广西、贵州抵重庆，负隅顽抗，被我人民解放军捕获，内政部调查局至此覆灭。

（李岳云）

国民党宪兵部队特高组秘录

钟高玉*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除了军统和中统两个特务组织外，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可排在老三的位置。

我在宪兵特高组里有过一段经历，对它的内幕及其活动情况有较深的了解，现凭记忆所及，分述如下。

一、从 头 说 起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的军法执行总队，南京政府成立后才正式挂出“宪兵司令部”这块牌子。由当过师长的贵州人谷正伦担任第一任司令官（当时硬是安上了“官”字）。谷正伦在国民党内是有点名气的，他兄弟三人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谷正伦居长，二弟正纲、三弟正鼎都是文官，他是武官。南京人说：“谷正伦三日不杀人就睡不着！”这是实在的。因他兼任南京警备司令，专司捕人、杀人之责。他杀人有明的，也有暗的。警备司令部里有个军法处，搞军法审判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凡是签呈判处5年以上徒刑的人犯，他总是批上“枪毙”二字，他的谬论是：“关上5年以后的人再放出来已成废物，还让他糟踏国家的粮食么？”因此，军法官在量刑时，要么判4年以下，要么干脆就判死刑。被杀的人里面，公开执行的多是一些吸毒犯、抢劫犯之类，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多是秘密处决的。不管公开也

* 钟高玉是湖南耒阳人，曾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第五特高组组长。

好，秘密也好，执行场所都是在雨花台附近那个古坟堆边。每当宪兵司令部那辆大汽车尖声吼叫着从瞻园路驶经中华路开往南门外时，街道上行人莫不心惊肉跳，侧目而视。因此，南京人一提“雨花台”三字，就毛骨悚然！

南京政府搬至重庆后，谷正伦调任甘肃省主席，贺国光（湖南临湘人）继任司令。贺国光没搞两年，兼任了重庆市防空司令，因较场口隧道闷死20000多人的大惨案而丢了乌纱帽，以后就由张镇（湖南常德人，黄埔一期毕业生）接替。直到宪兵司令部迁往台湾。

二、初露 头 角

宪兵初成立时，只有三个团，第一团驻上海，第二团驻南京，第三团驻北平。三个团要数第三团干得最出色，由于少将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亲侄儿（后调侍从室警卫组长），所以胆大妄为，他手下有两个得力助手，一个是第一营营长韩文焕（贵州人，黄埔三期生，后调任司令部警务处长，最后当了南京市警察厅长），另一个是第一营副营长丁树中（又名丁昌，湖南湘阴人，黄埔四期生），这两人实际上是宪兵特务的创始人。他们从宪兵连里挑选一批文化水平比较高而又聪敏能干的上等兵和军士，施以短期特技训练，然后穿上便衣到外面执行任务，称为便衣宪兵勤务。为全面捕杀共产党，韩、丁限令这些便衣宪兵每人每日必须结识一个朋友，重点放在工厂和学校。他们自己也化装成工人和学生，伪装进步爱国，以发展“友谊”和发现线索。他们果然打入了北平地下党组织，很多共产党人被逮捕杀害了，也有一些人成了叛徒——即所谓“自新”人员。这些“自新”分子后来有好几个成为宪兵特高组的主要骨干，如曾建人（江西萍乡人），当过特警队长、特高组长、第二处第二科科长；丁挽澜（湖北人），当过特警队

队附、特高组长、第二处第三科科长；周剑心（长沙人）当过警务处第四课科员、主任、第二处副处长；龚彬（湖南常德人）当过特教班教官、特警队队附、特高组长等。由于宪三团便衣宪兵做出了显著成绩，通过蒋孝先的表功，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于是批准宪兵司令部正式设立特务机构，每年拨出几万元的特务经费让宪兵司令部作训练特工人员和开展活动之用。

这里特别追补几句，宪兵第三团对日本侵略者的防间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他们使日本特务受到不少打击和挫折，特别是对一些汉奸组织打击尤为有力，日本人感到非常恼火，把它视作眼中之钉。后来，日本政府与南京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宪兵第三团被迫撤出北平，丁昌则带领部分便衣潜伏下来继续活动。“七七事变”后，被日方特务发觉，到处搜捕，丁昌等不得已化装成乞丐逃回南京。

三、自 创 门 户

后来，宪兵司令部成立特务组织的消息被戴笠知道了，他认为宪兵是取得了合法地位的武装司法组织（国民政府颁布的“宪兵令”第一条规定：“宪兵主掌军事警察、兼掌普通司法行政警察”），是一个公开的强有力的武装力量，搞特务活动比军统组织要方便得多，所以他想兼并过去，扩大其势力范围。他几次向蒋介石申请派他的亲信，甚至表明他自己也愿意到宪兵司令部兼任警务处长，偏偏碰上谷正伦不买帐，提拔韩文焕当了警务处长，同时任命丁昌当警务处第四课主任。这个第四课实际上就是创建时期的宪特组织的领导机构。因此，军统局与宪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摩擦和冲突。

韩文焕、丁昌在警务处之下设立了六个课，一课管总务，二课管军事，三课管外事，四课管政治——情报，五课管刑侦，

六课管司法。在刑侦课下面，设有两个侦辑队，专负责侦缉社会上的刑事犯罪。情报课下面最初只设三个特警队，特警队的名称是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宪兵特警队的任务是对内的，凡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各个部门，均在它的秘密监视之列。第一特警队驻上海，第二特警队驻南京，第三特警队驻汉口，“一二八”事变后增加第四特警队，驻在福州。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几个特警队在对日防谍保密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南京的第二队，它下面专门设有一个侦监日本总领事馆的间谍活动的外事组，这个组就有人打入了日本总领事馆，窃取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秘密情报，从而破获了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济集团的大汉奸案，轰动了国内外。

四、特 务 训 练

宪兵司令部的特工人员，均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初只在司令部里办了一、二、三期军士队和一、二期学员队。军士队的学生是从各宪兵团的连上挑选出来的，经过考试合格后方可受训。学员队成员则从从事特工三年和取得少尉以上军衔以及由中央军校毕业，经过宪兵学校学生队补训后当了少尉排长以上的军官中挑选。参考人员，最注重的是身体健康，相貌无特征，睡眠不说梦话，头脑机灵，反应敏捷；其次才要求学历和文化水平，一般都要求高中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历。1934年，经蒋介石批准，把原来的宪兵训练所改为宪兵学校后，才在宪兵学校内设立了一个特别教育班，始将训练中的军士队从四期起，学员队从三期起转到宪兵学校，但人事、教材和经费等，仍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负责。军士队受训的时间为8个月，学员队受训的时间为1年。所授课程内容，主要是情报业务和行动技术。情报业务中包括搜集、审核、编写、传递（秘密通讯、密电码，化学书写）；行动技术中包括化装、侦察、跟踪、监

视、逮捕（擒拿、夺枪、押解、看守、讯问）、爆破、暗杀、交通等。其次是政治训练，如党派分析、苏俄研究、日本研究、精神讲话等；此外，还要学习指纹学、新闻学、速记学、验枪术、日语速成等专业课。学员队除了进一步学习上述课程外，更重要的是学习特务组织领导、指挥、掌握和斗争技术等。

在各期训练中担任教官的人，除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第四课主要领导成员和较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骨干分子外，还向外面聘请一些学有专长的人，如军统局高级特务谢力公（讲国际间谍史及其技术），以后还有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务人员在学员队讲过军事情报技术等。此外，还对个别人员采取特种训练，属绝密性质，非外人所知。

从宪兵司令部特高组训练班到宪兵学校特别教育班共训练过军士队12期，每期约60人至70人；集训学员4期，每期约40人。从军士队毕业出来，一般都是特务上士，必须经过一个月的实习活动（化装、跟踪、脱档、密写传递等），然后才能正式编入特高组。

五、特 务 待 遇

宪兵较之一般陆军部队的待遇要优厚得多，官兵穿的都是黄呢军服，冬天还有呢大衣，脚上趿的是黄皮鞋，除薪饷外，另外还有服勤津贴，一个宪兵上等兵的薪水比一个陆军上士班长还要高；至于宪兵特务上士那就更不同了，他们除了薪饷之外，还有相当于薪饷的所谓“加给”，此外更有超过薪饷的特务活动费（工作津贴），临时出差和办案的费用又可实报实销，各项加起来，几乎相当于陆军一个连级军官的收入。同时，他们还可以打入各个阶层寻得掩护职业，有的掩职所得薪资甚至高于本人所得收入。尤其是他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特务证”，凭着它可以闯入任何秘密禁区 and 一切公共场所。

六、特 高 编 制

“特高组”的名称是从口语中直接翻译来的，1939年经国民政府军政部报请蒋介石批准正式成立。特高组设少校组长一人，上尉副组长一至二人，中尉组员4人，少尉组员6人，准尉组员8人，特务上士15至20名。如按官阶和军士级干部数额说，相当于一个营的编制，只是没有兵罢了。宪兵部队后来发展到38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特高组，但编制大多没有满额，宪兵司令部却按照编制总数把薪饷都领回来了。特高组的人事、经费、工作，统统归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第四课（抗日胜利后改为第二处）掌握，宪兵团无权过问。而正式组建的特高组，象宪兵团一样，都是直接隶属于司令部的，警务处第四课只是所有特高组内勤工作的指导机构。

从事实际特务活动的特高组，在抗战前和抗战初期，用特警队名称，搬到重庆后才改为特高组，经过不断扩充，最后只成立了散布在各地的11个组和一个直属大组，4个直属小组，抗战胜利后，这11个特高组的驻地和人员概况如下：

第一特高组驻成都，组长潘兴时，四川人，特高组学员队第二期毕业，有组员20余人，分布在宝鸡、汉中一带，配有电台一部。

第二特高组驻北平，抗战胜利时组长为涂磊，湖南常德人，特高组学员队第一期毕业，后调任宪兵司令部第二处第一科科长，空缺由副组长张雨亭接任，组员约20人，分布在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配有电台。

第三特高组驻汉口，组长先为贾贤瑞，后为王建勋，贾为浙江人，王为湖北人，均系特高组学员队第二期毕业，组员约二十三四人，分布在九江、老河口等地，配有电台。

第四特高组原驻福州，抗战胜利时移驻台湾，组长为胡澍

清，安徽人，学员队第三期毕业，在福州时前任组长为符国秩，福州人，学员队第一期毕业，曾为韩文焕、丁昌在北平时开创特工的得力助手，后调任宪兵营长去了，当时由福州移往台湾时组员约30人，配有电台。

第五特高组驻徐州，它又称为“苏、鲁、豫、皖区特高组”，组长先为刘日智，后为钟灵，刘为上海人，军校十一期毕业，宪校学员队第七期与特教班学员队第三期毕业；钟为湖南耒阳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三期毕业，国防部情报学校保密防谍教育班第二期毕业；组员48人，分布在沂蒙山区、杨山、兖州、蚌埠、淮海等地，配有电台。钟灵曾兼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陆军俱乐部上校总干事和中央通讯社记者，以掩护活动。

第六特高组驻上海，组长张振华，上海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三期毕业，是杜月笙徒弟，组员40人左右，分布于各大学、工厂、工会组织，多半有掩职，配有电台。

第七特高组驻西安，组长原为胥怀素，后由安铎亭接任。胥为四川人，特高组第一期毕业，安为西安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三期毕业。组员30人左右，工作以收集政治情报与防共为主，配有电台。

第八特高组驻贵阳，组长先为杨香，后为陈某。杨为湖南常德人，特高组学员队第三期毕业；陈为贵州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四期毕业，组员20人左右，配有电台。

第九特高组驻长沙，组长为金雅贤，四川人，特高组学员队第二期毕业，后因失职调回宪兵总部由副组长陈国藩接任，陈为长沙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四期毕业，组员20人左右，分布在衡阳、邵阳、岳阳、常德等地，配有电台。

第十特高组驻昆明，组长先为李萍，四川人，特高组学员队第二期毕业；后为钟晓吾，安徽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四期毕业，原为该组派驻滇越边镇河口小组组长，组员20余人，

分布在大理、畹町、河口等地，配有电台。

第十一特高组驻广州，组长为毛中风，湖南常德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四期毕业，组员30人左右，分布于深圳、琼州、韶关等地，配有电台。

直属特高组，原驻重庆，还都后驻南京，在重庆时组长为谢朝楨，湖北老河口人，特高组学员队第一期毕业；还都南京后，组长为杨香，组员70余人，下分政治情报组、外事组、侦防组、行动组、内勤组等，情报组负责搜集党派活动——特别是共产党地下工作情况，外事组负责日本、苏联使（领）馆反间工作，侦防组负责专案调查侦破任务，行动组驻在组本部负责警卫——中央重要会议和蒋介石出行时的安全，并担负逮捕、审讯、看守、押解、暗杀、爆破等工作，有时派赴外地协助各组执行任务。

直属第小一组驻桂林，组长邓子文，安徽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四期毕业；组员10人分布于柳州、梧州、南宁等地，配有小型电台，后遭桂系李、白反对而撤销。

直属第二组驻杭州，组长李亚石，四川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三期毕业；组员11人，分布于金华、宁波等地，配有小型电台。

直属第三小组驻兰州，组长赵文周，陕西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三期毕业；组员9人，配有小型电台。

直属第四小组驻重庆，还都后才设立，组长李介新，重庆人，宪校特教班学员队第四期毕业；组员8人，配有电台。

以上情况，除了人员略有增减外，多无异动。

七、工 作 概 况

宪兵特高组的全部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内监视；二是对外反间和反共。对内监视，就是对国民党所有党、

政、军机关人员进行秘密监视，搜集有关叛党、叛蒋、贪污、失职等情况，做蒋的耳目。在抗战前和抗战中特别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川系（刘湘）、滇系（龙云）、晋系（阎锡山）以及冯玉祥系注意最严。但这几个土皇帝自己盘踞的老巢，根基甚深，势力强大，派往这些省区的特高组，只能以最秘密的身份活动。如1939年派往昆明的3名特务，就被龙云的宪兵特务（龙云自己也有一个宪兵司令部）抓去关押甚久，并被暗中处死一人；派到太原的特高人员和桂林的小组，也被他们驱逐出境，但未被赶光，不过活动困难些罢了。

对贪污盗窃案件，也侦破过几件。如特高第五组在徐州，就侦破过徐州团管区少将司令苗瑞体（黄埔三期毕业）盗卖轻重机枪10余挺，步枪、手枪100余支，弹药100余箱案，苗瑞体被处以极刑；贵州省保安处副处长兼第一科科长杨溥泉（原为宪兵司令部军需处科长），利用从衡阳撤退的混乱机会，私自将大批军用服装、器械（价值30000元以上）等盗卖，亦被侦破逮捕处了极刑；军政部第一被服厂主管负责人王某等利用职权盗卖军用棉纱10件（一件40捆）和其它军用物资，价值20000多元，也被侦破并处决了两名主犯。

特高组还负有秘密监视宪兵团的使命。如派往印度加尔各答的宪兵独立营营长高瘦影（河北人，原为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第四课主任——特高组织初期主要骨干之一），在国外贪污腐化，也被特工揭破，高某旋被革职法办。

宪兵特高组在对外反间反谍方面，做过几件出色的事。抗战爆发前，南京特警第二队外事组，为对付日本特务间谍活动，想尽办法派遣组员陈某打入了日本驻南京（鼓楼）总领事馆（日本大使馆亦在内），当了总领事须磨的身边佣人，从而发现国民政府行政院简任机要秘书黄濬因和须磨系早稻田大学同班同学，竟甘心充当日本间谍，出卖祖国，拚命将一些国防

军事机密情报送给须磨，以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日舰能在中国政府下令封锁长江前三小时全部撤离吴淞口外的事件。为了迅速搜集汉奸间谍活动的罪证，特高组人员利用黄濬公馆内丫环莲花作内线，巧妙地把须磨派出的特务交通小河撞伤送入医院，然后迅即假冒小河到碰头地点同黄濬派来的交通互换了匿藏情报密件的呢帽，同时莲花亦从黄濬抽屉内偷出了情报底稿等，始将黄濬汉奸团伙一网打尽，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后来宪兵司令部把这个案例编成了题为《花落云屏》的四幕话剧。

当时，日本政府为迫使南京政府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最后谈判，日本派出一个叫做川樾茂的特使飞到了南京，蒋介石秘令军统、中统和宪兵司令部，在川樾茂特使抵京三日之内，将其随身携带的日本政府的谈判原则和最后条件指令文件偷窃出来。这种窃秘技术的难度相当大，结果这一任务还是由暗藏在日本总领事馆内的特工陈某机智地完成了，时间恰好三天。蒋介石在阅悉文件后，方下最后决心，拒绝谈判。

1938年，宪兵特高组派在香港的人员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得到一份日本在湖南后方收买的并发给津贴的汉奸名单和通讯联络方法表册，并从香港秘密跟踪日领馆派出的女间谍交通员王亚莉到长沙，在获得其联络暗号后，分别在邵阳、武冈、城步等县逮捕了曾在日本留过学，任过少将军职，在乡下居住的以刘某为首的汉奸30多人，刘某等后在芷江受到军法审判，三名主犯被枪决。

至于反共工作，这也是宪兵特高组的重要任务。如1938年在长沙的宪特人员，就混入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暗中对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先生和教授吕振羽、翦伯赞、张爱群等人进行监视；在昆明的宪特人员就有几人混入西南联合大学，名义是读书，实际上是对进步师生进行侦查；在

重庆对沙坪坝学区特别布置了严密的侦监网，曾将几个言行激进，暴露了身份的地下党员秘密处决了，对外只传出某某失踪了的消息。

抗战胜利后，重庆成立了一个“联合指挥部”（由军统、中统、宪兵组成），三个机构都派出了主要骨干分子参加。每周集会一次，互相交换情报和统一部署行动计划。

八、内 部 倾 轧

宪兵特高组最初领导机构是司令部警务处第四课（也叫做“特高课”），警务处长为上校（少将），课主任为中校（上校），第一任处长为韩文焕，课主任为丁昌，韩、丁之间尚融洽，丁昌接任处长后，主任换了曾家琳（湖南湘乡人，黄埔五期毕业），又转给刘家康（湖南常德人，黄埔五期毕业），丁、刘二人就不那么和谐了，刘为司令张镇的亲信，丁自命不凡，态度有点倨傲。后来丁调升参谋长时，所遗警务处长缺，司令偏要刘家康继任，丁极不以为然，刘却摆起架子来了，迟迟不肯接事，弄得张镇简直无法摆布。

刘家康当警务处长后，四课主任换成欧阳向（湖南衡山人，黄埔六期毕业），欧有特工实践经验，当过特警队队副、队长，在北平丁昌手下号称四大金刚之一，对刘家康不那么服从，不过没有当面顶起来。刘家康调任宪兵团长后，由卫持平（贵州人，黄埔六期毕业）接任警务处长，他虽没有直接干过特工，但人非常灵，做事又有魄力，在下属中颇有威信，偏偏这时担任四课主任的高瘦影认为自己对宪兵特高工作很有抱负，不买这个上司的帐，老在司令面前闹情绪，建议特高课脱离警务处，另外成立一个情报处。这惹得卫持平非常恼火，就把高瘦影调往印度加尔各答的宪兵独立营当营长去了。高瘦影后来也抓到卫持平一些问题，唆使军统局的人反映到蒋介石

那里，卫也下了台。

高瘦影被撵走后，一个与高瘦影同居幕府，尚不得志的角色——周剑心（长沙人）倒走了运，一跃取而代之，到四课改为第二处后当了副处长（处长是欧阳向），坐上了宪兵特高组第二把交椅。第二处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管情报，科长为涂磊（湖南常德人，特高组学员队第二期毕业）；第二科管总务，包括人事、训练、通讯等，科长曾建人（江西萍乡人）；第三科管刑侦，下设三个侦辑队，科长丁挽澜（湖北人，特高组学员队第一期毕业，叛徒）。此外，还有一个经理室，专管特务经费，主任钟兴（湖南宁乡人，特高组学员队第二期毕业）。

（耒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汪 伪 特 工 总 部

1939年9月，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简称汪伪特工总部）在沪西“歹土”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成立，该部主任为丁默邨，副主任为李士群、唐惠民，1940年3月，李士群把丁默邨赶出了76号，1943年9月，李士群死后，汪伪政府将特工总部改为政治部的下设机构——政治保卫局，以万里浪为局长，胡均鹤为副局长。这些汉奸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血腥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投降后，汪伪特务机构同汪伪政权一起覆灭了。

（李 云）

国民党交警十二总队存亡亲历记

胡啸华*

国民党交警部队概况

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民主与和平,反对专制与独裁,要求取消特务机构。这时的军统局利用八年抗战之机,大肆扩充势力,已形成了一个庞杂的特务机构,不仅有公开的、秘密的特务组织,而且掌握了号称10万的特务武装。这些特务组织和特务武装,有的是经军委会核准的,有的是由戴笠擅自成立的。他们作恶多端,名声很臭,国民党内部对他们也非常反感。当时军政部长陈诚主张裁掉特务武装。不愿解除特务武装的蒋介石授意戴笠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军统局及所属各单位的名称,一律废除,在政府及军队重设相应的机构,把特务人员安插进去。如将内政部的警政司扩大为警察总署,安置了大批警政人员;在交通部成立交通警察总局,将特务部队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交通巡察总队、特务团等,统一改编为18个交警总队,归交警总局节制;在国防部设立第二厅、保密局、保安局等。总之是新瓶装旧酒,继续进行特务统治。

当时戴笠野心勃勃,因他得到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海军上将、第七舰队司令柯克的支持,欲将一部分特务部队编成海军陆战队,内定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为陆战队司令。他自己因资历不够当海军部长,但可当海军次长,控制整个海军,以图与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齐头并进。不巧,1946年3月在南京附近机毁人亡,只实现了“化整为零”的计划。

* 胡啸华曾任交警十二总队中校、上校总队附、第三大队大队长。

交警总队等于一个加强团，但远程火器很少，近战火力较强，适宜于防守。划归当地驻军——军或师的战斗序列。有的指挥者，因不明交警部队的装备性能，往往作为一般作战团使用于第一线，甚至将一个丙种师的任务交给交警总队，以至时常被吃掉。有的指挥者觊觎交警的美械装备，借机编并为一般部队，交警总局远在南京，无力顾及。有鉴于此，试图设立一个指挥机构，以掌握部队，保存实力。

1946年9月，首先在青岛成立交警总局山东办事处，任命副局长马志超（原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兼办事处主任，郭墨涛（原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为副主任，李塋为参谋长。处内设参谋、总务等室。办事处的任务是：统一指挥在胶济铁道线上的6个交警总队，并担任防守。但办事处不具备军事指挥机构的性能，不仅马志超发牢骚说他既不是师长，也不是旅长，不伦不类；而且当地驻军也不把办事处放在眼里，与友军协同作战不便。结果第一总队被第二十集团军留置潍县不能东调，后被消灭；第十五总队在乍山被消灭。

1947年夏，总局将剩下的4个交警总队撤离胶东，山东办事处即告结束。

同年9月，又成立一个交警支队司令部，郭墨涛任司令，先驻廊坊，后驻秦皇岛。同年12月，汤毅生继任司令，聂宗奭为副司令，薛涤愁为参谋长，支队司令部移驻昌黎，统一指挥北宁线上关内段4个交警总队护路护矿。1948年7月昌黎之战，支队司令部及第五、第八两个总队被消灭，交警支队司令部即结束。

1948年9月，再成立4个交通警备旅司令部，周文新、张绩武、杨遇春、鲍步超为旅长。交警第三旅旅长杨遇春率旅司令部驻古冶林西煤矿，指挥北宁线上剩下的交警第十、第十二两个总队，担任林西、赵各庄煤矿守备。1948年12月撤退到塘沽防守，交警第十总队在新河村被消灭。

1949年5月，上海战役中成立了沪南守备兵团指挥部，指挥6个交警总队，防守沪西南，最后全部消灭。

尽管交警总局千方百计地成立各种指挥机构，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交警部队的前身之一是“忠义救国军”。该军成立于上海，抗战之初，原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总队”。1938年在屯溪附近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初辖几个支队，到1945年扩充到3个纵队、6个团、3个支队，拥有一般军级规模。日本投降后，由苏浙皖边区开赴苏州集中，1946年3月，改编为交警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等四个总队。

交警十二总队，是由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的部份人员、直属部队特务营、通讯营、迫炮连、独立一团、第一、第二纵队各一部份混合编成的。计有一个总队部及特务、平炮（150机关炮四门）、迫炮（82迫炮4门，还配日式野炮二门）、通讯等四个直属队，四个大队。每大队有三个步兵中队（中队有轻机枪9挺、余为美制卡宾步枪、汤姆逊手提机枪、少数日式步枪），一个重机枪中队（重机枪4挺）。全总队共有3800余人。

少数干部是军统临训班毕业的，大多数官兵在中美训练班受过训，极少数干部是军校毕业生，未受过军统训练。

1947年春，胶东战争中损失较重，无兵员补充，交警总局令该总队缩编为三个大队，另增设运输、卫生两个直属队。1948年又恢复为四个大队。但因兵员困难，只编了两个中队，到1949年4月，才将由津浦路撤通的路警编成另两个中队，充实了编制。

主要人事调动频繁：少将总队长先后为王春晖、王力忠、余钺、姜建中，上校副总队长为王力忠（少将）、盛钟泰、雷中和、吴苍林，中校总队附为倪振宗、周泽宣、胡啸华（后升上校）、刘华藻、何飞峰，中校军需主任为史自成、杨浩烈，副官主任祁××、李导民、×××、吕琼华，军医主任为陈节

元、徐鹤年，督察主任为吴碧城、黄国桢等。还有人事、军法、政工、军械等室，负责人姓名已忘。

第一大队长侯广居，第二大队长贺香圃、龙孟勋、巩兴加（代），第三大队长陈崇威、吴苍林、姜溢三、刘华藻、胡啸华，第四大队长亢祖周、赵伯鲁、阳旭初、张守谦。

直属部队：特务队长为张守谦、拱经乐、何××，平炮队长王潮文、朱力青，迫炮队长张竟成、×××，通讯队长刘文萍、××，运输队长吴志毅（后编入第四大队），卫生队长由陈节元、徐鹤年兼任。

首任总队长王春晖，原任忠义救国军少将副总指挥，湖南湘乡人，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曾任团长。该总队驻防胶东，他多在青岛病休，有重要事情到总队处理。1946年12月，调任交警总局专门委员，后任上海铁路局警务处副处长，1948年调任交警总局华南办事处主任，驻在韶关。1949年，他率领几个交警总队到湘南山区打游击，被解放军全歼，王春晖被俘。

二任总队长王力忠，原任忠义救国军团长、少将高参。湖南湘乡人。因他积极反共，人称“王老虎”。1946年7月，有一名解放区青年妇女途经胶县南门赴青岛探亲，他硬说有间谍嫌疑，命哨兵带交特务队，将其奸污，几天后才释放。有一松江女人同他结婚几年，并跟到青岛，说她作风不正，强迫离婚。未久，在欺骗一已订婚的胶县青年女子隐藏于青岛同居，借以避免已订婚的男家找麻烦，以后一直跟随行动。1947年夏，他将在胶东历次战斗中虚报损失的武器，托江苏省第×区保安副司令王文甫拍卖。移防时，因枪款未全部到手，派副官主任李导民坐催。事机不密，被人告发。8月驻廊坊时，交警局长吉章简电令王力忠即往总局报到。他感到事机不妙，连夜溜赴天津，后南逃被吉章简下令通缉。1948年周伟龙继任交警局长后，又重用王力忠为交警第十一总队长兼沪杭铁路护路司令。

1949年2月，我在嘉兴见到他，据他说不久要调到上饶接任交警第八总队长兼浙赣铁路护路司令。以后形势骤变，情况不明。

三任总队长余钺，浙江余潜人。原任忠义救国军第一纵队参谋主任、第三团团长。1949年9月，由交警第八总队副总队长调升。他处事稳当，每到新驻地，总要到各大队察看地形、部署，做到心中有数。各连队分队长以上干部，都进行个别谈话，摸清思想情况。对送核的文稿，他总是详细修改，重要文件，亲自核对发出。对经费开支亲自审批，逢年过节，拿出一笔节余金，分送各大队长及总队部各业务负责人，以示笼络。1949年2月，由慈溪随杨遇春赴溪口谒蒋介石，归途被浙东纵队俘去，放回后，调往重庆另组交警第十三总队，以后不明。

四任总队长姜建中，浙江临海人。原任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第六团团长、第三纵队指挥官、交警第十三总队长、新港工程局警卫组组长。他眼小脸圆，开口便笑，人称“笑面虎”。生活随便，经常一个人随处跑，但很少下部队察看。对经费开支抓得紧，大小支出亲自审批。1949年5月25日由吴淞口向江湾转进途中化装跑了。

驻防山东的前前后后

山东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山东，就可利用津浦铁路，山东半岛支援华北与东北。但山东大部分地区已成为解放区，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即指派李延年率九十六军进占济南，尔后又令美式装备的第八军李弥部抢占了潍县、青岛等战略要点，造成打通胶济铁路的有利态势。1946年夏，又加紧调集部队，并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夏楚中）进驻潍县，计划打通胶济铁路。以驻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为山东战场的最高指挥，在潍河以西的部队归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夏楚中指挥，沿胶济路西段向东进攻；潍河以东的部队归第二绥靖区副司令

官兼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指挥，沿胶济路东段向西进攻。预定东西夹攻的部队在潍河东岸的乍山镇会师，限在双十节前打通胶济全线并修复通车。

当时青岛是美国海军基地，青岛外围，蒋军所占地区狭小，时受解放军的袭扰。6月间，美械装备的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辖第八、第三十六、第一九八等三个师）由云南经九龙船运青岛进驻城阳，以三十六师向即墨攻击，以一九八师向兰村及大沽河以东地区攻击并侵占了几个车站和赣洪滩，扩大了青岛外围，揭开了进攻胶济路东段的战幕。

6个交警总队也进入了山东战场。交警第一、三、五总队早已空运济南，部署于胶济路西段；6月间，交警十二总队由上海船运青岛，配合一九八师推进至兰村以南。交警第十、十三总队也先后运抵青岛。

交警部队近战火力较强，跟随一般部队之后，防守已攻占的铁道或城市，以腾出一般部队继续向前进攻，就近接受一般部队的军长或师长指挥。

胶县是青岛外围重镇，胶济铁路、青济公路横贯于此，南濒胶州湾，可海运青岛。7月，被五十四军第八师攻占后，大多数居民逃避，市面荒凉，蔬菜供应都要从青岛市运去。

交警十二总队于7月下旬由兰村以南调到胶县，归第八师师长指挥，配合该师分任城防。以第一大队在大麻湾（胶县东20公里）构筑据点守备，维护胶青公路安全；以二、三两大队配备于胶县东门至南门、小西门，以利于第八师抽出部队向胶县以西的芝兰庄、桃哥庄等地进攻。

当时城郊几公里外，就是人民武装控制区，武工队用“敌驻我扰”战术，夜间在城外打枪。龟缩于城内的守军，不明情况，提心吊胆，度夜如年。交警十二总队采取的对策是：从各大队挑选士兵120人，组成突击队，以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巩兴

加兼任队长，下辖四个分队，每分队30人。集训后，夜间分组埋伏于城外进行伏击，白天掩护构筑外围据点，才逐渐减少了威胁。

8月上旬，胶东车站（胶县以东10公里）以北的解放军南进，占领了宝塔山（胶县东4公里），截断了胶青公路，阻隔与大麻湾第一大队的联络。在第八师的部署下，由该师派一个团向胶东车站以北截击；交警十二总队主力由胶县东门外利用高杆作物隐蔽前进，攻占了宝塔山，以第二大队（大队长龙孟勋）向胶东车站以西攻击，副总队长王力忠指挥第三大队（大队长吴苍林）向胶东车站以东攻击，总队附胡啸华在宝塔山指挥平炮队的机关炮向铁道射击，掩护攻击部队前进，并电话指挥城内野炮向胶东车站轰击，战况激烈，至下午3时许，因第八师一个团已进到车站以北，解放军即向东北退却。

8月下旬，五十四军一九八师攻占高密，青岛至大沽河东岸铁道已修复通车。一天上午，总队附胡啸华奉命率突击队经胶东车站至大沽河西岸沿线侦察，准备构筑工事掩护修路，在侦察途中有小接触，当夜至大麻湾宿营。一天的酷热疲惫，部队只顾休息，未作战备。不料当夜零时左右解放军渤海军区独立团突然对大麻湾第一大队发动攻击，外围据点战斗惨烈，清晨3时许突入村内主阵地并猛攻，胶县派出一个大队增援，又被阻于大麻湾以西，情势危急，我即令突击队由西向东冲击，解放军北退。第八师一个营拂晓前到达大麻湾西北截击，一些担架被截去，晨6时后战斗终止。此役，第一大队伤亡30余人，工事大部分被炸毁。

9月，五十四军某师向高密以西进攻，驻潍县的二十集团军某师渡过潍河，东西夹攻，会师于乍山镇（潍河东岸），至此，胶济铁路全线打通。月底，青岛至济南通车。五十四军军部由城阳进驻胶县，交警总局山东办事处也由青岛移驻胶县。

11月，五十四军北向平度、掖县地区进攻，潍河以东（乍山不含，由二十集团军一个团守备）的胶济路和沿线城市，均交由交警山东办事处所辖的交警部队防守。办事处主任马志超以兵力不够，乘机将潍河以西的交警第三、第五总队调到胶县（交警第一总队因夏楚中不同意东调，仍留驻潍县）。防守部署于下（大要）：

第十总队担任胶县城防及外围据点守备。

第三、第五总队，分任城阳经胶县至高密（不含）的铁道守备。

第十二总队接替高密一九八师防务。

第十五总队，因8月间有一个大队在兰村起义，暂不给任务，集中于高密车站附近为机动部队。

约在11月初，交警十二总队由胶县移驻高密，接替一九八师防务，以第二大队附平炮队担任高密城防及外围据点守备；第一大队担任高密至康家庄铁道守备；第三大队担任康家庄（不含）、蔡家庄至乍山（不含）铁道守备；第四大队为机动。总队部、直属部队驻高密城，交警山东办事处也由胶县移驻高密。

接防后，平炮队在加强城防工事时挖出一个未爆炸的炮弹，一个分队长在东门外拆卸雷管，不慎爆炸，炸伤过往行人两名，他自己也炸成重伤死去。有人说这是不祥之兆。第二大队在南门外栗园利用坟堆，构筑据点，挖出一些尸骨，1947年元旦夜，据点一个士兵因厌战，酒后开枪自杀，引起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挖人家祖坟，有鬼作怪。

1946年12月，总队长王春晖调职，副总队长王力忠升任总队长，几次率领部队向高密南、北解放区进犯。第一次率领两个大队，深夜到高密以北约20公里的解放区围攻武工队，武工队闻讯从地道转移，只抢到一些粮衣等。

第二次是1947年1月，当时交警局长吉章简到达高密。

王力忠又抽调两个大队，并由一九八师留置高密的五九三团团长廖定藩派了一个营配合，于深夜窜到高密西南25公里某地围捕解放区地方政权工作人员与地方武装，共俘虏30余人及步枪、鸟枪、梭标、粮油等物资，送到了交警办事处。

1947年2月，解放军山东兵团开始对胶济路发动强大攻势。五十四军撤回城阳防守青岛外围，留置高密的一个团也撤走，驻乍山的二十集团军一个团也撤回潍河以西，交警山东办事处急令交警第十五总队副队长陈崇威率领该总队前往接防，当天赶到高密的新任总队长张国良，连夜赶到乍山镇。解放军乘机发动猛烈围攻，并以一部占领万岭车站，阻止高密军西援，激战至次日拂晓，十五总队全部被歼，正副总队长、大队长全部被俘。

解放乍山，是解放军山东兵团对胶济线攻势的开始，致使铁道交通中断，局势骤变，交警局长吉章简令交警山东办事处撤离高密去胶县。交警十二总队赶紧收缩兵力，将康家庄、蔡家庄的第一、三大队集中高密，加强城防及外围据点防守。几天后，高密北、西、南三面被围，只得撤往胶县。但在部队撤抵芝兰庄附近时，据情报，“高密还是空城，只在车站附近有少数人民武装活动”。王力忠又率领部队反攻高密，企图邀报战功。当时天气阴暗，风雪迷漫，进抵高密车站以东某地，即被解放军迎头痛击，战斗至烈，到黄昏时，才退回胶县，死伤40余人，一个大队长和一个副大队长负伤。

在解放军山东兵团的强大攻势下，胶济全线被截成几个孤点，西段仅剩下济南、淄博、潍县；东段仅剩下青岛、城阳、胶县。胶县是青岛外围的重地，而且蒋介石派了参谋总长陈诚坐镇青岛指挥，企图挽回败局，因而交警部队只能止于胶县，不敢再向后退。

当时集结于胶县的有交警第三、第五、第十、第十二等4

个总队，相当于两个普通师。在上级的指令下，交警总局局长吉章简，副局长兼山东办事处主任马志超，企图死守胶县，以待配合反攻。其部署大要于下：

第十总队（总队长吉猛是吉章简的亲信）担任胶县西门至北门城防。

第十二总队（总队长王力忠是马志超的亲信）担任胶县东门至南门及内城防守。

第三、第五总队主力为机动，各以一部分任城南双女峰、城北火车站与五里堆等外围据点守备。

同时，由青岛车运大批弹药，储存于内城弹药库内，还控制了胶县兵站未及运走的大批军粮。吉章简发誓说：他要“死守胶县，与胶城共存亡”。甚至还下达死守命令，我记得有这么四句：“章简阵亡，志超指挥，志超战死，力忠代理”。看样子大有一拚死活的架势。

几天后，解放军重兵压境，从西、北、东北取包围态势，连续拔除了几个外围据点，炮弹落到了城内，并一度进攻到胶县东门附近，截断了胶青公路，经十二总队派第一大队出击，激战几小时才恢复交通。这是解放军试探性的进攻，以摸清我军的火力配备情况。

但吉章简见势不妙，即于当日下午身着士兵棉制服，手持卡宾步枪，装成士兵模样，混在装满警卫的卡车里，溜到青岛去了。

3月中旬，解放军对胶县的包围圈日益缩小，胶青公路中断，只有城南塔埠头可以海运。王力忠以“为了今后作战行动轻便”为名，将一批伤病兵及重要械弹船运青岛。据事后了解，吉章简为了保存交警实力，在青岛作了撤退胶县的安排，并由五十四军派了一个团在大麻湾掩护撤退。但撤退的计划始终只有马志超及几个总队长知道，对其他人保密。

在伤病兵及重要械弹运走的次日凌晨，王力忠声称向东出击，除以少数兵力守城外，率领平炮、迫炮两个直属队和三个大队，攻占宝塔山，一直打到胶东车站，战斗非常激烈，当时我在宝塔山总队指挥所，用电话向城内马志超随时报告战况。马志超有个习惯，每逢打仗，就睡在床上静思，电话由随从参谋记录转告。另有一个交警总队由胶县车站向胶东车站出击，迫使解放军向北退去，下午5时许战斗终止。除由十二总队留一个大队在宝塔山掩护外，其余退回胶县。

当天上午由青岛开出的在大沽河东岸待命的40多辆汽车，这时鱼贯驶到胶县，装运兵站军粮及城内弹药库的弹药，整个胶县弄得鸡飞狗跳，乱成一团。黄昏时开始撤离胶县，十二总队掩护其他总队最后撤出。待汽车全部开走，王力忠命总队携带所有行李，又以向东出击为名，迅速行动。对弹药库未及时运走的弹药，包括野炮弹、迫炮弹、手榴弹、步枪子弹等，竟放火烧掉。待部队跑到东门外，爆炸声轰轰作响，火光照天。这时王力忠站在东门外路边，大喊“赶快跑，解放军打来了”。一直跑到大沽河东岸才松了一口气。回首胶县上空红了半边天，呈现出凄惨景象。但王力忠却在旁说：“这是解放军的炮弹击中弹药库后起火的。”

这个弹药库，是交警山东办事处为补给4个交警总队的弹药而设的，由交警第十二总队派人管理。库址靠近内城南门（这个门久已封闭），内城在县城东北角，曾为五十四军军部、师部驻地。有少数居民，只留内城西门为进出道口。内城的西、南城牆外，民房密集。虽然在事后未调查损失情况，但根据燃烧时间之长与红透天空范围之大，可以想到不仅内城民房被毁掉，而且由于弹片带火四溅，靠近内城城外的民房，也可能遭到损失。

胶济铁路全线被解放，交警部队在山东已无立足之地。原在

胶济线上的6个总队，除一总队留潍县孤点(1948年被消灭)、十五总队在乍山被消灭外，其余第三、五、十、十二等4个总队均撤离山东，交警山东办事处被撤销。

1947年夏季，第三总队北调营口，第五、第十总队北调北宁铁路，第十二总队在城阳附近狗塔埠缩编为3个大队。6月间，由青岛船运连云港，开赴新浦、东海白塔埠地区，归第二十八军指挥，担任防守。7月，北调天津转开廊坊，担任安次、武清的防守。9月，王力忠因案发潜逃，余钺调任总队长。同时，另成立交警支队司令部于廊坊，郭墨涛任司令。

冀 东 防 守

1947年9月底，交警十二总队随交警支队司令部由廊坊东调秦皇岛，接替九十二军某师防守秦(皇岛)榆(山海关，临榆县治)地区。山海关是北宁路咽喉，秦皇岛是华北与东北海运要港，又是开滦煤经此外运的集散地，在军事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上级要求我们确保秦榆地区安全。但也形成了多头指挥的紊乱现象。交警十二总队，本受交警支队的节制，又受唐山九十二军军长兼冀东绥靖指挥官侯镜如的指挥；冀东在地理上本属华北，华北“剿总”也对总队行文；而东北“剿总”(原东北行营)为了控制秦皇岛作为海运要港，把滦河以东的冀东地区划归东北“剿总”的作战区域，把十二总队列入东北“剿总”的战斗序列，就近归秦葫(葫芦岛)港口司令何世礼指挥；冀热辽边区总司令部成立后，又受该边区总司令范汉杰指挥。这种多头指挥，有时弄得交警部队无所适从，军粮、被服等补给有时也可领双份。

当时秦皇岛市区秩序混乱，过境军队，散兵游勇，特别是被解放军释放的战俘，多混集于此，戏院、妓院等公共场所，经常发生事端。

北宁路关内段，蒋军仅能控制沿线几个城镇；滦河以东，秦皇岛、山海关的铁道以北5公里外就是解放区或半解放区。解放军冀东纵队经常在夜间炸毁铁轨，国民党军队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秦皇岛以北的解放区人民，常到市区采购物资，侦探情报，甚至隐居市内里应外合进行革命活动。

总队部命令第一大队（大队长侯广居）配属野炮一门，担任石门寨、长城煤矿（距秦皇岛20公里）的守备，重点置于煤矿。

第三大队（大队长吴苍林）担任山海关城防，并以一个中队任山海关至秦皇岛（不含）铁道守备。

第二大队（大队长龙孟勋）担任秦皇岛市郊防守，并以一部兵力任秦皇岛至南大寺、北戴河及以西洋河东岸的铁道守备。

总队部、直属部队驻秦皇岛。

交警支队司令部驻秦皇岛，另有河北省的一个保安团，归支队指挥驻海阳镇（秦皇岛北5公里）担任外围警戒。

另外还配属两列铁甲车，日夜往返山海关至滦河以东沿线巡逻，情况紧急时，由交警十二总队派队随车巡逻，或参加战斗。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当地军警宪部队，维持治安，经上级批准，1947年10月16日重新成立秦榆防守指挥部（九十二军某师也成立过秦榆防守指挥部，交防时撤销）。总队长余斌兼防守指挥官，副总队长盛钟泰兼副指挥官，中校总队附胡啸华兼指挥部参谋主任，吕琼华为副官主任，秦皇岛警察局、商会分派人员参加，办公费用由商会筹措。指挥部下辖两个纠察队，人数30至40人，以当地驻军为主，当地警察、宪兵也派人参加。秦皇岛军警宪联合纠察队长先为许祯祥，后由朱力青兼。山海关军警宪联合纠察队长由第三大队长吴苍林兼。该队经费由山

海关商会筹措。纠察队的任务是：巡查戏院、妓院、车站码头和其他公共场所，以维持秩序；检查旅社和车站上下车的旅客有无身份证；有时根据情报，深夜突击查户口，在秦皇岛曾进行两次，有30多个无身份证的“嫌疑”被带到指挥部，经讯问后交保放出。无保的外乡人，由警察局处理。还在各交通要口设立检查站，由纠察队会同守军对向北外运的物资进行检查，主要是对解放区封锁禁运，胶鞋、一丈五以上的白布，均在禁运之列。

11月间，据情报，在上平山、下平山（秦皇岛以北20公里）有革命地方政权组织及粮库，交警支队命令总队长余钺抽调二三大队主力，并指挥一个保安团，深夜赶到上、下平山，抢到粮食数千斤，围捕了几名地方工作人员，均送到唐山九十二军兼冀东绥靖指挥部去了。

1947年12月，交警支队司令郭墨涛调职，汤毅生继任司令、聂宗焕任副司令、薛涤愁任参谋长。为了加强铁道与矿区防守，以第五、第八总队担任滦县至留守营之线铁道防守及昌黎城防，以第十总队担任林西、赵各庄煤矿守备，以第十二总队重点守备山海关，及至北戴河以西、洋河东岸的铁道守备。为使指挥位置适中，支队司令部由秦皇岛移驻昌黎县城。

交警十二总队撤销秦榆防守指挥部后，总队部、直属部队由秦皇岛移驻山海关，加强城防。第一大队仍驻长城煤矿，第二大队主力置于北戴河，仍任秦皇岛至洋河东岸铁道守备。

1948年1月某夜，解放军冀东纵队利用大雪迷漫，向第二大队攻击，并破坏东西铁道，割断电话线，通讯中断，铁甲车只能驶到南大寺，激战至次日上午才停止，冀东纵队北退抚宁。下午总队长余钺命总队附胡啸华前往了解战况并送去补充弹药。这次，解放军冀东纵队欲消灭第二大队，投入了大量兵力，几次猛冲猛打，二大队凭藉工事抵抗，并派队出击才顶

住，但伤亡30余人。

此后，冀东纵队经常夜袭铁道据点，炸毁铁轨，或埋设地雷炸毁军运列车，我军只能白天抢修通车。

1948年夏，解放军在冀东增加兵力，形势较紧，新五军调到山海关为机动部队，交警十二总队部、直属部队仍回驻秦皇岛。

另因情况日急，十二总队除三大队仍任山海关城防并担任至南大寺铁道守备、总队部非战斗人员仍留驻秦皇岛外，总队直属部队、第一大队，均集中北戴河进行防守。

7月，解放军对滦河以东至南大寺之间铁道守军发动攻击，重点围攻昌黎。驻昌黎的交警支队司令部，赶紧收缩兵力，准备反抗。除第五总队以一个大队置于留守营据点，便于与北戴河联系外，该总队主力及第八总队均集结于昌黎城防及外围据点。战斗开始，解放军先拔除滦河以东的据点，以阻止唐山东援，同时攻占南大寺车站，阻止秦皇岛西援，再拔除北戴河至洋河间及留守营至昌黎间的据点，使北戴河、留守营孤立。对北戴河采取能吃掉就吃掉，不能吃掉就围困的战术，以图占领昌黎。激战三昼夜后，交警支队司令部、第五总队（留守营一个队除外）、第八总队全部歼灭。支队司令汤毅生、副司令聂宗奭、参谋长薛祿愁及各总队长等，全部被俘。

昌黎战斗的同时，解放军一部首先拔除了南大寺以北保安团据点，并以有力部队一举攻占南大寺车站，截断了至秦皇岛的交通。交警十二总队为了恢复交通，曾令第三大队主力由山海关西向南大寺，由北戴河派平炮队乘铁甲车东向南大寺，企图东西会攻，均被击退。尤其是铁甲车遭到强火力袭击，险些退不回北戴河，经平炮队用机关炮猛击才掩护驶回。北戴河东、西铁道据点，也先后被拔除，解放军还几次利用北戴河以北的高杆作物深入，连续几次猛攻第一大队阵地，经派队出击才

击退。此后，解放军从东、北、西三面包围。当时，我们分析情况，认为解放军是待昌黎战斗结束后，再行围攻北戴河。这时，总队长余钺忧心忡忡了，迭电冀热辽边区总司令范汉杰、交警局长周伟龙求救。

几天后，昌黎战斗终止，解放军一个师集结于雷龙、抚宁地区，我们判断围击北戴河已迫近，余钺召集总队附、大队长开会，商讨对策，大家认为北戴河南濒渤海，东、西、北三面被围，突围是不可能的，只能死守待援。当即电令秦皇岛后勤人员用小船运大批弹药、军粮到海滨，连夜接运到北戴河车站，准备死守。但担心若援军迟迟不到，也会遭到昌黎交警支队的覆灭命运。

两日后，我军从相台调了一个师到达秦皇岛，次日上午即向南大寺车站进攻，占领该站，继续向北戴河外围攻击。十二总队同时出击，解放军向西北撤退，北戴河缓解了。该师继续西进，我留守营一个大队也解围了，已经解放了的昌黎又被该师占领。战斗终止，铁道修复通车。

几天后，范汉杰来到北戴河，集合干部讲话，首先是打气，说什么总队战斗力强，能坚强抵抗，把北戴河守住下来了；其次是自吹，说什么不管共军如何采取攻击，总有办法对付，很快就调了部队来解围云云。

未久，周伟龙也到了北戴河，还报请国防部授予余钺一枚云麾勋章。以后，第三大队长吴苍林，因率领该大队进攻南大寺，打得很激烈，也报请奖给他一枚勋章。其实是因他在改编交警前，就当了很多年的营长、副团长，无法升迁，就给他一个这样的安慰。

北宁铁道关内段的交警部队，经过昌黎战斗，只剩下第十、第十二两个总队了。为了加强护路护矿，以某师接替山海关、昌黎城防及沿线护路任务。

8月间，交警十二总队由北戴河西调赵各庄煤矿守护，第十总队专任林西煤矿守护，均归唐山八十七军军长段运指挥。

9月，交警总局成立4个交通警备旅司令部，交警第三旅旅长杨遇春、参谋长陈畴，率旅部到达北宁线，驻在古冶车站附近的林西煤矿，指挥第十、第十二两个总队，担任护矿。

交警十二总队长余钱，看到其他交警总队迭被消灭，兵源无着，赵各庄矿工众多，体力又强，便串通矿工工会企图欺骗矿工，编成一个矿工总队，必要时，发给武器，共同维护煤矿安全。如遇紧急情况，就要挟他们随同交警总队一道撤退，再编成一个新的交警总队，以作补充，这样有功于交警总局。但遭到矿工的强烈反对，阴谋未能得逞。

同年初冬，东北全境解放，冀东铁道遭到严重破坏，秦皇岛成为孤点。当时华北“剿总”对冀东是弃是守，犹豫未决。据余钱说，华北当局曾经计划放弃冀东，并炸毁开滦煤矿所属各矿，后又改变计划，暂缓破坏。

11月，东北解放军源源入关，向平津运动。赵各庄以北几十里上空，经常有国民党飞机盘旋侦察和投弹轰炸。由于情况日紧，唐山地区的守军，奉命撤离冀东。

12月10日，驻唐山的八十七军和古冶附近的交警第三旅分乘火车，于下午撤抵塘沽。

塘沽防守与撤退

塘沽情况混乱，华北、东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家属，逃散官兵与释放的俘虏，均集中于此，待船南去。由冀东退到塘沽的部队抓船只，要民工，搞得人心惶惶，居民避走，市面萧条。但津塘铁路，尚未中断。

源源向平，津集结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其中第七纵队到达塘沽以北地区，大有攻占塘沽，封闭华北国民党军的海上逃

路，以全歼平津塘国民党军的势头。

但塘沽地形，东濒渤海，西靠海河，河汉纵横，盐池地多，冬季不冻，易守难攻，部队运动困难。

集结塘沽的国民党军，计有八十七军的两个师、独立第九十五师、交警第三旅（下辖交警第十、第十二总队），另有海军第三舰队的炮艇队和一个保安团，统归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驻新港）指挥。但兵团本身的基本部队九十……他调，不在塘沽。

当时，对塘沽如何部署防守，尚未决定。根据情况，把交警十二总队来回调动于塘沽、大沽之间，因要渡过海河，每次乱抓船只，疲于奔命。士兵发牢骚说：“指挥不清，累死三军。”下级干部也不安心，系念在天津总队留守处的眷属，担心一旦津塘交通中断，不能同自己的妻儿见面。因此，不少中、下级干部，主张部队开往天津，免得在此东调西跑。

为什么对塘沽防守部署迟迟不能确定？事后才了解到一些内幕：蒋介石的意图是要暂守塘沽，以备华北军队从海上撤退，但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在华美军不同意派遣；而傅作义因他的部队在平绥地区，拟暂守平津，必要时西入绥远。直到新保安、张家口被围，西入计划破灭，才决定津、塘的防守指挥官与防守部署。

津塘防守司令为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驻新港）下辖两个防守司令部，天津防守司令由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兼；塘沽防守司令由八十七军军长段沅兼。

八十七军以一个团防守北塘外围据点，主力摆在塘沽。

交警第三旅以第十总队（总队长颜绳武）进驻新河村（塘沽北5公里）防守；以第十二总队部署于塘沽市区北端的山东路沿铁道至新河车站（不含）之线，保安团防守新河车站，南与交警十二总队连接。

山东路距新河车站较近，是首当其冲的第一线，尤其是新河村，是距离塘沽以北 5 公里的突出孤点，既没工事可利用，无法固守。

部署确定后，军心较稳，12月14日，第十二总队从天津运两卡车粮弹到塘沽。但在当夜，解放军占领了军粮城车站，津塘交通中断，解放军也逼近塘沽外围，形势突紧。

十总队被歼与十二总队遭袭

约在12月15日深夜，解放军一部向新河村第十总队据点猛烈围攻，塘沽可听到枪炮声。开始还可用电话联络，不久即中断，只能用无线电求援。因交警三旅无机动部队，转向防守司令段沅请援，回答是：北塘守军也受攻击，无兵可援。只得由交警十二总队抽调一个大队驰往，中途又遭阻击，无法接近新河村，被迫退回。用野炮向新河村四周盲目轰击，下半夜枪炮声非常激烈，尽管该总队长颜绳武一再求救，也无济于事。拂晓前枪声渐稀，第十总队全部被消灭，总队长以下除被打死外，均被俘虏。

这时塘沽防守当局，深感恐惧，为免再被吃掉，赶紧将北塘一个团撤回塘沽，从此，塘沽已无外围据点，完全暴露。

当时，交警十总队有几个家属，未送往天津，仍留在塘沽，为免解放军利用，交警第三旅旅部将这些眷属集中一只船上软禁起来，不许与外界联系，随后运往上海。

旅长杨遇春、总队长余钺对十总队被消灭，既遗憾又疑虑。指挥当局见死不救，料不定也会轮到自己头上来。

12月16日上午7时左右，解放军乘大雪纷飞，视线模糊之机，先以密集炮火向山东路轰击，炮弹多落在铁道阵地及总队部附近，以打乱指挥中心，同时分兵两路，一路主攻山东路铁道阵地，战斗非常激烈，几次猛冲猛打，均被强大的火力击

退，一路进攻新河车站，保安团被打得溃不成军，退入塘沽。

新河车站的解放军一部进入新河材料厂，并即沿海河东岸南下，计图绕向山东路会合攻击铁道阵地的友军，并围击十二总队部。当时总队附胡啸华，正在山东路西部指挥平炮队阻击，看到沿海河东岸南下的解放军，因受纵横河沟的限制，进退困难，即电告总队长余钺，速派第二大队向海河东岸截击，解放军奋勇反击，夺路退回新河材料厂，一位排级干部被打死，遗体海河岸边。上午11时左右，战斗结束。

从此，塘沽守军更加混乱。十七兵团司令部由新港移到大轮船上，停泊于渤海湾。十二总队强掳开滦煤矿的两只小火轮（一轮名“辅平”号，载重500吨，另一轮名忘）及两只拖船，把电台和非战斗行李装了上去，准备随时逃跑。

海军炮艇为了给守军壮胆，每夜开到海河向北盲目轰击一阵，再驶回渤海湾。

但解放军经过这次试探性进攻，也实地察看了复杂的地形，采取围而不大打的战术，只在夜间袭击几次铁道阵地。

由于塘沽是夹在海河与冬季不冻的盐池中间，山东路关卡阵地拿不下，就不可能攻占塘沽，而山东路铁道阵地东侧，是平坦开阔地，积雪深，目标容易暴露，不易接近。于是，新河车站的解放军利用黑夜，翻穿白里棉服，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向铁道阵地方向挖掘交通壕，以图掩蔽接近，发动突然攻击。

交警十二总队也采取了对策，由守备阵地的部队，挑选官兵，组成夜间伏击队，也翻穿白里棉服，埋伏于壕沟方向，进行伏击。曾在—个黑夜，与解放军10多人（可能是侦察铁道阵地敌情或者是突袭部队）遭遇，因双方都是白里棉服，黑夜分不清敌我，混战了一阵，均被打散。交警夜间伏击队有的当夜摸回来了，有的次日才回队。次日上午，在铁道阵地雪地上发

现一具尸体，经派人查身，有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七纵队的奖状一件，身旁还遗有一支手枪，可能是一位连级干部。

当日下午2时左右，新河车站的解放军，以密集炮火向山东路铁道阵地猛轰，一些工事被摧毁，三大队的一个中队长踝骨被炸碎，士兵伤10余人。

此后，解放军没有继续挖掘交通壕，也停止了对铁道阵地的袭击。

12月下旬的一个夜间，发现北塘有解放军汽车隐隐约约地向西北驶去。次日晨，据邻接新河车站的守备部队报告，新河车站静寂无声，没人活动。为了摸清这个突然出现的情况，总队长余钺命上校总队附胡贻华同第四大队长张守谨（守备靠近新河车站阵地）率队前往车站实地侦察，证实了解放军已全部撤退。即命第四大队以一个中队驻守新河车站，夜间撤回原阵地，以免意外。余钺借此虚报战况：收复新河车站。经交警二旅分报防守司令部及交警总局，并得到该局奖金50000元（金训券），大队长张守谨晋升为上校。

解放军撤离后，塘沽静寂，只有民兵在夜间打枪袭扰。但随之而来的是粮弹补给不上，靠海上有限的运补，一到就被抢光；空投粮弹，往往投入海河。特别是副食奇缺，交警十二总队，把运输队的几头驴子都杀吃了。粮弹不足，士气低落。

12月28日，交警十二总队奉令将塘沽山东路防务交由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接替后，随同交警第三旅旅部移驻新港。

新港是塘沽的后方，夹在渤海与盐池地带之间，易于防守，只要守住盐田之间几条通道即可。有的士兵说：“进了保险窝，可以歇口气了。”夜间通过电台可偷听到解放区广播，了解到淮海战役的紧张战况，唐山人民广播电台重复广播，特别是听到战犯名单，我们心情十分沉重。

1949年元旦来临了，十二总队好不容易在新港民间买了一头猪杀了，分给各部队改善生活。总队部在元旦中午准备几个菜，由余钺邀请旅长杨遇春及各大队长、总队附会餐，我也在座。

无线电台播出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摘录，其中有蒋介石求和与不计个人进退的说法。当时在席的多数人对求和感兴趣，因为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已使人感到厌烦，如能实现和平，可以过安静生活。只有杨遇春、余钺感到忧虑。如果实现和平，蒋介石下野，作为军统武装——交警也不会再存在了。杨遇春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能在北伐战争打胜仗，却打不过共产党，如果他一下台，我们怎么得了啊！”说后，两泪纵流，大家不欢而散。

1月14日，解放军总攻天津。15日夜，天津广播电台播出京剧“霸王别姬”，暗示天津守军已处于四面楚歌，大势已去之境。当夜，天津全市解放。

余钺加紧作撤退准备，把一些重要械弹，总队部个人行李，并挑选了八匹乘马上了船。一些无法运走的步机枪子弹，均沉入码头海中，两辆卡车，一辆吉普车，几十匹骡马，均弃于新港。还划分了部队船位，轮船升火待发。

17日，我们接到撤退命令，黄昏前，所有塘沽、新港守军，由保安团掩护，登船撤退，分别驶往青岛、上海，交警三旅旅部登上火轮，驶往上海，十二总队分登两只小火轮各拖一只大拖船，驶往长山列岛。

当十二总队的轮船驶离新港码头时，解放军追击保安团也进入了新港，该团被全部消灭。

两只小火轮，当夜驶进渤海湾，即遇大风大浪，海水翻入轮机舱，几乎有灭火之危，也有全部葬身鱼腹之险。约一小时后，风浪渐小。次晨，到达长山列岛。

长山列岛是国民党军海军第三舰队基地，舰队司令是马纪壮。在当时解放军尚未建立海军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喘息一时。

1949年2月5日，由上海驶来一只大轮，把十二总队接到上海。但乘马无法运载，均弃于拖船上。

上海待命与周伟龙被捕

2月5日，交警十二总队轮运抵沪，暂驻上海龙华镇附近休整待命。

总队人员多为南方籍，到了上海，对气候、生活各方面，似乎都适应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士兵厌战心重，干部心情不安。请假的、开小差的、在公共场所闹事的多了。如一个少校督察主任、两个上尉军需等，干脆在撤离塘沽时就隐居下来，待机去天津照顾家眷。到达上海的某些干部，也是身在上海心在天津，整日愁眉苦脸，盼望早日与滞留天津的亲人见面。特别是淮海战役的惨败，影响军心士气尤甚。为了振作精神，总队长余餗命各大队，抓紧时机，进行整训。

2月中旬，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率领总局有关人员到达上海，集合十二总队官兵讲话，并按册点名，以了解官兵素质与实际人数，对现有武器也进行点验，作为以后补充的依据。以后还派遣总局教育处长李某，由总队附胡啸华陪同分赴各大队视察，并逐个面告各大队长：南京即将成立全国性的交通警察司令部，周伟龙局长任司令，各总队也即将改称交警警备总队。新的关防、钤记，均已刻好，只待颁发。还鼓励部队好好干，前途有希望。部队官兵本来对“交通警察”这个名称不太满意，听到要改名，心情一时振奋起来。

次日上午，突然听到周伟龙被捕，大家都很惊异，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

根据以后了解，他被捕的原因是：

第一、周伟龙企图把交警部队拉向湖南，靠拢程潜，以便编成一个兵团，自己当兵团司令，并随程潜起义。因此，他把交警部队借机调往粤汉路和浙赣路。早在1948年就派上海铁路警务处副处长王春晖为交警总局华南办事处主任，驻于韶关，指挥粤汉路几个总队护路。原驻嘉兴的交警十一总队长兼沪杭路护路司令王力忠，准备调为驻上饶的交警第八总队长兼浙赣路护路司令。指挥该路几个总队护路，必要时可顺利地把这儿总队调往湖南。

当交警十二总队刚到上海，总队附胡啸华、第二大队长龙孟勋就接到王力忠电话，暗示交警部队要逐渐向湖南调动，他也快要调往上饶，要我与龙孟勋同他保持联系，牢牢控制十二总队，必要时，当机立断，把部队拉向湖南。

第二、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后不久，被迫退居溪口，为了溪口的外围警戒，电令周伟龙指派交警第五、第六两个总队前往担任警戒。而周伟龙却复电改派交警第九、第十二总队，并说这两个总队战斗力较强，忠实可靠。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和警觉，因而要毛人凤注意周的行动，必要时制裁。但周伟龙被捕和杀害真象及具体情况怎样，尚待进一步证实。

移 防 溪 口 护 卫 蒋 介 石

蒋介石退居溪口后，心怀恐惧，加紧调派部队保驾。除溪口由他的亲信部队担任警戒外，另调蒋经国培训的青年救国团某总队（总队长刘培初）驻宁波、慈溪之间，交警第九总队驻嵊县，交警第十二总队则由上海调到慈溪县城，十二总队第二大队驻宁海县城，担任溪口外围警戒，维护交通安全。交警第三旅司令部（旅长杨遇春）也驻慈溪县城。

十二总队驻慈溪几天后，蒋介石的军务局长俞济时打电

话命令旅长杨遇春、总队长余钺赴溪口谒蒋，归途经奉化鄞江桥附近，被解放军浙东纵队俘去，解往四明山根据地。两天后，又接俞济时电话说，杨、余已回到溪口，次日返回慈溪。据余钺说，他们二人是设法逃回的。

在杨、余被俘的二日内，十二总队副总队长吴苍林慌成一团，一方面急电交警总局，请示处理；另一方面，商请慈溪县政府设法，利用慈溪与四明山有关系的人，前往探听，准备营救；为了防止余钺答应浙东纵队以武器作为释放条件，下令各大队严管枪弹，非他的手令，不得外运武器与调动部队。

杨、余回来后，交警局长马志超一商命令杨遇春率领交警第三旅司令部由慈溪移驻江山县，指挥附近的几个总队；同时下令免去余钺的总队长职务，命他赴重庆另组交警总队。改派姜建中为交警第十二总队长，并令该总队由慈溪移驻余姚，继续担任溪口外围警戒。

所谓溪口外围警戒，主要是防范四明山区的人民武装，以保溪口安全，但蒋介石既失民心又失军心，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经蒋经国一手培训的，担任溪口外围警戒的青年救国团某总队一部，由某副总队长率领，深夜起义，投向了浙东纵队。

4月下旬，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长江防线瓦解，解放军分向沪杭进军。蒋介石无可奈何地离开溪口飞赴杭州，外围警戒解除。交警第九总队调到溪口，十二总队于4月30日由余姚开往江山，公私行李均先运走。当日行军到百官宿营，又接到交警总局电令转开宁波待命，5月10日十二总队轮运上海。

从挣扎到覆灭

自南京解放，长江防线崩溃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所辖

范围，只剩下沪、杭两地。当时上海至杭州还有铁道、公路相通。5月中旬，嘉兴解放，铁道中断。未久杭州解放，只剩上海一个孤点了。

上海地区，原有三个军和几个交警总队。4月下旬从江防溃退到沪部队约有5个军，以后又新成立了两个军，调集了几个交警总队。约计有10个军，6个交警总队。加上炮兵、装甲兵、宪兵约10个团，一个海军舰队，四个空军大队，总兵力约30万人左右。

交警部队齐集上海后，汤恩伯下令成立上海市区守备兵团指挥部，以交警局长马志超为指挥官，副局长郭履洲为副指挥官，担任上海市区守备。兵团指挥部设于上海市大西路的纺织学校内。除辖在上海的6个交警总队外，还配属一个宪兵团和上海市保警总队、炮兵部队等。

交警十二总队是5月11晨轮运上海，先驻虬江码头附近，担任对浦东的警戒。一天中午，浦东的解放军对虬江码头担任掩护抢运物资的第三大队，猛烈射击，隔河战斗了约半小时才终止。

当时的交警总局分为两部分：一部份由副局长尚望率领去福州，待船运往台湾；一部分在上海。马志超看到上海战争紧迫，借机去福州处理事务，离开了上海。兵团指挥官由副指挥官郭履洲代理。

解放军三野主力部队，沿宁沪、杭沪两路，于5月11日左右，抵达上海近郊，次日夜，向防守沪西南的七十五军阵地进攻，已渡过黄浦江到达浦东的解放军，向高桥防守部队猛攻，战斗紧急，汤恩伯抽调沪西南的七十五军前往增援。并将“上海市区守备兵团”改为“沪南守备兵团”，任命郭履洲为兵团指挥官，指挥交警部队，接替七十五军防务。另有一二三军的三三四师接替北新泾地区七十五军防务。

沪南守备兵团交警部队的部署如下：交警第十一总队（总队长阳旭初）接替七堡公路两侧防务，交警第十八总队（总队长段儒）接替虹桥地区防务，交警第二总队接替屈家桥、周家桥地区防务，交警第五总队接替上海中学以西某地防务，交警第六总队（总队长祁缉光）为总预备队，控制于漕河泾冠生园农场，交警第十二总队（总队长姜建中）接替上海中学附近防务。总队部、直属部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侯广居）驻上海中学；第二大队（代大队长巩兴加）部署于上海中学以南的沪杭公路某号桥附近；第三大队（大队长胡啸华），部署于华泾镇以南既设阵地，左至黄浦江西岸，右与第二大队公路阵地衔接；第四大队（大队长张守谨）为机动。

以上6个交警总队，统归交警第一旅旅长周文新指挥，并配属有一个战防炮营，一个上海保警总队，旅司令部位于漕河泾冠生园。

交警第十五总队的一个加强大队（大队长谭瑞麟），随兵团指挥部行动。

我部因连夜冒雨接防，对当面解放军的兵力、番号等情况，上级机关既无通报，移防部队也未提供资料。交警十二总队接替华泾镇地区防务时，连一张兵力部署图都没有留交给我们，我们只好冒雨察看阵地，才把兵力部署好。

接防几天内，解放军对我阵地进行了试探性进攻，十一总队的七堡阵地，十二总队第二、三大队阵地发生前哨战。

5月22日夜，防守七堡的交警十一总队，受到解放军的激烈攻击，阵地多处，几次复失复得。24日晨，解放军再次以炮火掩护，发动猛攻，工事被摧毁，交警十八总队虹桥阵地同时被攻击，退回主阵地。情势危急，守备兵团指挥部即令交警六总队、交警十二总队派一个大队，配合炮兵、装甲兵前往增援，因受解放军阻击，未能与他们汇合。

交警十一总队被迫退到黄家花园附近预备阵地，继续抵抗，但发现旅长周文新率旅部已退入市区，无人指挥，第十八总队也自虹桥全线撤退。至此，七堡至虹桥地区，被解放军占领，同时解放军猛攻屈家桥、周家桥第二总队阵地及上海中学以西的第五总队阵地，并以一部向上海市区攻击前进。各总队相继退入上海市区，沪西南防线全线瓦解。

交警十二总队所在的华泾镇地区，是沪南最突出的阵地。这时虽未发生战斗，但解放军突破了西南防线，并直插市区，有截断后路之虞。23日上午，以第三大队为掩护，全总队退入市区中山东路沿徐家汇机场之线。当三大队最后由华泾撤退时，解放军猛烈追击，三大队边打边退，交替掩护，才进入市区。

当日下午，十二总队还企图绕入市区木城继续抵抗，中途遇到解放军的阻击，部队溃乱，伤10余人，总队主力退到长治路，第三大队一时与总队失去联络，当夜退到苏州河北岸，24日与总队取得联系，退到长治路，并继续向杨树浦撤退。曾经试图在军工路附近选择阵地，继续抵抗。因与兵团指挥部、旅部失去联系，对其他总队也情况不明，不便孤军行动，继续沿军工路北退。中途被五十四军拦阻，才中止北退。

当日下午5时左右，兵团指挥官郭履洲以联络部队为名，乘吉普车由吴淞口沿军工路南下的，途遇十二总队，同总队长姜建中密谈了一阵，命总队速向吴淞口登轮去舟山群岛，并发给应变费金圆券1亿元，随即离去。

为了继续向吴淞口撤退，我部与第八师师长施有仁交涉，施说：“没有汤总司令的命令，任何部队都不准通过。”只得继续呆在原地等待。直到晚上8时左右，才让通过，事后才知道，这是上海防卫司令石觉交代的。

5月25日晨，交警十二总队在吴淞口小学集结清点，除少数官兵，其中包括第一大队长侯广居，中校总队附刘华藻（他

们都携带家属)等失散外,其余均收容归队。〔因为浦东有炮弹落到吴淞,全总队即向江湾转进。行抵中途,总队长姜建中命令队伍就地休息,并命各正、副大队长集合。计有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郑凯,第二大队代大队长巩兴加,第三大队队长胡啸华、副大队长陈凯,第四大队长张守谦。姜建中征求部队怎样行动?大家沉默不语。我考虑到上海几十万部队被打败,大势已去,何必再去送死。即明确表示自己主张:“不打了”。大家同意后,姜建中无可奈何地说:“那你们自己拿主意,我是要走了”。随即他化装成农民模样,带了一个姓张的副官溜走了。

我们几个大队长商量后,带队伍继续前进,沿途冲破五十四军的拦阻,到达江湾原上海新市政府里休息,因该处容纳不下,让总队部、直属部队、一、二、四大队驻此,我率第三大队移驻附近原陆军医院内。并交代各中队赶快到吴淞口车上取粮做饭,饭后全体休息,不必警戒。

当时市区沉寂,因不知解放军在什么方向,尤其是五十四军控制交通要道,不便派人去找解放军联系投降之事,打算先休息再说。

下午2时左右,一部份解放军到达。总队部、直属部队、一、二、四大队,先集体缴械投降。同时有三个解放军进入原陆军医院内坪中,我得知后,即急步到走廊,见到机枪中队长吴志毅持枪欲打,被我制止。我随即到坪中对解放军表明自己身份,洽谈后,即命全大队原地放下武器,人到坪中集合,将全部美式装备交了解放军,国民党交警第十二总队至此全部灭亡。

我参加第三势力和空投湘西前后

高 嵩*

一

1949年秋风送爽时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歼下，国民党官兵如落叶般凋零四散。我携妻张整秀随十师（属十四军，原属九十三军，师长谷丙奎）从桂林西撤。我在柳州被冲散后，同少数人东窜至武宣，沿江东下，经梧州、广州逃到香港。香港当局视我们为中国的政治难民。我们徘徊十字街头，手上200银元不到半个月就用光了。找工作谈何容易！香港大学教授徐庆誉，长沙人，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夫人姓丁，有两个孩子，住香港皇后大道浏阳公园爆竹庄3楼。经人介绍，我以同乡身份登门求助找工做糊口，好心的徐教授夫妇四处奔走，无能为力，只好将我和妻子留住数日，表示怜悯。流落香港的成千上万的难民同我一样，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当时，香港何里活道东华医院设有一个难民部，救济难民。在湖南安化人李乐平上校和李义和中校帮助下，难民部魏主任开恩，将我登记入册，编为难民，得以暂且栖身。二三天后，难民蜂拥而至，难民册只登记到200名就关门了。何里活道有个半救济性质的饭馆，大约是教堂办的，每餐收港币5角，卖6盎司最低级米饭和少许蔬菜，价格便宜，许多难民争先恐后抢购。

有的难民在港口码头讨工做，工头随便给点薪水，一天多则3元，少则5角。九龙新界马鞍山有个矿厂，厂方只管饭不

* 高嵩系“自由中国运动”湘西地区成员，1953年正月十五日，空投龙山时被捕。

发薪，难民明知上当，也心甘情愿效劳。石门人陈汉英、陈启武在青山建生砖瓦厂挑砖瓦卖力气，磨骨头养肠子。我与妻子编藤椅、糊火柴盒，夜以继日工作，借此增添收入，改善生活。

有的则偷抢度日。保靖人石清泉、常德人杨庆文和刘宜君（又名刘章，在香港改名刘港）迫于生计，寻机偷抢。石清泉被差馆差人（即警察局警察）抓过两次。头一次被拘留三周，第二次因抢劫一少女提包，被用小汽车拉走，甩到偏远荒野，算是驱逐出境。

有的随军家属无可奈何，以卖淫为生，有的老弱病残不得不沿门托钵，饱尝辛酸。

香港，这一酒绿灯红、轻歌曼舞的花花世界，毕竟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那时候，我们人在香港，心在台湾。永顺王村的向春生、龙山的周南、乾城的曹景，湖北省的金家培等人，在台湾有靠山或者熟人，他们收到了从台湾寄来的入台证。大家十分羡慕，叹息自己命苦。有个叫周雍南的河南人，自称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曾任桂林突击第三总队总队长，是师级军官。他邀合200官兵在难民部登记，请求与台湾联络，不知怎么竟得到台湾批准，并收到汇款港币8000元，作为给他们的救济费用和入台开支。可入台证和汇款到手后，他肥私而逃，一家四口不知去向。跟着他屁股后面转的那200官兵，急得跳脚骂娘。

不久，香港当局拨款在调景岭新设难民营。调景岭位于香港筲箕湾对面海岸鲤鱼门坡背。据说以前有个外国商人，在此投放巨资开办工厂，后因赔本上吊自杀，此地因此得名吊颈岭。后吊颈岭更名调景岭，音同义异，意味深长。

调景岭难民营收容了上万名难民，全是流落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湖南籍最多，湘西人约400余名。香港民政局职员方适存任难民营主任，几个副主任由难民担任。

难民营设一个自治办公室，长沙人张振任办公室主任。全营分五个区，各有正副区长一人，还有一个京剧团，归自治办公室管。难民的生活，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每天免费享受最低级大米12盎司和少许蔬菜，分早晚两餐，由一个大伙房烧熟后排队分发。那点儿可怜的救济填不饱肚子，天主教和福音堂趁机在难民营临时盖三个简陋教堂，神父和牧师日夜讲经布道，对听经的信徒（难民）略有施舍，扩大他们的影响，以攫取民心。慈利县的谢伯云，安化县的李乐平等入，钻进九龙戚戚道附近的何文田村福音堂，争当信徒，骗饭吃，并住进了教堂盖的房子。

此时，调景岭难民营自发成立各种组织。最先成立的组织是黄埔军校同学会，有会员1000余名。湖南益阳人熊文钦，自称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任理事会理事长，湘南的陈安邦任监事长。陆续成立的组织有行伍军人行政人员联谊会，吸收会员1500余名，湖北人吴祖申任理事长；有青年反共抗俄联谊会，吸收会员500余名，湖南所里（今吉首）人向日中任理事长；还有荣誉军人联谊会等。

由湖南慈利县谢伯云（自称国民党某军少将）和湖北省金达开（自称曾任台湾《新闻天地》编辑）牵头，联络我和张平、谭巨宏、张立法、杨保球、袁贤文、李心斋、吴贤海、陈天余、张子建等人在九龙荃湾青衣岛歃香拜把，海誓山盟，一心筹备组织促进党。后因派去内地长沙、武汉两地取活动经费者未归，此事不了了之。

各省都有同乡会，湖南省同乡会会员1500余人，其理事长由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长熊文钦兼任。我们湘西地区，包括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古丈、花垣、乾城（今吉首）、泸溪、凤凰、沅陵、桃源、辰溪、晃县（今新晃）、芷江等县，组织有湘西小同乡会，会员400余人。其理事长由青年反共抗俄联

谊会理事长向日中兼任。向日中，独脚（假脚）荣誉军人，能说会道，活动能力很强。为争当理事长，大庸人田秉元（旧大庸县警察局中队长）同他打了一架。省同乡会各县均有代表，我是永顺县代表兼湘西小同乡会监事长。其他各县代表名单如下：保靖石清泉、龙山叶显恭、大庸罗启桐、古文杨光耀、桑植郑克服、沅陵董绍庆、凤凰蒋述圣、桃源杨庆文、芷江张某某等等。

各种组织均以反共为荣。记得难民营里有个姓巫的人，因家中有一枚大陆某工会证章，全营轰动，怀疑他为共产党派来的匪谍、工谍。难民营自治办公室吊销了他的难民身份，难民群包围他的住宅，将他一家五口毒打，并且赶走。一位会画画的名叫南洋的上海人，用旧报纸儿笔画成一张蒋介石头像，写上“蒋总统万岁”五个字，贴在自己住宅大门上，以表示他反共拥蒋之决心。有一次营里欢度什么节日，京剧团晚上演戏庆祝，上演《女起解》、《捉放曹》、《黄金台》、《汾河湾》四出京剧。后来发现将这四出京剧各取一字，连在一起，成了“解放台湾”，遭到非议。但京剧团众志成城，一口否认，自治办公室亦无可奈何。

难民及其它组织之所以以反共为荣，目的是想垂青台湾，设法入台，寻觅救济。湖南同乡会曾收到台湾救济款港币10000余元，每人平均10元。

九龙东头村、石夹尾村、九龙塘村、嘉陵新村等皆系木屋区（即贫民窟）。那里的民宅，全部是用一些手杆大的木桩支撑的屋架，以破旧的油毡围盖遮风防漏，类似工地临时工棚。

1951年农历正月初，东头村不幸失火，全被烧光，受灾民众达2000。香港当局搭棚供食救济，大陆广东派遣20余人组成的慰问团来港慰问。当时的香港各报都登载了这方面的消息。

慰问团的汽车开到弥敦道中，被调景岭难民营聚众围攻。

我们呼口号要慰问团滚回去，有的难民趁机爬上汽车，公开抢劫慰问团慰问灾民的物资。差人解围无效，后来用催泪弹和自来水龙头对付，才把我们驱散。

二

在湘西小同乡会，我结识了颜梧（湖南沅陵人，黄埔军校八期毕业，进过陆军大学，曾任辰溪、沅陵地区警备司令，携其妻杨宏钧住九龙清水湾道钻石山）。1950年冬的一天，他邀我到刘育咸家吃饭。席间，他向刘育咸介绍我参加一个组织。说同他们在一起，可以去外国，前途远大。详细情形他不讲，暂时要我绝对保密，以后会知道。我迫于生计，正愁走投无路，欣然答应。自此，由该组织的张乃恭（桃源人）每月送来美金20元，供我维持生活。

1951年农历三月初一，刘育咸通知我、黄平、周革和一个姓刘的桃源人以及两个河南人，在香港湾仔轩尼诗道轩尼诗大酒楼4楼吃饭。这次吃饭，是为颜梧离港赴日饯行。颜梧为我们打气说：“我们的‘生意’有希望，大家不要丧失信心，我先走一步，不久大家都要来的。”

1952年端午节次日，刘育咸又通知我和上次吃饭的那几个人，在香港德辅道中二大酒家4楼吃饭。这次吃饭，刘育咸叫我和黄平俩人，迅速去医院办好防疫注射手续，并搬到他家来住，随时准备离港。

离港前夕，我与妻子张整秀依依难舍。不去吧，留在香港当难民靠救济，不是长久之计，说不定哪一天突然停止救济，就得挨饿；去吧，妻子怎么办呢？亲人离别，归期渺茫，妻子沧然泣下，我也禁不住泪流满脸。我答应走后按月寄钱，希望她保重身体。多情的妻子抹掉泪水笑着说：“去吧，这是好事情，只是，可别忘记我已经有了身孕。”据说早几年有海外来

信找我，如果是真的，一定是妻子张懿秀，或者是我那未见过面的孩子还记得我。34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我的海外亲人。

1952年农历五月中旬的某天下午4时，我告别了妻子，和刘育咸、黄平以及一位广东人，乘坐美国人陈纳德先生经营的民航公司客机从九龙启德机场起飞离港。陈纳德先生是有名的飞虎将军，抗战时期支援过我国对日空战。其夫人陈香梅女士（广东人）近年曾回国友好访问。我是头一次坐飞机，而且是去外国，心情舒畅，精神振奋，面对蓝天白云，浮想翩翩。我的前途，不也如这飞机青云直上，日行千里吗！即使在国外玩玩也是人生之乐事。飞机经台南上空，当晚23时在日本冲绳机场降落加油，我们进餐，休息半个小时后继续飞行，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已是翌日凌晨3点多钟了。

由8名年青漂亮的日本下女陪同，又用4辆小车将我们4人从羽田机场接走。一小时后，小车把我们送到了--座小山包上的平房。平房四周松林茂密，鸟语花香，环境幽雅。两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翻译在平房里接见了我们，分别与我们个别谈话，叫我们各自写一份自传。在自传中，我写了原籍湘西永顺，年龄33岁，军衔中校副团长，初中文化，以及忠诚组织的决心等情形。

三天后，蔡文治派4辆小车将我们4人接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在香港参加的秘密组织是自由中国运动组织。蔡文治在谈话中，向我们介绍了该组织的详细情形。

自由中国运动组织，又称第三势力，是在美国支持下成立的，实力强大，物质雄厚。既反对被称为第一势力的大陆中共“独裁政权”，又反对被称为第二势力的台湾国民党腐败政府。其政治纲领是联合各党派及其军队，成立自由民主的政

府，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其活动经费用多少算多少，不受限制，由美国总统特别经费拨款，目前月支出约20万美元。该组织机关刊物《自由阵线》，由香港湾仔高士打道田风印刷公司印刷，在香港公开发行，廉价出售，每册港币1角。台湾《新闻天地》每册港币1元。蔡文治是该组织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自号蔡如一，化名吴定，代号YZ。该组织总部设日本神奈川县茅奇。总部下设四个处，一处管总务，二处管情报，三处管作战，四处管后勤，附设塞班岛训练基地。训练基地设有通讯、作战、干部三所学校。香港九龙设有吸收人员和传递情报的港站，日本冲绳岛有中途站，该组织从上至下均有美方指导员。三天前找我们谈话，是对我们进行考核。考核成绩，蔡文治和美方都很满意。考核我们的那两个美国佬，一个名叫保罗，是该组织在香港和茅奇的美方负责人，名誉上是美国驻香港新闻处长；另一个名叫尔里，是该组织湘西地区美方指导员。我们被编入该组织湘西地区指导部。蔡文治告诉我们，湘西地区偏僻落后，山高林密，社会和政治复杂，历来未平静过，是自由中国运动组织发展势力的最理想的一个重要基地。他鼓励我们忠诚组织，好好干，将来前程似锦。

参加自由中国运动组织编入湘西地区指挥部人员30余人，当时同住茅奇总部营房。尚能回忆的名单及其情形，简介如下：

刘育威，桃源人，化名方信，代号K149，因其胞兄是刘戡（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整编九十三军军长，在陕北自杀，后追赠陆军上将）而受到重用，任湘西地区指挥。

颜三梧，沅陵人，又名颜于冈，化名余白圭，代号K148，黄埔军校八期毕业，在陆军大学深造过，曾任辰

溪、沅陵地区警备司令，因系刘育咸举荐，加之吸收人员有功，任湘西地区副指挥。

刘洪才，桃源人，与段文周、郑同川等4人一起编入桃源组，于1952年空投桃源明月山，因毁物拒降，被人民政府枪毙。

段文周，江西人，湘西地区指挥部参谋长。

郑同川，桃源人，湘西地区副指挥。

李大安，桃源人，代号C126，我们同住一个营房，大家叫他房长。

李进德，常德人，化名文光芝，是湘西地区指挥部中方翻译兼我们龙山组中方指导员。

黄平，沅陵人，代号K151，我们空投时他已去塞班岛受训。

周苹，沅陵人，留在港站。

张乃恭，桃源人，留在港站，是港站第四道联络员，单线联络，他前面还有三道联络员。我在港期间，是他按月送我美金20元。

丁兆瑞，沅陵人，代号B865，在港时期，大约是1950年夏天，颜梧派他偷渡潜伏沅陵行动，发行动经费500美元，在深圳过境时被捕，1957年湖南省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

郑克服，桑植人，又名郑元硕，在港时期，二处（情报处）处长侯超文派他潜伏桑植行动，他违令留港未走。

荆纪汤，大庸人，作为我们龙山组补充人员，1953年3月空投桑植，被解放军包围打死。

黄竹祥，永顺王村人，又名黄旭华，化名黄祥麟，代号A250，作为我们龙山组补充人员，1954年春空

投花垣麻栗场，投降后戴罪立功。

麻树怀，花垣人，代号 J 034，与黄竹祥一起空投花垣，是报务员。

张玉琳，辰溪人，其妻周珠，辰溪人，在香港。

龚继鹏，泸溪人，化名胡章，代号 C128，在茅奇总部伞房任职。其父龚德柏办过《救国日报》，绰号龚大炮，所以我们叫他龚小炮。

张子健，陕西人，留港站。

钟培常，四川人，化名金辉，代号 C135，1953 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与我一起空投龙山，被俘后戴罪立功。

刘玉麟，龙山人，化名叶仁，代号 K149，龙山组组长，曾任旧龙山县警察局长。1953 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与我一起空投龙山，被解放军包围打死。

黄孝度，衡阳人，化名郭世杰，代号 R042，1953 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与我一起空投龙山，被俘后戴罪立功。

高 嵩，永顺人，又名高世芝，化名李大年、郭忍，代号 K152。1944 年参加青年军远征印度，曾任驻防桂林十四军十师二十九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参加过抗日战争。1953 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空投龙山，被俘后戴罪立功。

尔 里，自由中国运动组织湘西地区指挥部美方指导员。

全部自由中国运动组织人员一一编有代号，联络时一律用代号或者化名，各人籍贯、真名、简历均系自报，填写自传登记入册，是真是假，互相无从得知。代号中英文字母 Y j R C C A K 相连拼音即自由二字。

自由中国运动组织人员，绝大部分来自流落香港、澳门两

地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少数海外侨胞。被吸收为成员后，可按月领取生活费。生活费有美金5元、10元、15元、20元等不同等级。经总部审查认为可靠的人，才能批准去日本接受总部当面考核，总部从中择优选择人员送塞班岛训练基地受训。

我在总部亲眼看见一个山东人，因被疑为共产党间谍而关禁闭，脚链手铐3个多月，差不多每天由4个处派人轮流严讯、逼供、毒打。后来吴定（蔡文治）在一次大会上宣布将他枪毙。有个化名叫王理明的四川人，代号C134，很肥，我们叫他胖子；还有一个湘南人，代号R038，由塞班岛通校结业后，分配在湘西地区指挥部做报务员。他们两人请求参加我们龙山组行动，经总部批准后，他俩又提出参加别的行动组。总部很气愤，立即将他俩人禁闭关押，严加审讯，其结果不知如何。

1952年7月，湘西地区指挥部中方指导员文光芝，通知我去塞班岛训练基地受训。

塞班岛长约20余公里，宽约七八公里，地处偏僻，与其他海岛相距甚远。美国人选择该岛做训练基地，大概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吧。据说二次世界大战前，岛上有居民5000，这时只有400多人了，而且80%是妇女，老年男人每人也有五六个妻子。一道铁丝网把基地同当地居民隔开。

训练基地设有干部、作战、通讯三所学校，学员近3000人。各校的教育长和教官，均由蔡文治任命。基地与总部一样也没有总务、情报、作战、后勤4个处，各机构都有美方指导员。基地日常工作由一位副总司令负责，港站也有一位副总司令。蔡文治长住茅奇总部，很少来这里。

我进战校受训，与400余名同班同学学习徒步、跳伞、气象、雕刻、开车跟踪、窃听电话、破坏汽车排汽管、地下作战、空投接收等特工基础知识，受训时间半年。

受训期间，要求高，管理严，违者受酷刑处置。违法者不

外乎三种情形：共谍嫌疑，意志动摇，擅自外出。以第三种为数最多，因为铁丝网外有日本女人。

受训期间，每人都要写行动计划。1952年底，我和刘玉麟、黄孝度、钟培常写的行动计划得到总部赏识。在尔里指导下，我们4人编为自由中国运动组织湘西地区指挥部龙山行动组（龙山组辖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古文六县），由刘玉麟任组长，接受了窜回湘西任务。我们经过研究，由刘玉麟执笔，写出组行动计划，报茅奇总部备案。计划内容：一是湘西情形和熟人关系，如瞿波平、彭雨卿、田高年、张大治、彭叫驴子、李兰初等，被视为我们主要的联络对象；二是选择山高林密以利隐蔽的龙山县洛塔界吴作亭作为空投场地，来凤县白福寺附近的鲤鱼洞做预备空投场地。

1953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三），龙山组的行动计划得到批准，蔡文治总司令和美方湘西地区指导员尔里以及作战处长，派小车接我们去茅奇总部受令。蔡文治在讲话中引经据典，鼓励我们，以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和我国古代田横等500壮士为榜样，千方百计誓死完成行动计划。尔里命令我们空投成功之后，安全潜伏，收集情报，在可能情形下，联络发展当地武装（土匪）力量，俟机配合第三势力，颠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尔里希望我们团结效忠第三势力，许愿升官发财，将我们的月薪由60美元增加到120美元，以我们的名字，按期存入美国银行。

正月初七日，茅奇总部设宴为我们饯行。蔡总和尔里亲自举杯敬酒，祝我们的行动计划圆满成功。酒后，他俩陪同我们乘专机赴冲绳中途站，表示送行。

三

正月十五日夜，是我国传统的元宵佳节，这时，我们湘西

地区龙山组一行4人，受美国自由中国运动组织之派遣，由4名美籍武装人员护送，乘坐一架美籍驾驶员驾驶的美制C54无标志民航飞机，从日本冲绳机场起飞。飞机不亮灯，声音小，借融融月光，几乎是贴着太平洋水面悄悄飞行。接近中国大陆时，飞机突然升高万米，暗中前进，到达湘西上空后，降低至5000米左右，减速旋飞，寻找预定的空投目标。

约凌晨1时，武装护送人员敞开机门，通知我们跳伞降落，我们跳下来了。连接在飞机上的只能承受15公升重拉力的尼龙绳断了，我用双手压力启开缚在胸口上的自动挂钩，挂在胸前的100公斤重的包裹先掉下来，头上的降落伞张开了。钟培常落在树上，我和组长刘玉麟、电台报务员黄孝度落在荒野。我们吹口哨互相联络，聚在一处，烧毁降落伞，打开包裹，吃罐头，吸香烟。因为不识方向，只好睡在特制鸭绒睡袋里休息，等待天明。

天亮了，我们才知道降落地点不对，错投在龙山县桂塘坝一带山上。

天亮后，有3个放牛人发现了我们，组长刘玉麟开枪未中，放牛人跑了。我们连忙爬上山顶，躲藏在树丛里。刘玉麟原属龙山帮会成员，决定利用这种关系联络。晚上，我们脚穿高筒靴，朝东北方向艰难移步。就这样，我们日藏夜行，度过了三天三夜。

第4天（三月四日）清早，遇民兵包围阻挡，钟培常胸口被子弹擦了点小印，他开枪还击，民兵退走，我们躲在树林里。不久，公安部队来了，民兵来了，人山人海，声势浩大。“蒋匪帮，缴枪不杀！”“蒋匪帮，缴枪不杀！”呼声连天，岩壁回应。突然，一发冷弹击中刘玉麟胸口，当即死亡。四面楚歌，我们三人被迫举手投降。

上司规定，如被发现，毁物就义，宁死勿降。我们却将电

台、通讯联络表、密码本等物，完部妥善保存无损，可见我们投降之诚意。

投降后，我们被押送至湖北来凤县公安局。一周后，湘鄂两省公安厅来人了（湖北省公安厅的徐副厅长，湖南省公安厅的李强处长、龚华科长等），取道龙山、永顺，将我们押送湖南省公安厅。当时在场的还有永顺专署公安局刘万全局长、永顺县公安局彭祖贵局长、龙山县公安局孟昭珍局长，湖北省来凤县公安局的干部。

在押期间，公安干部把我们当人看待，从不打骂。省公安厅唐科长（女）、龚华科长等，经常陪同我们喝酒、吃肉、打麻将，用各种方式方法亲近我们，帮助我们解除顾虑。省公安厅梁湘龙副厅长、李强处长等，耐心地向我们宣传共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政策，教育我们弃暗投明，将功补过。比我们早些时间空投到桃源明月山的桃源组郑同川、段文周、刘洪才等4人，因顽抗到底，全部被枪毙，似一声警钟，在我们耳边敲响。人心不是铁打的，在事实面前，我们受到了教育，看到了前途和光明，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经中央公安部批准，在省公安厅精密部署下，我们配合行动，开始将功补过。

1953年春末夏初，我们从来凤按密码发电联络，报告吴定（蔡文治），龙山组空投成功，安全潜伏，组长刘玉麟病死，请求总部派机空投援助。茅奇总部信以为真，在1953年8月和1954年春天，两次派飞机空投人与物。第一次空投于桑植，第二次空投于花垣。

1954年5月，吴定复电，令我化名郭忍，赴广州市西关恩宁路恩宁新街12号，接收援助物资。接头时间连续7天，约定每天上午某时，限制在10分钟内进行。送物人化名卢笛，到至12号

门前，右衣领内扎，右衣袖上卷，我以左手掏出白手巾揩右眼。卢笛言，请进，休息一刻钟，我回答休息五分钟。卢笛送我人民币四千元后，俩人合影留念，表示接收成功。暗中指导我行动的省公安厅龚华科长等住广州广西堤二马路，我住广州大新路旅社。

去广州前，湖南省公安厅派欧阳总去我家乡，将我发妻田兆香、九岁女高武香、胞兄高世润三人接来，安排我和亲人在沅陵相会团聚两天，以示关怀。

此次在广州接收成功后，吴定来电祝贺。夸我说，见大年照片容光焕发，非常高兴；指示我安全潜伏为首要，继续行动：提升钟培常和我为第三势力湘西地区正、副指挥官，黄孝度为电台台长；令1954年春在花垣空投的黄竹祥等人补充我龙山组，协助行动。

1955年3月，吴定又复电，批准我去广州市海珠南路某号门牌，接收电台物质和活动经费。接头时间连续7天，约定每天上午9点，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站在门口剔牙齿。我问他：“请问你的表准不准？我对一下时间。”他回答：“请进，喝茶。”我说：“谢谢！”这次接收因接头人未来而失败，暗中指导我行动的人是湖南省公安厅高科长等人。

1956年，台湾“国防部”二组从九龙来密信，寻问行动情形，指示说第三势力已垮台，与台湾合并，原组织人员由台湾安排，属台湾“国防部”二组领导。其领导人钟兴要求我继续行动，说九龙城狮子石道某某门牌，是我投寄秘信的秘密联络地址。我的秘密联络地址，由省公安厅规定为长沙解放路万丰香烟肥皂店。这之后，联络过一段时期。

1957年5月，湖南省人民法院下判决书，通知我免于刑事处分，或回乡务农，或进农场做工，听凭自愿。我因有原配妻室在家，选择了回乡务农之路，从此落户永顺县勺哈乡。

（胡文江 整理）

最大的湘籍军统特务张严佛

陈 达*

解放前后，不少人知道湖南省三大军统特务或称之为“三李”——李崇诗、李人士、李肖白。但很少有人知道比“三李”更大的湖南军统特务张严佛。张严佛在军统中的历史、资格和官阶等都高出于“三李”。更为重要的是张严佛在湖南和平解放中有过特殊的贡献，他是参与程潜为首的湖南和平运动核心人物之一，起义后迭遭保密局头子毛人凤派人暗杀未遂。张的一生，虽然经历曲折，然而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幡然悔悟，弃暗投明。说明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原先最顽固的高级特务，也是能够靠拢人民的。兹就我所知道的张严佛生平事迹，略述如次。

张严佛，又名张毅夫，湖南醴陵东乡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张在北师大毕业后，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司令部任少、中校科员、科长等职，从此结识了程潜。第六军垮台后，张严佛因与邓文仪是小同乡、小学同学，遂由邓文仪介绍，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课，任中校股长，调查课课长邓文仪对张十分信任，调查课的具体工作，多委托张主持。不久，邓文仪因调查飞机出事案失实，被人检举有受贿嫌疑，因而触怒了蒋介石，蒋撤了邓文仪调查课长职务，并令戴笠接管了南昌行营调查课工作。当时戴笠已是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接管调查课时，将调查课全部人员也接收了。戴笠见

* 陈达与张严佛同乡，曾任军统南昌站副站长，现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张严佛对情报业务很熟悉，且有大学文化程度，办事能力很强，甚为器重。接收调查课不久，便调张严佛为复兴社特务处书记长，书记长相当于秘书长职务，戴把特务处全部业务交张总管。张对戴亦感知遇之恩，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其时，后任保密局局长之毛人凤只不过是特务处一名科员而已。

1941年，戴笠以西北地区工作重要，委派张严佛为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区部设西安。西北区辖西北数省的省站，张严佛成为军统在西北的总头目。其时，任天水行营调查课课长李人土等，亦归张严佛指挥。张任西北区区长期间，指挥部属侦捕杀害了中共重要干部车耀先、罗世文等。

不久，戴笠调张为军统局主任秘书，处理内部事务。由于张严佛既非浙江人，又非黄埔军校出身，且生性耿直，不事吹拍，为戴笠的浙江江山同乡所排挤，一度降为秘书。而原来是张严佛部属的毛人凤因系戴笠之同乡，又善于逢迎，很快升任了军统局主任秘书，张严佛倒成了毛人凤的部下，张从此内心十分不满。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严佛一度被任为军统局重庆结束办事处主任，负责处理军统局在重庆的人财物等事宜。军统局局本部大部分人员均已返回南京。其时，蒋介石令戴笠将关押在贵州已久之张学良将军转解台湾继续看管。由负责看管张学良之刘乙光（湖南永兴人）将张学良押抵重庆。戴笠令张严佛在重庆包了一架客机，伪称将张学良送往南京，张学良甚为高兴，以为抗战胜利了，去南京见到蒋介石，一定可以恢复自由。谁料飞机不是飞往南京而是台湾新竹，张学良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继续由刘乙光看管。

1946年秋，张严佛被任为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保密局是由军统局改组而成的，局长郑介民，后为毛人凤。张严佛担任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实际是一个闲职，共有设计委

员数十人，都是卸职的各省站站长及局本部的处长等，并无具体工作可做。张严佛屈居毛人凤之下，又无所事事，心情极为苦恼。

1947年冬，看管张学良的刘乙光与张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张学良通过去探望他的张治中等人向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反映，要求更换刘乙光。郑介民、毛人凤因张严佛曾与张学良相识，商请张严佛去台湾考察张学良的思想，实际是要张严佛暂代刘乙光去看管张学良。张严佛因在南京十分苦闷，答应去台湾一月，和张学良谈谈心。张严佛在台湾新竹与张学良相处一个月中，张学良向张严佛倾诉了长期被无理关押和饱受刘乙光夫妇的虐待之苦，声泪俱下。曾给张严佛写了五言绝句一首：“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严佛兄存念，张学良敬赠。”张严佛离台返南京时，张学良一再托他向上级反映：一是长期关押是犯法的；二是刘乙光夫妇对他过分虐待，请求撤换看守人员。张严佛返南京后向郑介民、宋美龄反映了，因蒋介石不同意，终无结果。

张严佛在南京期间，陈明仁正被贬为总统府中将参军。张、陈同乡，小时同学，交情甚笃。在京交往中，同感国事日非，张积极怂恿陈设法再谋兵权，以图应变。

程潜竞选副总统期间，张严佛在京亦积极为程拉票。程落选后回湖南任省主席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张严佛早想脱离军统，摆脱同毛人凤的关系，于是他返湘另谋工作。程潜德高望重，雍容大度，虽知张严佛系军统分子，但只要为他所用，也一视同仁委以重任，初委以长沙绥靖公署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肖作霖由联合办公室主任调任长沙警备司令后，肖保荐程星龄（原联合办公室副主任）为主任，程潜却批示：“以张严佛升任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总揽湖南党政军有关和平解放事宜。

程潜在湖南停止征兵、征粮后，蒋介石即察觉程潜有“叛变危险”。曾指示毛人凤说：“不能让湖南再出一个傅作义了”。言下之意，要毛人凤暗杀程潜等人。

当陈明仁因故愤而返回醴陵时，程潜叫张严佛与李君九、温汰洙等人去醴陵劝说陈明仁以湖南和平解放大局为重，速回长沙主持工作，张会同李、温等完成了这一任务。

1949年5月间，毛人凤密派机要秘书毛钟新（浙江江山人）来长沙，会同保密局湖南站长夏松，阴谋组成“湖南政局侦防组”，阴谋暗杀程潜等人，其中也包括张严佛在内。

当时在湖南的军统人员，有起义与反起义两派，以张严佛为首的起义派，计有刘人爵、任建冰、黄康永、李人士、刘人奎、陈达、刘炳文等，反起义派有杨继荣，夏松、毛钟新，毛健钧、唐光辉、易德钧等人。张严佛经常参加程潜、邓介松、肖作霖、程星龄、陈明仁等人的绝密会晤，在得知毛人凤派毛钟新企图暗杀程潜等人的消息后（这消息是湖南站人事科员刘炳文告知张严佛的），再三函电陈达来长沙，挫败毛钟新的暗杀阴谋。因我与毛钟新私交较好，当时又不在长沙工作，就利用毛钟新不怀疑我会起义的弱点，从毛那里了解到杀程的具体部署。经张严佛向程潜反映后，程加强了戒备。最后用恐吓办法赶走了毛钟新，毛人凤暗杀程潜的阴谋未能得逞。

长沙和平解放前夕，张严佛还通过军统湖南站人事科员（又称站员）刘炳文把军统布置在湖南各地的潜伏特务名册抄了一份。长沙解放次日，张严佛即将这份名册交给了夏印同志（解放后任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夏印根据张严佛提供的名册，很快将潜伏特务一网打尽。

旋后张严佛被调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协助工作，对肃清军统特务起过有益作用。

据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在改造中交代：长沙解放后不久，

毛人凤密电从汉口派在军统兰州特训班受过训练的特务四人潜入长沙，务必将“叛徒”张严佛暗杀，并告知凡解放后留长沙的军统人员皆已“叛变”，都在暗杀之列。张严佛在长沙解放前夕住北正街一家南食店后面。他知道毛人凤、毛钟新等不会放过他，长沙解放第三日，即秘密迁居洪家井，深居简出，以防不测。暗杀张严佛的特务，因找不到张严佛的新住址，无从下手。于是改杀刘人爵于浏正街寓所。据说这四名特务认识刘人爵，在刘被害前，张严佛对刘打过招呼，要他提高警惕，可惜刘未听从，因而惨遭特务的杀害。

张严佛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协助工作期间，毛人凤再一次派特务企图暗杀张严佛于广州。据说是在酒中下毒，由于张警惕性高，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因极“左”路线影响，张竟被诬为“假起义，真潜伏”的特务而冤死狱中。三中全会后，才由公安部给予平反，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并妥善安置了张的家属。

第二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

1943年秋，第二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在湖南南岳枫木桥成立，该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梅乐斯、陶一珊，总队长是何际元。参加受训的人数有1000余名，主要是军委会别动军第四纵队何际元部，以及军统在湖南招抚的土匪陈士虎部。他们主要学习使用美制新式武器以及美国的特务技术。这批学员于1944年5月结业，结业时，他们全都装备了清一色的美制武器，该训练班因日军节节进逼而迁往湘西的洪江续办。

(章平安)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

刘植根*

周伟龙，字道三，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6月30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十三都的三迁潭家湾（现湘乡市仁厚乡桃丰村）。

我家和周家相距只有几里路，我父亲曾一度在周伟龙手下当过录事（文书）。1948年周伟龙任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简称交警总局）局长时，任命我为交警总局第三处雇员，安排在局长办公室服务，负责管理函电和文件的收发，我与周朝夕相处，对他比较了解。

周伟龙长期居官在外，20年代初，他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周与谢先世有通家之谊。周本人个子魁梧、博闻强记，到职后只一个星期，便将一本电报明码背得滚瓜烂熟，深得谢的青睐，后保送他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率部驻汉口。唐生智通电反蒋时，蒋介石派遣戴笠到汉口策反及搜集情报，戴因办事不慎被武汉宪兵部队逮捕，搜集的情报也全被抄去，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打听到宪兵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见面之后，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弃官逃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因此周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十人团”的成员之一^①，也奠定了周日后在军统

* 刘植根曾任交警总局第三处雇员，后任交警总局第四处出纳。

①戴笠特务系统形成之前，与张炎元、黄甫、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扶、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等九人为蒋介石集团从事特务活动，尔后他们被人称之为“十人团”。

中的地位。

周伟龙投靠蒋介石后，长期从事特务活动。30年代初在汉口当了几年警察署长，适值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驻汉口，他们交往甚密。1935年冬，周伟龙在汉口结婚时，张学良从西安派人送来礼券5000元。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囚禁在南京太平门孔祥熙的一栋公馆里，由（军事委员会特务处的）周伟龙和（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的）丁昌率特务15人、宪兵特高组组员7人，宪兵一排负责监视看管。周伟龙殷勤照料，情谊不减当年。

1937年，周伟龙调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后，戴笠在上海联络青、洪帮和一些社团工会等成立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在法租界善钟路附近办公，杜月笙当主任委员，戴笠为委员兼书记长，临时拼凑了一些支队、联队等特务武装。上海撤退前，带领这些部队的特务头子，有的丢了部队逃到租界，有的逃离上海，只有周伟龙潜伏在法租界内，从事锄奸、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作。在这里他做了一件得意的事，就是刺杀唐绍仪。唐绍仪，广东香山人，因参加陈济棠的倒蒋活动，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倒蒋失败后，唐绍仪避居上海租界，因酷爱古董，周伟龙投其所好，于1938年派人上门以销售古玩将唐刺杀于上海租界寓所。

1939年，周伟龙被调到重庆，一度担任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书记长。

1940年春，戴笠到江西上饶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组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下编三个纵队。由周伟龙任总指挥，负责苏、皖交界地带的防务，实际是同新四军在苏南的各支队闹磨擦。有一次，周伟龙带领两个营袭击新四军，遭到伏击，几乎全军覆没。事后他还自我解嘲地说：“我在望远镜中看到了陈毅，要是多带点部队去就把他俘获了。”1940年11月

6日，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到柏垫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与周伟龙密商，结果不到两月，即在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1942年，周伟龙调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司令部设在重庆小龙坎红槽坊周家湾。同时，周伟龙还兼任中英情报合作所主任，英国的安德逊任副主任，这个所向英提供日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1943年底停办。此后周伟龙又与美国人合作在湖南南岳、江西上饶、福建建瓯和漳州等地举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别动军的骨干。由于周伟龙与美国人的关系没有搞好，被解除了别动军司令职务，调往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当天晚上，周伟龙正在公馆设宴，款待湖南省参议长赵恒惕，听到戴的死讯，他向客人说明原委后，立即驱车赶到军统局，企图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角逐军统局长的“宝座”。但他论资历，不及郑介民（广东人，黄埔二期，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论关系，不及毛人凤（浙江人，军统局副局长兼主任秘书）和唐纵（湖南人，黄埔六期，留学德国学过警政），当然没有他的份，仅被任命为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因此他愤懑而失意。

周伟龙极为自负，却不治私产，乐于助人。早年他在老家丹墀照壁腾龙图案上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云”。1938年，他带着新婚夫人骑马回家探亲。晚上马伕问他父亲：“马关在哪里？”他父亲不满地回答：“拴在你们老爷的床铺架子上！”这样他才设法在家乡买了40亩水田。他在重庆时，李俊龙、田湘藩二人都因经济困难得到他的帮助。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伟龙在南京组织了陆军大学湖南同学俱乐部，并被选为南京的湖南同乡会理事长。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

副总统时，作为湖南同乡会理事长，他除对湖南代表尽东道主之谊，殷勤招待外，还特别为程潜竞选副总统卖力。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据守东北的交警第二总局所辖交警总队全军覆没，在南京的交警第一总局所辖的交警总队也损失惨重。蒋介石即起用周伟龙担任交通警察第一总局（简称交警总局）局长，仍兼军法执行部主任。

1948年3月8日，周伟龙到南京朱雀路邀贵井14号交警总局局本部接印视事。

交通警察总局在体制上属交通部领导，管辖全国（不含东三省）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方面的交通警察事务，实际上是国防部在交通方面的特务机构。由国防部批准建立18个交通警察总队、4个教导总队，主要是配合“戡乱”，担任南北铁路主干线的护路任务。

周伟龙接任后，就大刀阔斧地调整人事，他首先从局本部开始。总局共设六处五室：第一处管军事训练和作战，第二处管警务情报，第三处管军法，第四处管军需，第五处管总务，还有国防部派驻的政工处，以及秘书、人事、会计、督察、专员等五室。周调整任命的主要处、室负责人有：第一处李育文（周的陆大同学），第二处周康，第四处朱缙（长沙人），第五处晏子风（湘乡人）、侯中祥（保密局总务处长兼交警总局第五处副处长），政工处易珍（醴陵人），人事室主任刘子英，督察室主任龚少陶（湘乡人），其余处室调换了大部份科长级人员。新任命王力忠、邓季之、文德、喻勋衡、张仲鸾、李雪华等湘乡和宁乡同乡为总队长。留任的总队长邓展漠、张先正、汪浩然、温应冰也大部份是湖南籍或周的旧部。这些内外骨干都是周在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时的旧部亲信。

早在1947年吉章简任局长时，驻在东北的交警十三、十四

总队，因作战“有功”被国防部改编为两个师，总队长何际元升充师长。周伟龙接任后，恢复了这两个总队的建制，调何际元担任交警苏州员警训练班副主任，周兼主任，培训中下级特工干部。

1948年6月，周伟龙除原有的18个交警总队和4个教导总队外，又多次向国防部及交通部提出增建3个交通警备旅的建议，并三次晋见蒋介石申述理由，在国防部次长刘斐的鼎力支持下得到批准。是年7月正式成立，任命何际元、张绩武、王力忠为旅长。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当时担任陇海、津浦铁路护路任务的交警总队，在徐州“剿总”的统一部署下，被调离铁路，摆在首当其冲的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周伟龙为了保存力量，当战事转移到津浦路徐州、蚌埠一带时，国防部批准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周兼任护路司令，以掌握对交警部队的直接指挥权，避免投入野战部队。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撤销，周率人马撤回南京。

“国大”落幕以后，国民党部队在各战场都大吃败仗，国民经济近于崩溃，各地学潮此起彼伏，人心思变，周伟龙也在考虑何去何从。他的公馆每天都有客人来访，中共高级干部李卓然的弟弟、“立法委员”李俊龙，更是常客，有时长谈到夜深人静。

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自南京返回长沙后，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在全省停止征兵，实行二五减租，准备起义。1948年9月，周伟龙派政工处长易珍回湘联系，派周宝岩为政工处副处长，代理处长职务；免去钟明德文化专员职务，停办交警总局的反动刊物《警钟》；而以同乡张朗山接任文化专员，创办有进步姿态的《前进》月刊。与此同时，周伟龙又邀请湘籍陆大同学、进步人士黄克虎担任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

主任，要他负责与程潜、唐生智联系，并控制驻湘的交警部队。11月中旬，交警总局家属及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由南京乘铁甲车抵达衡阳。刘斐、李俊龙的家眷也同车到达，由黄克虎负责照料。把原计划迁往福州的在上海的交警第三仓库、上海修械所的全部机器设备及军用物资，改由第四处处长朱缙负责迁运衡阳。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周伟龙把我从局长办公室调出去担任第四处出纳，从朱缙和晏子风（总务处副处长）手里接管黄金108条，共57.8斤。周当着朱缙、晏子风、喻卫黄之面叮嘱我：“现在形势紧张，这些金条是全局性命所在，你须特别小心谨慎。”

1949年元月，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国防部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前往担任警卫任务，周伟龙调去的却是从徐、蚌撤退下来残缺不全的第一、第二总队。同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命令周伟龙成立京沪铁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队集中京沪一带待命。周伟龙不愿意把集结在浙赣线上准备开往湖南的部队往回调，仅成立了一个由副局长吴志勋兼任司令空架子沪路司令部。这两事引起了毛人凤和汤恩伯极大的猜忌。

1949年元月下旬，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京告急，交警总局留京人员全部迁到苏州。周伟龙和我以及他的随从副官沈志瑜，及一个警卫班住在苏州公园路3号一栋小楼房里。其余人员都住在阊门外交警员警训练班原址。2月2日至3日，周伟龙在公园路3号召集邓季之、李雪华、王力忠、喻勋衡、温应冰等主要负责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派邓季之、李雪华率领交警第七、八两个总队自上饶出发赴衡阳。2月4日，周伟龙乘京沪路专厢前往上海，准备在2月8日乘飞机去衡阳，同行的有总统府参军肖勃、机要秘书李甲孚，以及我和沈志瑜、译电员陈俊坤、通讯兵阿金，还有卫士6人。我们抵达上海后住进国际饭店，周伟龙要我们生到跑马厅交警第三仓库去，并叮嘱我

把金条放到他的住室里，然后又叮嘱我们，有事他会打电话通知我们，无事不要去找他。2月7日清晨，正当我们在住所街心漫步的时候，肖勃迎面走来，看见我们连忙招手，选定一个较僻静的地方低声告诉我们：“局长昨晚被押，你们赶快回苏州去！”不等我们问话，他便急匆匆地走了。

听罢肖勃传来的不幸消息，大家垂头丧气，只好搭京沪列车回苏州总局。跨进卫门，营房依旧，人事全非。原副局长马志超继任局长，曾被周伟龙免职的交警十八总队总队长郭履洲任副局长，我的出纳科员职务被郭带来的军需接替了。新局长召集我们训话：周伟龙图谋不轨，叛党投敌，已被逮捕，同谋犯邓季之、李雪华也于2月6日晚在金华车站被捕；保密局将组织“专案小组”进行审查。希望在职人员安心工作，继续为“党国”效劳。而且把程潜、唐生智大骂一通。周伟龙出事后，局内人心惶惶，湖南籍的各级人员，在衡阳的自动挂冠另谋出路，留在苏州的也相继获准长假离去。事后听说周伟龙、邓季之、李雪华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这是误传，实际上周伟龙是1950年被杀害于台湾新竹。

1986年3月，全国政协第六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委员程星龄、唐生明、黄克虎联名提案提请中央统战部按照政策把周伟龙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经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审查列为一三三号提案。同年12月22日中央统战部办公厅(86)提案字第25号通知：“经查：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智相机行事的进步表现。解放后其家属因受周伟龙影响而被判处徒刑的，我们已建议有关法院从宽处理，对尚未就业的孙女，已建议新疆就地照顾安置工作。”

(湘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我所知道的唐纵

陆 印 泉*

戴笠摔死以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三派：一是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二是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三是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抗日战争胜利后，唐纵成为蒋介石手下的“红人”，他担任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和国防部保安局中将军长，还统率了3个保安师。逃往台湾后，毛人凤、郑介民相继离开人世，唐纵仍然大权在握，继续为蒋介石主持特务工作。

我虽然参加过中华复兴社，但没有参加复兴社特务处。特务处名义上隶属于复兴社，实际上自立门户，复兴社无权过问，他们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汇报，活动经费也由蒋亲自拨给，与复兴社无关。而且我在复兴社内只是一个基层小组长，对于唐纵的特务活动，一无所知。然而到解放前十年，我与他相识并一度做过他的部属，相处日久，自然知道他的一鳞半爪，现在就记忆所及，叙述于后。

我 怎 样 认 识 唐 纵

唐纵，字乃健，在公文上往往批一个“健”字，湖南酃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与戴笠同期同学（但戴笠没有毕业，后来经蒋介石批准，作为毕业生）。我是中央大学出身，上海市松江县人，经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左曙萍介绍而认识了唐纵。左曙萍笔名左漱心，与几个黄埔同学合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名曰《流露》，每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津贴经费银洋100元。

* 陆印泉曾任经纬出版社总干事，中国警政出版社副社长

我在学校读书时，爱好文学，经常撰写诗歌和小说，在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报刊上发表，也在《流露》上发表过小说。1933年冬，《流露》更名为《中国文学》月刊，改聘中央大学庄心在为编辑人。庄在学校里是个大忙人，既读书，又写文章，还搞政治活动。他是上海市举贤人，与我可称为同乡，平日相处较好，比我高两个年级，快要毕业了，他把我介绍给左曙萍，作为《中国文学》的编辑人之一。

当时，左曙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干事，月薪银洋100余元，生活较为宽裕。他与黄埔同学中的几个湖南同乡很熟，往来颇密，他们是肖作霖、唐纵、徐挽澜、叶永蓁，后来又加入了几个非湖南人，如河南人王汝沅、上海人陆印泉等等，我们经常夫子庙轮流请客。

据黄埔军校同学说，唐纵在军校时就得到校长蒋介石的信任，因为他经常主动向蒋介石打“小报告”，说某教官如何，某同学如何。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其中有国民党员，也不乏共产党人。到了第六期时，共产党人已大为减少，而左倾分子还是有的，所以唐纵的小报告颇得蒋介石的欢心。唐毕业后，就被蒋留在身边，做特务工作。

1932年，复兴社在军事委员会密查组的基础上，建立了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唐纵任书记，后改称为书记长。特务处是秘密机构，对外不公开，我虽与唐纵多次接触，但还不知道他是特务头子。从外表上看，唐纵戴着一副白金丝边眼镜，不胖不瘦的面孔，说话慢条斯理，从未大声训斥过人，很象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既不象一个赳赳武夫，更不象一个满脸横肉的杀人魔王。他待人很和蔼，黄埔军人有个普遍的习惯，对军人往往不客气，要说就说，毫不留情；对文人则彬彬有礼，唐纵更是如此。我与他同坐轿车时，他总是让我先上车，我推让再三，他才先行上车。

唐纵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宠爱，主要是由于他对蒋忠诚，1933年下半年，戴笠不在南京，特务处工作暂由唐纵代理，他错捕了汪精卫手下的一个人。汪得知后，向蒋介石要人，蒋马上叫唐纵把他释放。为了敷衍汪精卫，将唐纵扣押起来。他坐了一段时间的牢，毫无怨言，并说：“这没有什么，我们做事，处处要为领袖着想，领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唐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守口如瓶，喜怒不形于色。唐的好友肖作霖多次对我说过：“唐乃健的保密精神，令人敬佩，我们可办不到。”

唐 纵 等 联 袂 赴 德

1936年春，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鄧梯，奉派为驻德大使馆武官，他先赴德国。接着，唐纵和左曙萍被派为助理武官和办事人员，他俩是夏天去的。当时，我刚刚从大学毕业，尚未走上工作岗位。我与徐挽澜（黄埔毕业生，时任中央大学军事教官）、黄学周（黄埔一期毕业，时任陇海铁路局总务处长）和左的妻子夏凤如从南京乘车赴上海，欢送唐、左两人出国，住宿于新亚饭店。

因为新亚饭店房租太高，我一个人住在扬子饭店。该店内设有扬子舞厅，唐、左两人要出国，必须学会跳舞。他俩先在扬子舞厅练习，唐纵学不会，常常踩到舞女的高跟鞋。于是在扬子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专门请个舞女到房间里教，教了两夜，唐纵才懂得了一点ABC，总算勉强可以应付了。

次日早晨，我们到码头去欢送他俩，左曙萍的妻子夏凤如边掉泪，边挥手帕，直至轮船变成一个小黑点为止。此后几年，我不知道他的音讯。听说唐纵潜心学习希特勒法西斯组织机构的设置和统治德国的办法。他常写学习心得寄给蒋介石与戴笠，颇得他们的赞赏。隔了一段期间后，鄧梯首先回

国。我的朋友肖作霖正在开封任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无法抽身，嘱我代表他由南京赴上海迎接。鄧寓居于南京路汇中饭店。在那里，他接见了我，寒暄几句后，我即告辞返回南京，我仍供职于陆军交通学校。不久，唐纵与左曙萍同时回国。这时，鄧悌代替邓文仪任复兴社书记，左曙萍任该社南京分社书记，唐纵仍回复兴社特务处任书记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复兴社被取消，其特务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贺耀组兼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唐纵任该局书记长。蒋介石感到侍从室内应该有人专管情报，决定在第一处之下增设第六组，委唐纵为少将组长，左曙萍为上校副组长。在侍从室，大家的级别都不高，但生活待遇好，我去吃过一顿饭，有鱼有肉。抗战期间，公务人员的生活十分艰苦，平日总以吃素为主，能够吃上一顿鱼肉，是很不容易的，唐纵的办公地点在曾家岩蒋介石官邸。

第六组组长这官并不大，但权力不小，全国所有政治、军事情报先要经过唐纵之手，然后送蒋介石过目。因此，行贿、请客的人很多，但唐小心谨慎，极少赴宴和受礼。有一次，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自河南郾城来到重庆述职，请唐纵吃饭，唐不肯去，汤再三打电话，也被婉言谢绝。汤大发脾气，说：“这个小小的组长，竟这样不识抬举。”但唐是蒋介石身边的人，汤虽是封疆大吏，对唐也无可奈何。唐有一辆专用的小轿车，但私事决不用车，也不许夫人搭坐，我曾经几次看见他在街上安步当车，他的私生活较为严肃，只有一个老婆，也未闻有什么桃色新闻。

创 办 经 纬 出 版 社

唐纵虽是军人出身，但他很重视文化宣传工作，我曾经先后为他办过两次出版社。第一次是1942年，当时我从洛阳赴重

庆，在《扫荡报》任撰述委员，4月间，唐纵和肖作霖（时任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毛庆祥（时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中将主任）创办经纬出版社。他们三人为常务理事，下设理事、监事多人，一般都是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和较有经济实力的工商界人士。

他们中有：（1）徐鸿涛，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时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少将副主任，是毛庆祥的得力助手，上海解放之初，奉派赴香港做策反工作，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香港。（2）叶楠，叶楚伦之子，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后任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武官，现居美国；其夫人袁晓园现为全国政协委员。（3）胡伯翰，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4）戴铭礼，时任财政部钱币司司长，现任民革上海市委员会顾问。（5）鲁佩璋，时任财政部主任秘书。（6）李元杰，时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简任秘书。（7）端木恺，时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后在上海当律师。（8）陈乃文，时任行政院简任秘书，抗战胜利后，任立法院秘书长。（9）汪日章，时任侍从室少将秘书，现在奉化市安度晚年。（10）夏晋熊，职务不详，现居住于上海。（11）石凤翔，西安棉纱大王，蒋纬国的岳父。（12）李维城，重庆聚兴诚银行协理，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已病故。（13）黄雍，字剑秋，时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处中将处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已去世。（14）杨燊三，时任聚兴诚银行总经理。（15）沈士灵，重庆某工厂总经理，后来破产。（16）杨晓波，时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17）陈羲伯，时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第三、五、九炼油厂联合办事处主任，现在武汉。（18）沈重宇，时任长江实业银行总经理。（19）邓飞黄，时任立法委员，已病故。（20）陆印泉，时任经纬出版社总干事。

经纬出版社还没有监事二三人，他们是：（1）徐挽澜，时任川陕驿运管理处主任，后因分脏不均被人暗杀于宝鸡山谷中。（2）卢建人，时任重庆长江实业银行储蓄部经理，解放后，病故于上海。

理事、监事设得很多，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先后过问出版社业务的只有肖作霖、唐纵、叶楠、李维城、徐鸿涛、沈士灵、邓飞黄等几人。该社出版过一个剧本，名曰《田横》，肖作霖著，并出版过两种刊物，每月一期，一曰《经纬杂志》，这是本综合性刊物，有论文，有小说，以论文为主，16开本；二曰《经纬副刊》，这是软性刊物，有小品，有杂文，有文艺作品等等。

唐纵曾一度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我编好《经纬杂志》的稿件后，先送给他审阅，然后交印刷所付排。对于我编的稿件，唐纵一般都能通过，只扣压过一篇稿件，那是冯雪峰所写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他对我说：“冯是共产党员。”文章虽未发表，但我仍把稿费送给了冯雪峰。经纬出版社业务不佳，勉强维持到日本投降才告结束。

创 办 中 国 警 政 出 版 社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被撤销，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设立军务局，原有的侍从室人员绝大多数都安插于该局，由俞济时任局长，唐纵任中将参军，仍旧分管情报工作。唐纵的副手左曙萍则外放新疆焉耆专区任行政督察专员。1946年2月，唐纵升任内政部政务次长，权倾一时。

内政部里有一个司，专管全国警察工作，名曰“警政司”。蒋介石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早就想把警政司扩充升格。戴笠在世时，曾建议成立警察总监部，下设四个署，分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业务。戴笠摔死后，蒋介石叫唐纵

继续考虑此事。唐谨小慎微，主张管理全国警察业务的机构以小为宜，因为树大招风，容易遭人反对，决定在内政部之下设立警察总署，蒋同意了，并于1946年7月任命唐纵为警察总署署长。副署长为鄧裕坤，1947年又加了一个副署长唐毅，他原为重庆市警察局局长。该署设六处：第一处主管行政，处长为汪弼；第二处主管教育，处长为李辜；第三处主管刑事，处长为潘其武；第四处主管保安，处长为施建康；第五处主管外事，处长为黄天迈；第六处主管总务，处长为李叶。后来第四处改为主管出版，处长为张干，原来的保安业务划归国防部，另行成立保安局，由唐纵兼任局长。

抗战胜利后，我即搭军用飞机自重庆至南京，供职于盟军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该部系接受日军投降的机构，不久即告结束。我改任《大道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因经费无着，又于1947年夏关门大吉。有一天，我在南京太平路白下路口遇见了唐纵。他问我：“你目前有工作么？”我说：“没有。”他说：“你帮助我办个出版社，明天到舍间来谈谈。”

唐纵家住华村，系国华银行所建的里弄住宅，二层楼房，开间并不大。我在会客室内等了一二分钟，唐纵就出来了。他告诉我，他想成立中国警政出版社，出版发行有关警察方面的书刊。警察总署原有《警政导报》月刊一种，也交出版社发行。开办费由警察总署拨给，以后设法做到自给自足。我的薪水以在署内挂一个编审的名义付给。

警察总署属内政部管辖，实际上部长张厉生管不了总署业务，有事由唐纵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汇报。中国警政出版社是个独立的机构，不设在署内，设在太平路安乐酒家对门的《大道报》社旧址。以总署编审室主任陈鯤兼任社长，由我任副社长负实际责任。

中国警政出版社出版《警政导报》月刊，此外陆续出版了

《警政法规汇编》、《警政法规简编》、《警察英语会话》、《中国警政概况》、《警察礼节》和鄧裕坤所著的《现代警察学说》等等，这些书刊的重点在于宣传“警管区制”。

警管区制是德、意法西斯国家统治人民的措施，在警察总署成立以前，早就在南京试行过。将警察局所管辖的区域分为若干区，每区约有二三百户人家，区设警员一人，负责掌握和了解这个区的一切情况，这个警员可随时抽查户口或盘问居民。警管区制虽然遭到立法院的反对，认为它不符合宪法关于保障人权的条款。但因得到蒋介石的赏识，所以不管立法院如何反对，唐纵仍然继续实行。我曾经在南京《和平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警政的进步》一文，其中就谈到警管制问题。

想 靠 拢 共 产 党

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后，唐纵对前途表示悲观。有一次，在总理纪念周上，他分析国内战争形势时说：“这次，我们又把东北丢了。只丢土地，问题还不大，严重的是我们的几十万部队没有及时撤走，都丢给他们了。”又有一次，唐纵要到中央警官学校去演讲，叫我去做纪录。在轿车里，他唉声叹气地说：“中共会猖獗一时。”我虽然与唐纵相处十多年，但我始终认为搞特务的人是翻脸不认人的，所以我与他谈话时，总是防他一手。他见我搭腔，便慢吞吞地吐出了几个字：“自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194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南迁。警察总署将荐任以上的官员全部带走，对委任官员和一般办事人员，除指定的少数人以外，一律予以遣散，我在被带走之列。我当时想脱离国民党政界转入教育界，并已接受了震华文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的聘书。唐纵不许我辞职，说警政出版社还要继续办下去，即使到了广州或台湾，还是要办的。于是我办好出版社结束事务以

后，跟随大家一起到了湖南衡阳，打算小住几天，然后再去广州。

这时，唐纵也到了衡阳，他给我们作了一个报告，其目的是为了安定人心。他的一个副官跑来对我说：“署长将作南京之行，请你一同去。”我心想，跟一个特务头子东奔西跑，将来我可能会被人怀疑成特务，那就是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我推说脚生冻疮，行动不便，不能应命。唐纵一走，我就与两个同事，擅自折回上海，决心弃暗投明。我一到上海，就参加了民革地下组织。这时，唐纵也在上海，见到了我，说：“你不是脚痛么？怎么也来了。”我说：“现在脚好了。”后来，民联（即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简称，为民革组织的前身之一）领导人吴艺五、林知渊对我说：“唐纵与郭春涛相处较熟，这次他到上海来是要求参加地下民联的，我们几个人商量结果，认为这号特务头子不能吸收。”于是，唐纵去了台湾。郭、吴、林诸人均已先后病故，知道此事而尚健在的，还有民革上海市委员会顾问刘海亭一人。

唐纵到台湾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书记长。有一次，台湾国民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唐得了全票，颇为蒋经国所妒嫉，从此陆续拿掉了唐纵的中央委员和其他重要职务，1984年唐病死于台湾。

一个多色彩的军统特务——罗文杰

罗善达

先父罗文杰，出身寒微，青少年时游荡江湖，后来混迹于国民党政界，历任团长、县长、师长等职。他与湘西地方势力广有联系，却又同轿夫、马弁称兄道弟。人们说他“红黑两钻，哪儿都行得通”。

在红军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和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期，他与红军打过仗，后来又成为湘西军统头目之一，搜捕迫害过中共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同时也掩护过一些共产党人及其亲属。

他既积极为国民党统治者卖力，如收编彭春荣、瞿伯阶等部；又在湘西先后组织过“倒何”（指何键）和反对国民党十七绥靖区在湘西各县成立戡建大队的运动。

当人民解放军进剿湘西土匪时期，他幡然悔悟，率部投诚。他一生的复杂经历，我很难全面而准确地记述，仅凭个人的记忆给人们提供参考。

浪迹江湖

先父罗文杰原名余华，号润身，1893年生于永顺县两岔乡元迪湖村。我的祖父罗国友是个裁缝，他因受人欺凌，于清光绪年间携带一子一女去长沙，在浏阳门外开设“罗鼎新衣庄”为业。先父少年时，在长沙读过几年私塾，能背诵近百篇古文。他爱交朋友，挥霍无度，因不服父亲管束，流落在外，长期

不归。那时，南北纷争，兵慌马乱，他与家庭音讯断绝，祖父疑他已死，举家迁至沅陵，仍操旧业。

1920年，先父回沅陵与家庭团聚，全家为之庆幸，祖父给他完婚，他就在沅陵居留。沅陵地处沅、酉两水汇合处，为湘西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民国初年，张学济、田应诏、蔡钜猷等都曾据守此地，相继在沅陵设过湘西镇守使署、辰沅镇守使署等。而且，湘西各地“袍哥”盛行。先父回到沅陵后，因我祖父颇有积蓄，得以经常出入茶楼酒市和烟馆赌场之中，与江湖人士和一些军官交结往来。1923年，先父几经钻营，当上了泸溪县警备队队长。不久，湘西镇守使署将枪枝缴去，他便离职。

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

1924年，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封张云龙为辰沅清乡指挥官，收编保靖督带官田义卿为支队司令。田义卿部下的第一团团团长田少卿与我父亲原是“兰谱”兄弟，都是“袍哥”，田少卿为龙头大爷，先父为二爷，这就是人称先父为“罗二爷”的由来（那时，在旧军队中开“山堂”，龙头大爷多用“卿”字取名，如周燮卿、田义卿、田少卿、张义卿、熊孝卿等皆是）。1925年，田义卿在沅陵宴请张云龙，席间将张刺死。田义卿从此当了辰沅清乡指挥，先父任第一团团附。同年，湖南省督军赵恒惕派第三师叶开鑫部到湘西收编田义卿。不久，叶开鑫设伏将田义卿击毙，部队遂由田少卿等率领，先父随部退入贵州铜仁，投奔贺龙。这时，贺龙任建国川军师长，田部被收编为一个团。叶开鑫见先父伙同田少卿“叛逃”，便抄没家产，我祖父因株连忧愤而逝。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贺龙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率部由铜仁驰往津（市）、澧（县）

一带，先父随田少卿率部沿沅水而下，袭击叶开鑫部，并缴获了大量的枪弹。

1927年，周朝武(大庸人)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二师师长，驻扎常(德)、澧(县)。田少卿出任该师副师长兼团长，先父任师部参谋，尔后，该部移驻大庸时曾遭到田应堂部的围攻，大庸不守，周部瓦解，先父与田少卿一同投奔陈渠珍。

与红军作战

1928年，陈渠珍委派先父为桑植县清乡委员并代理县长。此时，桑植县团防头子陈策勋任桑植、鹤峰清乡总指挥。这年春，周逸群、贺龙同志到桑植建立工农革命军，先父逗留在永顺不敢回桑植县城。当时，人们嘲笑说罗文杰的桑植县政府，设在永顺小西门。随后，桑植县长由胡履新接任，先父调任陈渠珍师部参议。1930年，陈渠珍任陆军新编三十四师师长，在各县组建保安团。1932年，陈派先父为永顺县保安团团长，组建队伍。

1933年，红三军自洪湖苏区转移到湘鄂边，恢复和发展苏区，于1月13日攻克桑植县城。陈渠珍试图在国民党与红军作战之际，保存实力，而何健却调三十四师教导旅龚仁杰部、第三旅周燮卿部及各县保安团，交由湘鄂川黔“剿匪”总指挥徐源泉指挥，进攻红军。永顺保安团配属于周燮卿旅，曾在桃子溪与红军作战。

1934年春，红三军在桑植重建苏区，向永顺边境发展。先父率部驻扎在永顺万民岗布防。11月5日，红二、六军团于黔东胜利会师后，挥师向东，从龙山转向永顺，先父此时正驻守永顺县城。7日，红军进攻县城，先父率部稍事抵抗后，惶惶向王村方向撤退。后退往保靖，受六十二师陶广指挥，与红军作战。

抗 命 倒 何

在红军二、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何键为消灭异己，曾以数师的兵力包围陈渠珍部，迫令陈部缩小编制，又将陈部的周燮卿旅编为独立十三旅；将田少卿、张晋武两个教导团和先父的永顺保安团、王尚质的桑植保安团、向捷先的第六团共计五个团缩编为湖南省保安二十五团。此时，何键在长沙召见先父，何许愿说：“缩编不出乱子，就放你当县长，并送给银洋1000元。”1936年4月，何键命令保安二十五团开赴长沙整训，官兵大哗，先父和田少卿把队伍拖到永顺石堤西，公开抗命。何键即命陈涤暇部追剿，保安二十五团与之周旋于湘西边境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一带。此次，保安二十五团于桑植上河溪设伏诱敌，歼灭了陈部一个团，迫使该部退至沅陵。何键无法，只得授意湖南第四区保安司令王育琰出面，将保安二十五团改为保安二十团，归王育琰指挥。何键把这次剿办失利归咎于罗文杰。并在他的“剿匪”布告中说，罗文杰是此次“肇事之元凶”，通令悬赏罗文杰的首级，但以后却将先父调为第四区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议。

先父面对何键的阴谋，准备拉走部队，另谋出路。此时，他取得何键的政敌如南京的贺耀组、唐生智，驻长沙的陈渠珍等人支持，发动倒何运动。1936年秋，他由常德秘密驰退澧县，将保安二十团拖到永（顺）、桑（植）边境，打起“倒何联军第一路军”旗号，自称司令官。部队所到之处，贴出“打倒何键”和“湘西人不打湘西兵，湘西兵爱护湘西老百姓”的标语。部队拖到鹤峰走马坪一带，通过徐源泉的部下任团长与徐源泉联系，徐答应收编。何键采取政治分化的方式，派一八五旅旅长谢龙部跟踪进驻永顺，暗地利用原任三十四师团长向捷先做分化工作，趁先父去恩施会见徐源泉之机，收买先父部

下营长甘清平，并将部队拖回永顺，导致徐源泉生疑，将先父羁押恩施，部队瓦解。后来，先父被软禁在湖北建始县，经好友营救才逃回湖南。

湘西军统头目

抗战军兴，湖南省主席由张治中接替后，陈渠珍出任湘西行署主任，他委派先父任湘西行署游击清乡委员，驻洪江。1938年，湘西行署被撤销，先父在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任补充团团长。旋因该部开赴河南，先父中途回到沅陵，闲居家中。1939年，军统势力进入湘西。当时，沅陵是抗日后方的重要城市之一，国民党政府在这里设立了沅陵警备司令部和军警稽查处。稽查处系军统局派出的公开特务机关，该处处长黄加持（永顺人），系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与军统头目戴笠为同期同学，黄加持当年在南京工作时，先父任永顺保安团团长，接受过黄加持的托咐，照顾他留在家乡的老父，彼此颇有交情。这年，黄加持介绍先父加入了军统组织，化名罗情节。1940年，黄加持调任常德稽查处长，先父接替他任沅陵稽查处长。1941年，黄加持调升贵州省缉私处长，先父就接任常德稽查处长。此后，他相继担任过军统在常德、沅陵等地的情报组长和湘西站长以及特派员等职务，成为军统在湘西的重要头目。当时的湘西情报站，下辖常德、沅陵、芷江三个情报组，辖区20余县，每县设有情报员，搜捕中共地下工作者，监视和迫害进步人士。先父作为军统在湘西的头目，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神秘人物。那时我家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上自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真是形形色色。人们说“罗二爷的名片可以上走川黔边，下过洞庭湖”。

1944年前后，湘西地方武装彭春荣、瞿伯阶聚众万余，时分时合，在湘鄂川黔边境活动。在抗战之初，这两股队伍就已

崛起，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调派重兵征剿都无济于事。沅陵行署主任毛炳文要先父作他的代表进行招抚。先父曾约彭春荣在永顺溪河会见，商谈招抚条件，彭春荣很尊重他，说老长官来了他很放心，愿意听候调遣。谈判时，湘鄂川黔清剿总指挥傅仲芳的追剿部队赶来，向彭部发动袭击，招抚未能成功。这年，先父还掩护了贺龙同志的亲属。先父的好友瞿玉屏，早年曾在贺龙部任团长，瞿曾受贺龙嘱托，于1937年从上海将贺龙同志的亲属接到洪江。后来，瞿撞车受重伤，旋即去世。瞿在临终前嘱咐家人，要罗文杰赶至洪江料理善后。先父赶至洪江与瞿妻杨世琰等商量决定，由杨世琰带着贺龙同志的亲属迁往乾城。此后，先父不时寄钱以供他们吃饭。

1947年，先父受程潜之命，至龙山收编瞿伯阶部，编为武汉行辕直属第一清剿纵队，瞿伯阶任司令。

湘 西 事 变 前 后

1949年初，国民党驻常德的第二十七绥靖区司令部，命令湘西各县成立戡建大队，企图负隅顽抗。“三二”事变发生后，先父于3月22日应黄鹤鸣（自称川湘护路司令）的邀请，集合人枪千余，进驻所里，与周燮卿、杨光耀、陈景尧、田儒礼等聚会，计划成立湘西军政委员会，推陈渠珍任主任，周燮卿、罗文杰为副主任。会后，发出快邮代电，反对第二十七绥靖区司令部。接着，先父从所里到保靖，打出“湘鄂川黔边区人民救国自卫联军”旗号，自称总司令。他在给省政府的通电中说：“此次湘西事变的情形，原甚复杂。文杰生长斯土，熟悉民情，服务中央，夙具忠忱。对于家乡之治乱，关系国家之安危。始者，请命返乡，分途联络，共谋自卫……只得暂以‘湘鄂川黔边区人民救国自卫联军’名义，统一领导，共图改革。吾人要求政府，以湘西人才治理湘西，以湘西武力保卫湘

西，以湘西经济建设湘西。目标正大，绝非逾分；立场纯正，绝非越轨。目的一日不达，行动一日不止，个人成败，殊非所计”云云（见《小春秋》1949年4月8日）。“三二”事变后，宋希濂收编湘西各部为5个暂编师，先父被委为暂四师师长。

7月，解放军逼近湖南，程潜、陈明仁酝酿和平起义。此时，暂四师驻桃源。7月15日，解放军进入桃源县境，17日进攻县城，暂四师一触即溃，逃至沅陵北溶。8月，暂四师、暂五师均开返永顺。9月，先父从芷江乘机飞到广州，向毛人凤请示工作，毛人凤叫他将家眷送往台湾，并要他留在湘西掌握地方部队，组建反共武装。

10月中旬，大庸、桑植、永顺等县相继解放。先父辗转到达龙山里耶，准备送眷属至重庆飞台湾，及至酉阳，该县龙潭已经解放，他被阻留在酉阳县境。

弃 暗 投 明

1950年春天，解放军一四一师进入湘西剿匪。此时，湘西股匪，到处窜扰，他们与四川省八区专员虞贡廷、暂二师周燮卿等部互相勾结，推暂二军军长陈子贤组织湘鄂川黔边区自卫委员会，由陈子贤、虞贡廷为正副主任。他们在龙山县八面山岩壳落村开会，先父不肯参加，只派周芳麟为代表与他们联系。他感到大势已去，曾慨然长叹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如今前途茫茫，吉凶未卜。”他为找不到出路而彷徨苦闷。这时，军统湘西分站站长方天印向湖南省公安厅投诚，要求立功赎罪。他曾任先父的师参谋长，彼此私交亦深，省公安厅就派他至湘西策反。5月间，方天印在酉阳后溪找到先父，他带去了黄定戎写的劝降信，先父反复考虑了几天几夜，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最后弃暗投明，归向人民。他从酉阳到保靖、永顺，协

助政府规劝股匪投诚。他分别给师新周、瞿波平、陈士、曹振亚等写信，要他们缴械。他在永顺时，曾把股匪部众舒忠、朱定民、高竹楼，以及龙山的陈子霞、古丈的罗仲武等找来，动员他们向政府交了枪。这一来，震动了股匪，他们看到罗文杰起义投诚，共产党真的不杀他；于是匪众纷纷向政府缴械投诚。

1950年10月，省公安厅领导同志在长沙召见先父，他深受感动。首先是夏印副厅长亲自为他设宴，这是党对他的优待；其次是他安排为省人民政府参事，使他感到前途光明；当他游览长沙市时，看到工业恢复了生产，市内秩序井然，他敬佩党的英明领导；他看到解放军军纪严明，扶老携幼，深得老百姓爱戴。这一切，使他深深感激人民政府的恩德，他决心继续协助人民解放军做好剿匪肃特工作。

1950年12月，先父于沅陵逝世。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军 统 成 立 时 的 组 织 机 构

局长：贺耀组(兼)；副局长：戴笠；主任秘书：郑介民；秘书：毛人凤、陈世贤、刘启瑞、曾坚、谷兆芬；第一科科长：何芝国；第二科科长：徐业道；第三科科长：余铎；第四科科长：魏大铭；总务科长：杨继荣；人事科长：李肖白；警卫组长：张业；会计：徐人骥、林尧民；出纳：张襄甫、毛忠亮。

(辑 六)

戴笠的另一副面孔

沈 醉

(一)

1942年，我调任军统局总务处长，从这年冬天起，戴笠指定我长期担任军统局本部的总值日官，不再由各处处长轮流担任。直到他被摔死为止，我担任总值日官近四年之久，实际上还是值年官。

戴笠在指定我长期担任总值日官时，曾特别告诉过我，如局本部发生了较重大事件，总值日官不便处理时，除了可以找毛人凤外，还得随时报告他。他的原话是：“这（指军统局）是我们的命根子，这里出了问题，便一切都完了！”他当时兼任的职务有十多个，但他认为只有军统局才是重要的；没有军统局，其余都会没有。

约在1943年秋的某天晚上，警卫连一个士兵因连长不准他请事假回去看望他病重的母亲，一气之下，跑到防空洞内开枪自杀了。当连长向我报告后，我只跑到防空洞内看了一下，要连长将尸首运到郊区掩埋，以为这就算完事了。

第二天，戴笠来军统局办公，我顺便报告了这桩事情，他一听，用手在桌上一拍，指着我的脸，气愤地说：“这么严重的事，为什么昨晚不马上报告我？”我还满不在乎地说：“一个兵自杀了，有什么了不起！”他一听更气了，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我的头说：“你的头脑竟这么简单，太令人不放心了！你为什么不想想，我们把枪发给他们，是要他们保护我们的，现在我们逼得人家要去自杀，他一气之下，难道没有可能把我们打死后再去自杀吗？”

由于我过去没有带过兵，也不懂什么“兵者，凶器也”这类道理，经他这么一提，的确感到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去自杀时，他不会先把他恨的人打死再去死？反正是一死，死前也可以吐一口怨气。

戴笠看到我沉默不语，似乎认为我懂得了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便用训斥的口吻对我说：“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还不给我去集合全连士兵讲讲话。”我这才恍然大悟，是应当集合他们批评那个连长才对。临走，我又问他一句：“讲些什么好呢？”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要你讲，我自己去讲！”

当时担任军统各单位警卫的部队是一个团，先叫特务总队，后改为军事委员会特务第五团，除三个营、九个连的武装部队外，还有一个便衣中队。戴笠平日很少集合这些部队单独讲话，只是在每星期举行“纪念周”时，叫这些担任警卫的士兵轮流去听听。那天他单独集合一个连讲话，我在他身边几年，还是第一次。

士兵集合后，我去请他。他边走边埋怨我对昨晚的事太不重视了。一到集合场所，连长向他报告士兵人数之后，他首先就问昨晚那个士兵为什么会走到自杀的路上去？连长便把因为任务繁重，没有准假的情况向戴笠作了简单报告。戴笠问他：“如果你妈妈生病，我不准你的假，你作何感想？”那个连长还没来得及答复，他便走上去狠狠地抽了那个连长两个耳光，并大声责骂：“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人，我把士兵交给你来带领，竟被你逼得他们去自杀，我先得枪毙你来保护我的士兵。”

骂完之后，他马上告诉我：“把这个家伙先关起来，立刻给我汇一笔钱给那个士兵的母亲，让她好好医病；死去的士兵应当重新埋葬，换一副好的棺木，埋到军统局的公墓去。这是

由于我们的错误而使他死去的，应当厚葬。”

他的话一说完，我看到不少士兵都被感动得流泪了。

当我陪他回到办公室后，我问他：“钱给得是不是多了一点？”（当时法币贬值，我记不起具体数目，但我记得如折合银元，约在1000元左右）他笑笑说：“花这么一点钱能买下这么多士兵的心，难道还不合算吗？”最后，他还告诉我：“钱既要花在刀刃上，也要花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宜的场合。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花钱再多，也不及今日这点钱花得恰当，有收获。”

（二）

有年冬天，快要过春节了，我晚上有事去找戴笠，他正在写信，一看到我，便叫我帮他的秘书清点钞票。他写一封信，信上写明附上多少钱，就点多少钞票装进去。后来那个秘书有事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点装。过去，逢年过节，戴笠总要对一些重要骨干写一封亲笔信，送上相当数目的现钞，许多人在这时接到他的亲笔信和钱，全家都很感激。过去我也按时收到过一份不薄的赏赐。虽然不缺钱用，但也很高兴，有些完全靠薪水收入而无法捞“外快”的人，几乎都是指望这笔钱来好好过年过节的。

快到半夜了，他还在按照厚厚的一叠名单写信，字虽不多，但总得写一页或两页，他的毛笔字写得大，一行字总要占去信纸的两行，一张信纸写不了几句话。因此，写得很吃力，我看他不时用手帕擦汗水，我也有点累了，便劝他休息，明天再写，他听了，马上把笔放下，用教训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要别人去替我们拼命，我们流点汗都不愿意吗？亏你说得出，明天一过，就没有意义了！”

听了他这几句语，我当时打心眼里佩服，我想难怪有那么多

亡命之徒去替他拼命卖力，原来他是这样收买人心。

(三)

杜聿明曾对我讲过一件戴笠对朋友有一套手法的事情。

1946年3月间，也就是戴笠乘飞机摔死的前几天，杜因患肾结核住在北平中央医院（即现在的北京人民医院），准备动手术。有天戴笠突然来医院看杜，一见面，他就问准备请谁主持这次手术？杜告诉他是一位有名的泌尿科专家谢元甫大夫之后，他用非常关切的神情和口吻问道：“这个大夫有多大了？”杜说：“60多岁，经验非常丰富。”他一听便连连摇头说：“外科大夫60多岁了，再有经验也不行。因为外科不象内科，内科大夫年龄大，经验多，有把握，外科大夫年龄大，手脚就不那么灵活了。”他当即表示应当换一个年龄较轻点的。杜一再向他说明，“谢大夫手术高明，一直在工作，没有出过岔子，相信不会有问题。”戴笠就讲他1937年在上海割盲肠时，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和帮会大头子杜月笙等向他推荐一个有名的英国老大夫动手术，割盲肠本不是什么大手术，由于那家伙动作迟钝，忙了半个多小时才完成。以后伤口还老出毛病，结果身体也给弄垮了。

戴笠说完之后，猛地站了起来，用手一拍胸脯，很严肃地说：“老兄，如果那位老大夫给你动手术，结果发生了和我一样的情况，一是坏了你的身体，二是对不起校长（指蒋介石）要你去接收东北的期望。我替你找一个可靠的大夫，把这次手术做得成功，我才对得起你和校长。”

杜聿明听了他这番话当然很感激，认为他关心朋友，想得十分周到。但因为已约好谢大夫第二天来动手术，不便再换人了。戴笠仍然表示不同意，最后杜一再说明谢年龄虽大一点，但动作并不迟钝，戴笠便决定亲自去找谢大夫谈谈，看看他

是不是有十分的把握。临走，他还叮嘱杜，在他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动手术，一定要等他和谢大夫谈过话之后才能进行。如果他认为谢大夫没有把握，就非换人不可。

当晚10点多钟，杜聿明的副官向杜报告，说谢大夫来电话，有几个军统人员到他家捶门打户，说戴笠要去他家里，他全家吓得不得了，当时戴笠正在北京、天津等地大肆捕人，没收房屋财产，所以谢家害怕。谢听副官说明原委后，知道是为手术事，才放了心。这天，谢与戴笠一直谈到深夜12点。戴认为谢年龄虽大一点，但精力还充沛，这样才同意他第二天给杜聿明动手术。

手术刚做完，戴笠即去医院看望杜聿明，并且告诉他，已问过谢大夫，手术很顺利，大约两星期就可出院。

临走，戴笠一再叮嘱杜要好好养息，一定要等伤口愈合，恢复正常后才能出院。杜聿明说：“戴笠这么关心朋友，其实还是为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利益。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们两人之间的交情，而是为了整个国民党的利益。”

象这样一些过去我没有写过的东西还有不少，今后我准备把这些片断都写出来，希望知情的老朋友给我补充和指正。

军统系统中的湖南人

军统系统中的骨干以浙江、湖南、广东籍的居多，他们拉帮结派，形成了浙江派、湖南派和广东派。从人数上看，浙江派和湖南派较多，军统系统中的湘籍将领主要有以下一些人。

唐 纵，酃县人，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军统局帮办、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内政部政务次长、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保安局局长等职。

张严佛，醴陵人，曾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长、军统西北区区长、军统局主任秘书、军统局重庆结束办事处主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长沙绥靖公署中将高参等职。

周伟龙，湘乡人，曾任汉口警察局第八分局局长、军统上海区区长、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书记长、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国防部上海执行部主任、交警总局中将局长等职。

唐生明，东安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军委会高参、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代司令、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1941年受国民党派遣，进入汪伪政府任军委会委员、江苏省保安副司令，抗战胜利后，任军统局中将设计委员、总统府参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等职。

文 强，长沙人，曾任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第一战区调查室主任、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东北“剿总”督导室主任、保密局东北区区长、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参谋长等职。

杨继荣，邵阳人，曾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军委会桂林行营调查课课长、广西缉私处长、军统局越南干部人员训练班副主任、长沙绥靖公署中将高参等职。

任建冰，湘阴人，曾任保密局少将设计委员、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机要组副组长等职。

李肖白，湘阴人，曾任军统局人事科科长、人事处处长、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湖南省警务处长、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等职。

李人士，醴陵人，曾任军统湖南站站长、天水行营调查课课长、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等职。

李崇诗，平江人，曾任广东缉私处长、军统香港区区长、中美合作所中方参谋长、别动军参谋长、军统上海办事处主任、国防部第二厅少将副厅长等职。

余乐璠，醴陵人，曾任杭州训练班总教官、临澧特训班副主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西南运输处少将处长、上海善后救济总署汽车管理处处长等职。

沈 醇，湘潭人，曾任军统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员和行动组长、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副处长、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等职。

邓树勋，桂阳人，曾任军统湘南站副站长、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保密局江西站站长、江西水警总队长、保密局设计委员等职。

季先训，岳阳人，曾任军统局军事处科长、三十一集团军调查室少将主任、江西水警总队长等职。

陈 达，醴陵人，曾任军统局江西站副站长、江西保安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衢州所少将主任等职。

张扬明，醴陵人，曾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主任秘

书、保密局南京站少将站长等职。

苏业光，新化人，曾任军统湘西站站长、军统局交通科科长、保密局广西站站长等职。

唐秉骥，衡阳人，曾任军统湘南站、湖南站站长、第二十四集团军调查室主任等职。

王方南，城步人，曾任军统上海区助理书记、情报组长、军统香港区助理书记、书记、军统局局本部科长、军委会特检处科长、南京站副站长、上海站少将站长等职。

黄炳炎，长沙人，曾任军统东南训练班行动教官、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副处长、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代处长等职。

袁铭鼎，长沙人，曾任首都卫戍司令部少将副处长。

刘人奎，益阳人，曾任税警总团二团团团长、重庆中美特警班少将副主任、省会警察局局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等职。

金远询，资兴人，曾任军统局秘书、军统湖南站站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法执监部调查室少将主任、粤汉铁路警务处副处长等职。

黄加持，永顺人，曾任军统沅陵、常德稽查处长、贵州省缉私处长、军统贵州站站长、保密局南京站站长、首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保密局台湾督察室主任等职。

罗文杰，永顺人，曾任军统沅陵、常德稽查处长、军统常德、沅陵情报组长、湘西站长、暂四师师长等职。

黄康永，宁乡人，曾任军统局人事处科长、军统局台湾工作人员训练班少将副主任、保密局湖南站站长、兼国防部少将专员等职。

刘乙光，永兴人，曾任浙江警官学校训练班队长、军统特务队队长、因看守张学良有“功”而提升为少将。

任建鹏，长沙人，曾任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内政部警

察总队长、汉口市警察局长等职。

徐业道，湘潭人，曾任保密局局本部秘书、第三处处长、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国防部军法局中将局长等职。

吴贻恕，湘潭人，曾任军统湖南站站长、香港站站长等职。

郭旭，湘潭人，曾任军统汉口站会计、军统局会计处副处长、处长，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等职。

龚仙舫，石门人，曾任军统局局本部人事处少将处长等职。

曾坚，邵阳人，曾任军统局秘书、桂林行营办公厅调查室主任、军统桂林办事处主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处长、邵阳绥署第二处处长等职。

朱金骅，常德人，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组长、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等职。

夏松，益阳人，曾任贵阳警察局局长、东北铁路警务处长、保密局湖南站站长、台湾保密局设计委员等职。

王春晖，湘乡人，曾任忠义救国军少将副总指挥，交警十二总队总队长、上海铁路局警务处副处长、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主任等职。

王力忠，湘乡人，曾任别动军第四纵队第二支队长、少将高参、交警十二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交警第十一、八总队总队长、浙干铁路护路司令等职。

霍远鹏，酃县人，曾任国防部保安局少将参议、内政部第一警察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湖南省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等职。

张先正，华容人，曾任晋豫边区挺进军副指挥、兼第五纵队司令、交警教导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等职。

何际元，宁乡人，曾任国民党第三、六战区调查室科长、主任、益训班副主任、南岳中美特训班总队长、别动军第四纵队少将指挥、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苏州员警训练班副主任等职。

李 璜，华容人，曾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第三大队长、忠义救国军团长、旅长、交警第四总队总队长、交警教导第二旅旅长等职。

龚少陶，湘乡人，曾任交警总局督察室少将主任等职。

晏子风，湘乡人，曾任交警总局第五处副处长等职。

钟贡勋，长沙人，曾任军统南京站长、交警总局秘书长等职。

唐光辉，邵阳人，曾任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黄杰任主席期间）二处少将处长等职。

易德钧，醴陵人，曾任国防部反共救国军纵队少将司令等职。

易 珍，醴陵人，曾任军统福建站长、福建省政府调查室主任、交警总局少将政工处长等职。

陆遂初，岳阳人，曾任军统临训班教官、军统西昌站长、中美合作所情报组长、台湾警务处长等职。

陆独步，岳阳人，曾任衡阳警备司令部情报组长、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等职。

李品英，岳阳人，曾任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代主任等职。

赵 仁，醴陵人，曾任湘黔铁路警务处长、第八编练司令部第二处副处长等职。

刘人爵，长沙人，曾任特训班大队长、湖南省警务处科长、湖南省会警察局长等职。

刘茂欣，长沙人，曾任军统局股长、科长、首都稽查处少将副处长等职。

罗日鸣，邵阳人，曾任军统局特务总队副总队长等职。

吴建树，衡阳人，曾任衡阳警察局局长、长沙军警宪督宪处督察、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衡阳警察司令部稽查处长等职。

毛健钧，湘乡人，曾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二处科长、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等职。

袁寄滨，湘潭人，曾任军统局局本部助理秘书、秘书、上海实验区人事组组长、保密局人事处副处长、处长等职。

罗挺翼，湘潭人，曾任军统局本部助理秘书、货运管理局主任秘书等职。

万铁良，湘潭人，曾任军统局人事科股长、军委会特检处人事科长、财政部缉私署人事室主任等职。

王功璠，浏阳人，曾任云南省警务处长等职。

王班联，攸县人，曾任军统临训班大队长、运输统制处西安分处处长等职。

文子瞻，长沙人，曾任交警总局情报处长、台湾情报局情报处长等职。

傅 荣，宁乡人，曾任滇缅越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陆军总司令部情报署长，

黄毅夫，临湘人，曾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调查室主任等职。

田方正，长沙人，曾任军统汉中站站长等职。

左 明，湘阴人，曾任重庆稽查处副督察长、汉中警察局局长等职。

刘君实，耒阳人，曾任军统局会计室科长、中美合作所经理组组长、军需署贵阳财务分监等职。

余克剑，长沙人，曾任缉私署西安查干班少将副主任、保密局湖北站少将站长、武汉稽查处长等职。

李在仕，湖南人，曾任四战区督导组副组长、少将组长等职。

李毅宗，宁乡人，曾任军委会华北督导组少将团长、交警总局第九总队少将总队长等职。

李冷根，长沙人，曾任军统局局本部秘书、西贡领事馆总领事等职。

罗 葦，长沙人，曾任湖南警务处科长、长沙市政府主任秘书等职。

罗杏芳，酃县人，曾任军统重庆邮检所所长、国防部第二厅第六处处长等职。

易 炜，湘阴人，曾任军委会别动军参谋处长、中美合作所军事组组长等职。

周家礼，耒阳人，曾任浙江警官学校会计课课长、忠义救国军经理处长等职。

周 济，宁乡人，曾任湘潭稽查处长等职。

孟宪周，南县人，曾任湖南省警务处副处长等职。

郑兆一，长沙人，曾任军统黔阳训练班政训处长、军统局局本部秘书、军统广西站站长、东北“剿总”第二处处长等职。

彭自强，湘乡人，曾任交警总局十六总队总队长、交警第一旅旅长等职。

徐人驥，耒阳人，曾任特务处会计科科长、军统局会计室主任、经理处长、中央银行稽核等职。

徐羽仪，耒阳人，曾任息烽县县长、军统局司法室副主任，保密局检举室主任等职。

徐谷冰，衡阳人，曾任军统局贵阳办事处主任等职。

唐 治，南县人，曾任保密局经理处副处长、处长等职。

唐撰文，酃县人，曾任军统通讯训练班大队长、内政部警察总署刑警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等职。

段 复，衡阳人，曾任军统局湘南站站长、新社会建设协会湖南分会书记等职。

康承恩，宁乡人，曾任军统云南站少将通讯员等职。

傅作梅，湘潭人，曾任衡阳警察局局长等职。

陈捷革，常德人，曾任军统湘西站站长、江陵稽查处长、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直属通讯员等职。

陈 澍，衡阳人，曾任军统局局本部秘书等职。

陈 庚，湖南人，曾任军委会交通巡察处参谋长等职。

龚梦涛，湖南人，曾任忠义救国军参谋长等职。

郭宗尧，沅陵人，曾任军统沅陵稽查处长、重庆稽查处副督察长、军统局局本部秘书等职。

黄汉英，祁阳人，曾任军统黔阳训练班少将总队长等职。

张国良，益阳人，曾任军统重庆训练班少将副主任等职。

张之岳，岳阳人，曾任军统局军事处科长、川湘鄂边区绥署第二处处长等职。

杨隆枯，长沙人，曾任军统局衡阳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总务科科长、缉私署总务处长、财政部盐务署署长、台湾财政部盐务总局局长等职。

潘汉遼，酃县人，曾任湖南省警务处副处长、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少将师长、湘鄂赣边区绥署师长等职。

萧煥文，湘乡人，曾任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副处长等职。

萧绍文，长沙人，曾任西安警察局局长等职。

谢厥成，湖南人，曾任军统江西站站长等职。

聂宗矣，湖南人，曾任田坪里中美特训班副总队长、交警总局第一总队总队长、保密局设计委员等职。

倪铁国，长沙人，曾任陕坝中美合作所少将教育长、保密局新疆站站长等职。

胡文熙，湘潭人，曾任军统局重庆招待所所长、保密局人事处副处长等职。

霍立人，酃县人，曾任军统兰州站站长、交警总局专门委员等职。

陈士虎，蓝山人，曾任首都警察厅督察、别动军第七纵队

少将指挥等职。

刘子欽，邵阳人，曾任军统局军事处敌情科科长、交通部七区公路局警稽组组长等职。

徐进，长沙人，曾任交通部七区公路局警稽组组长等职。

史敏，湖南人，曾任浙江警官学校教育长、湘桂铁路警务处长等职。

赵家杰，湘潭人，曾任军统局秘书室少将秘书等职。

刘戈斯，湘乡人，曾任军统临澧训练班会计课长、军统局经理处科长、忠义救国军经理处长等职。

刘哲民，衡阳人，曾任交通部第二运输处处长等职。

刘汉东，华容人，曾任西安警察局长、财政部缉私署处长等职。

何行建，长沙人，曾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第一支队长等职。

何善垣，湘潭人，曾任军统局人事处科长、中央银行总裁办公室机要组长等职。

劳建白，长沙人，曾任军统局特务总队副总队长等职。

邹陆夫，长沙人，曾任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陆军大学教官等职。

郭墨涛，嘉禾人，曾任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参谋长，交警支队少将司令等职。

徐肇明，长沙人，曾任交警十五总队少将总队长等职。

李慎言，宁乡人，曾任交警十七总队少将总队长等职。

刘国宪，酃县人，曾任军统特务团副团长、团长，界首警备司令等职。

吴利君，益阳人，曾任军统临澧、黔阳、息烽训练班教官、湖南省会警察局长，第十七绥靖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王 力，湘潭人，曾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处参谋、军统局桂林办事处副主任、东北“剿总”第二处副处长、保密局北满站站长、长沙绥署第二处处长、湘鄂赣边区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等职。

文焕卿，湘乡人，曾任交警第八总队少将总队长等职。

张仲骞，湘乡人，曾任交警第十三总队家将总队长等职。

邓季之，湘乡人，曾任交警第八总队少将总队长等职。

周宝崖，湘乡人，曾任交警政工处少将处长等职。

文 德，湘乡人，曾任交警第八总队少将总队长等职。

陈友声，湘乡人，曾任交警政工处少将处长等职。

李济民，湘乡人，曾任交警第十八总队少将总队长等职。

刘直英，湘乡人，曾任交警第十六总队少将总队长等职。

陈守华，湘乡人，曾任福建闽江水警总局少将局长等职。

张一叔，湘乡人，曾任湖南水警总局少将局长等职。

朱 缙，长沙人，曾任交警总局第四处少将处长等职。

李雪华，宁乡人，曾任交警第七总队少将总队长等职。

喻勋衡，宁乡人，曾任交警第九总队少将副总队长，总队长等职。

(岳枫 辑)

本刊发表过的特务史料篇目

复兴社的军事处及护卫队（蔡杞材）	（ 3 •132）
特务傅德明陷害新化学生案始末（李惕乾）	（ 4 •110）
我所知道的中统（刘恭）	（ 4 •179）
军统特务在武汉制造的一件血案（余定华）	（ 4 •218）
我在浏阳率部起义前后（刘人奎）	（13•164）
株洲事件始末（张先正）	（13•217）
毛健钧是谁扣押的（陈粹劳、陈威仲、罗文浪）	（13•286）
关于特务搜捕余志宏一事的订正（刘笃平）	（13•287）
关于抢运交警总队仓库军用物质的问题 （严振世）	（14•241）
关于特务搜捕余志宏同志的问题（李文锦）	（14•242）
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在长沙的罪恶活动（沈醉）	（18•191）
我所知道的抗战初期河内刺汪行动（王方南）	（26•153）
嘉蓝临剿匪战役（刘天仓）	（27•86）
活捉匪首霍远鹏（谭建勋、谭汉伟）	（27•93）

注：括号内第一个数字是辑数，第二个数字是页数。

